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班碩士論文

從標會到「麻將」經濟：一個當代中國投機熱的案例

**From ROSCAs to “Mahjong” Economy: a Case of  
Contemporary China’s Speculative Fever**

研究生：陳浩乾

指導教授：高承恕 博士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

碩士論文題目

從標會到“麻將”經濟：一個當代中國投機熱的案例

研究生：陳浩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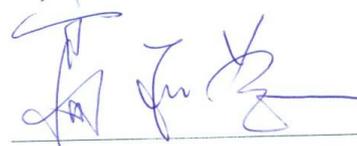
論文考試委員：



趙 彥 寧



項 颯



高 承 恕

( 論文指導教授 )

系主任：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24 日

## 中文摘要

本文以在浙江中東部縣城安城田野收集的倒會、倒債的材料為基礎寫成，研究視角主要著重在性別、地方治理、道德經濟等方面，而我使用「麻將」經濟作為比喻，一方面是本地居民大都視打麻將為首要休閒活動，並也將之作為社交和金錢轉移的重要工具，其基本組織方式和亢奮心理狀態，和在地社會盛行的投機性活動（標會、傳銷和六合彩）頗多相似之處，另一方面則想探究，何以在國家主導的經濟治理模式和意識形態之下，一般被視為結構性弱勢的人群（農村移民、農民工、女性和失業者），會接連不斷地從事甚至主導類投機性活動。本文將提問，晚近中國國家治理的區域性特徵和被稱為「貪婪」、「刁民」、「不過日腳」（不過生活）的人的關係。

關鍵字：中國浙江、非正式金融、標會

## 目 錄

導論	1
第一節 投機作為批判性的範疇	1
第二節 研究源起	8
第三節 標會和前人研究	10
第四節 研究背景	14
第五節 研究概述	15
第一章 金錢改變了人？	17
第一節 尋找出路的痛苦	18
第二節 變化的標會	24
第三節 「轉」出神奇	34
第四節 災難發生時	40
第五節 總結	45
第二章 從地方主義到地方社會	50
第一節 不干預的地方政府	50
第二節 城鎮化與地方金融	59
第三節 清會辦	68
第三章 女性間的團結與支配	73
第一節 叢林中的人情社會	75
第二節 家戶內外的女性	84
第三節 異類偶像和感染性展演	88
第四節 安城的男性陽剛氣概	96
第五節 總結	104
第四章 「麻將」經濟	109
第一節 快樂時光	112
第二節 逃亡和傳銷大學	116
第三節 「麻將」經濟	122
第四節 結論	124
參考書目	129

從標會到「麻將經濟」：一個當代中國投機熱的案例

From ROSCAs to “Mahjong” Economy: a Case of Contemporary China’s Speculative Fever

導論

投機作為批判性範疇

晚近幾年中國大陸的集資詐騙、非法融資、醫療騙局、傳銷案等頻頻發生，範圍遍佈全國，受害者往往有借著投入，收穫金錢、健康、情感極大回報的激情式預期，雖然涉及到的社會組織形式和價值轉換各有不同，時序和地點有極大差異，我在本文中皆稱之為「投機熱」現象。只需要在中國網路搜索引擎輸入上述關鍵字，相關事件之此起彼伏、涉案人群資金之巨量、類型之繁複多變，足使人為之咋舌。

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詐騙案---蟻力神終於再也維持不下去了，詐騙金額高達二百億以上，受害者超過一百二十萬戶螞蟻養殖戶，範圍以遼寧為中心，輻射吉林、黑龍江、內蒙等地。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被騙的傾家蕩產養戶們憤怒的從不同地區趕到瀋陽，前往「蟻力神」總部、遼寧省政府和美國駐瀋陽大使館前抗議，並討要保證金。當局立刻出動超過兩萬名全副武裝的武警、防暴警、公安、便衣，圍堵驅趕上訪的螞蟻養殖戶，但螞蟻養殖戶不斷的從各地趕來。3天的抗議當中，人數至少達6、7萬，規模超大。（天涯社區 2014）<sup>1</sup>

2014年是互聯網金融發展的元年。據網貸之家資料顯示，截至2015年2月，全國網貸運營平臺數量達1646家，成交量達335.14億元，貸款餘額為1246.07億元，當月投資人數就達到80.86萬人。而2014年底運營平臺還是1575家，僅2個月就增加了71家網貸平臺。然而，隨著網貸的走熱，問題也隨之而來。據網貸之家資料顯示，2014年全國出現提現困難或

---

<sup>1</sup> 可網路搜索「蟻力神」，摘自天涯社區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351698-1.shtml>

倒閉的P2P平臺達275家，與2013年的76家問題平臺相比大幅增加。而今年頭兩個月，出現提現問題的P2P平臺更已多達132家。截止到昨天，3月份僅過了12天，便已出現18家「問題戶」。（信報網 2014）<sup>2</sup>

9000人8億元資金，深圳特大非法集資案告破。高額提成返利誘人，網貸平臺虛假抵押。僅僅百元資金的投資門檻，就可以購買月息高達3-4%的理財產品，這等好事無異於「天上掉餡餅」，相信不少市民第一反應都會是「怦然心動」。（和訊網 2015）<sup>3</sup>

然而好日子似乎總是很短暫，小張把「好日子」結束的時間定格在2011年9月份，他告訴記者，「放出去的錢，突然要不回來了，幾乎一夜之間民間借貸鏈條就斷了。」一位元知情人告訴記者，在鄂爾多斯，幾乎家家都參與民間借貸活動，因此，資金鏈條斷裂後家家都是受害者。相關資料也在佐證這一點，2011年至2012年，鄂爾多斯市兩級人民法院共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15600件，案件標的71.51億元，涉案人數6000余萬人。（金融時報 2013）<sup>4</sup>

在中國大陸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上檢索集資詐騙，顯示相關結果為 1170000 個，且每日都有新的地方性新聞，顯然是很值得注意的現象。如果把時間的視角拉長，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也有各式各樣的「投機」活動，人們津津樂道於今日中國的頂級富翁，如何在 80 年代靠做「倒爺」掘得第一桶金，彼時並有「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等順口溜。再往前，普遍會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實踐之高峰期的 1960 年代的中國，也存在各式各樣的投機性活動，比如在不同的生產大隊之間倒賣鋼筋（Vivienne Shue 1988）。如果不局限於物的交換，廣東、福建沿海等地屢禁不絕的偷渡，也可以被視作是投機性活動的一種。他們不是在國家經濟計畫體系當中尋求物的價值差異，而是在邊境兩端的不同意識形態空間的轉移間尋求人的價值。

---

2 2月百家 P2P 跑路 解密網貸四大騙局（2015-3-13）<http://www.stardaily.com.cn/3.1/1503/13/466066.html>

3 央視：9000 人 8 億元深陷騙局 警惕 P2P 非法集資（2015-3-18）  
<http://mt.sohu.com/20150518/n413311834.shtml>

4 民間借貸資金鏈斷裂：鄂爾多斯路在何方（2013-6-24）  
[http://www.financialnews.com.cn/dfjr/tx/201306/t20130624\\_35311.html](http://www.financialnews.com.cn/dfjr/tx/201306/t20130624_35311.html)

儘管上述歷史跨越了社會經濟背景差異極大的不同時期，在其較窄的意義上，「投機」一詞亦不見得可接續性地適用於上述不同的社會現象，但具共通性地，當它們被放在和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市場中國緊密的歷史聯繫中，往往既洩露出彼時官方意識形態宣傳之外的複雜性，也有利反過來描摹出治理的實際輪廓。「投機」在新華字典中，有下述兩個解釋，其一：迎合時機。特指**乘機**以謀取**私利**：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投機倒把，其二：投合。相合，談得十分投機。在此，「投機」有兩個特殊的脈絡性意義：1、投機的自利（self-interest）原則和社會主義新人、具無私品質（selfless）的無產階級勞動者根本對立，在中國致力於消除市場的實踐中，「投機」的意義也發生了變化，變得更具價值的區辨性/網篩性，而非可量性的；2、「投機」是在不同種類的管治領域（regimes）之間尋求價值轉移，使人與物重置出原先身處的現代國家政治經濟領域，獲得社會、海外等其他管治領域（regimes）下的新意義（Arjun Appadurai 1988），既重新估價（revalue）了物或人，而且也同時性地創造出新的社會空間。正是在此彼此接連的脈絡性意義上，以維護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為目的的溫州「八大王」事件（溫州本地有八位個私經濟領軍人物因「投機倒把」獲罪，1982 年全國打擊投機倒把，有三萬人因此獲刑），反而在日後成為中國進入市場經濟新階段，同時也被認為是個人重獲經濟自由新階段的一個重要歷史標誌。此後，隨著社會變遷，1991 年，溫州鄭樂芬因捲入 1986 年「溫州抬會事件」（**抬會也即標會的一種名稱**）成為中國以投機倒把罪判處死刑的最後一人。

這一社會主義的歷史遺產在中國嘗試融入晚近全球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帶來兩個結果。首先，在當前普遍的市場迷思之下，「投機」活動在當下中國是不可見的，和市場動力混為一體。跟「走後門」之類行為不同，很多時候它都不是在

支撐既有政治的階序化秩序，而是持續性地延伸並創造出拉扯原來機器的繩索。如果將相對抽離、高速流動的金融資本承繼性地利用資本所有權追逐無限積累的衝動稱為「投機」的話，此二者在喚起人們的記憶、情感和認知方面，顯然截然不同。在中國，後者在 20 世紀中後段很長的時間中，幾乎是不存在的。然而，在一般被稱為「政治限制、經濟自由」或者由「奔向小康」到「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的近三十年裏，人們的經濟關係發生了巨幅重整。人們如何使用這樣一個在社會主義轉型帶來的社會和自我重組的脈絡下仍有**政治曖昧和解放意涵**的語詞，去理解急速而至的新生活中的「真實的投機」和人與人關係中的高息借貸呢？當然事實上，作為舊時代的政治口號，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回避使用「投機」這個詞。極為矛盾地，一方面當下中國顯仍處於經濟起飛、物質生活水準急劇攀升的經濟奇跡階段，並也不可避免地處於一種亢奮心情下，另一方面，伴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人們對於市場，以及和這一市場廣泛交截（*intersect*）的人與人的各種關係的理解，正愈形曖昧和衝突。想像人們從房產幾乎不具有市場價值的 7、80 年代農村基於傳統或社會主義的道德經濟體系相互借貸，到如今，經過充分市場化之後，兩方均擁有或至少一方擁有價值上百萬的房產（據官方統計資料，2014 年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 28844 元，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489 元，比之房價實在不高）時發生的借貸關係，儘管均可被視為是政治限制下的活躍市場行為，對於行動者來說，卻是絕不相同的兩個情境。這種轉變發生得如此之迅捷，許多人，及他們彼此之間的舉債借貸的歷史，便共同經歷了這一變化。發生于浙江安城<sup>5</sup>的標會的起落興衰史，就發生於這樣一群人之間，社會經濟和國家治理邏輯的巨大變遷貫穿了人們的經濟關係的轉變。經濟組織例如標會，在這種背景

---

<sup>5</sup> 我為田野場址所起的化名，具體見第一章「從地方主義到地方社會」。

轉移中持續，也在這種轉移中變化。若以標會作為追跡社會變遷的線索，將不同人的差異起伏的生命經歷連結起來，有可能提供何種想像並理解抵抗的路徑？又或者，為人們何以迫切主動地投入到新自由主義治理之下提供另一種具體解釋？

「投機」的這種特殊歷史意義，以及與此相類似的能指，會否限制了人們對市場活動的理解？這些問題都會在更廣的空間/歷史範圍內，隨著經濟活動的成熟進一步浮現。

與此孿生的，投機，不僅是不可見的，而且具有批判性的潛能，將關鍵地左決人們以何種方式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部衝突。易言之，那些無法被冠以投機之名的群體狂熱的物質競攬活動，不論以何種在地形式出現，都不可避免地將刺激人們借此作為理解當前中國社會狀況的其中一個隱喻。不斷地將企業家納入代表性機構，無限制地將經濟發展置於政府職能的最高順位，這種內在的狂熱性和不平衡性，以及由此必然地將社會不平等視為社會常態，罔顧並漠視他人的具體福祉，難道不也是國家層面的投機嗎？而「人民」在社會中的位置，慣時性地由社會主義新人到「致富光榮」（Judith Farquhar 1996），並也以集體動員的形式將國家和個人層面的經濟活動的緊密聯繫延續到市場經濟時期，個人經驗實有反過來躍升至社會層面的通道，當個人成功時，可以「感謝祖國感謝時代」，反之呢？前述「蟻力神」事件引發的民眾和政府之間的衝突，就清楚地顯示出在中國的市場風險承擔者（risk-bear），和市場動力都脫離不了和在地政治文化的聯繫。同時，國家也不斷面臨具體挑戰，如何以及以何種方式防止投機帶來的社會後果不斷擴大，而不至於破壞意識形態領域「市場」和「社會主義」的平衡呢？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不只有掩蓋社會巨幅轉型的遮羞布式的意義，它本身變成了一個等號方程式，彰示在社會主義理念和市場活動之間存在共存領域，30

年的發展至少在某個意義上證明了這一點。但反過來，這個方程式也會在不那麼共存的時候持續發揮作用，市場的成敗和社會主義下的人民的無我付出以一種歷史性的方式相連結，既為高昂環境和生命代價的市場活動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地基，使「投機」這一類具批判潛能的話語隱身，同時也使國家意識形態在這種微妙平衡（共存亦曖昧）中變得脆弱，或者至少須以酷烈的武力和暴力性治理來武裝此種意識形態層面的脆弱。當想像並意識到這一點，那些在各式各樣的市場化中付出高昂代價同時亦不再有任何機會於當下的社會機制中重新站起的人，也須生活（無法被消除乾淨的）在此一幻想具有和諧共景之未來的社會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呢？它有一個表面上堅固的外殼，和一個實際上可以並也躁動不息地通往任何彼方的內在。

另一個吸引我的要素是，投資狂熱（如果最後破滅就更明顯）往往緊密聯繫著參與者對於社會現實的理解和接受。不僅個體需要經由特定的抽象模型去想像並相信一個有待被完成的願景，而且也至少需要肯認足夠的人也同樣會「當真」。所有的這些投機熱事件的高潮過後，人們都會稱之為「騙局」，反映出一種和「真」的模稜兩可的關係。如果我們將這些「騙局」視為真實/真相的拷貝，儘管存在種種變形，但在人們的深層感受上，這些拷貝往往可能比我們對「現實」說得出的認識更真實。近兩年，中國大陸有種新類型的電話詐騙，詐騙者除了以中年男性的權威嗓音說出「喂」，佯裝生氣「你連我也聽不出來？」，幾乎不提供任何內容，卻屢屢能夠成功，無疑是成功地再現並進一步抽象了具體的性別/階序情境。另外，在地域廣闊、急速變遷的當代中國社會，「虛構」本身是一種重要的力量，很多時候離現實亦只有一步之遙。有一位浙江商人（也是本文田野場址安城人），在本地因資金鏈斷裂和經營不善選擇逃亡，不久在中國內地某省，以浙商身份和

光伏（新能源）投資計畫，成功換得大量工業用地和銀行貸款，迅即東山再起，如今資產甚至倍於從前。這類故事絕非孤例，幻夢和現實之間的距離是如此之小，也使得幻夢本身變得愈發可欲。在這些夢現實或現實夢當中，人們擁有一些打包和糾結的心智特徵，探索這種糾結的情感、記憶和認知固節，會引我們通向更深的彼此纏結的歷史。就像今天中國官方流行詞，「中國夢」，儘管它生而空洞，卻竟準確捕捉了人們以亢奮的心情回避難解的現實焦慮的微妙心態，「中國夢」就是字面意義上的夢現實/現實夢，而這種「險峻的亢奮」則提供了通往歷史深處的機會。

當夢想破滅（即被貼上「騙局」的標籤）時，投機熱事件又將提供另外一種類型的現實指引。並將通往與承諾牢籠的對立，承諾意味著在具期承性質的未來建構下，及與此有關的經濟和金融活動，人們只能投入參與，而無法想像另類生活，在這一「清醒」時刻，各式各樣的承諾都變得可疑或顯得無意義。如果當代中國人變成尋求答案者，會帶來什麼影響呢？會大多程度上改變原先給定的歷史邏輯呢？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正在發生中的認識活動，連結著中國起飛帶來的諸多辛酸苦辣的感覺。前述所引的各種新聞媒體上可見及不可見的地方事件，相比於中國之「大」與異質性，或者可被稱為「小型泡沫破裂」。如果依照Anagnost（2013）的奇跡世代（*miracle generation*）和後奇跡世代（*post-miracle generation*）的概念，描述東亞地區的離岸工業鏈轉移及其引發的歷史性後果，不同代人的生命機遇及其想像生命前景的方式截然不同，或許可以部分解釋當代中國人何以如此激情式地為自我驅動與焦慮所捕捉。也許我們也可以期待，一旦人們突然性地意識到奇跡期已永久的結束，或者彼時社會的機遇已不再能和人們往常對於社會及個體未來的動態變化的期待相符合，會發生什麼呢？另一方面，

假如中國大陸的行動者能夠由此意識到必須進行生命/生命政治意義上的重整方能夠「過渡」到可期待的未來，又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歷史的走向呢？在這些「小型泡沫破裂」當中，都多少能見端倪。

正當我在臺灣的求學經歷刺激我去關注經濟活動的不穩定內核和人們身處期間對未來的變動所懷的盲視，並也將生命前景建立在此種盲視之上時，在一個與我有極大關聯的地方，這種泡沫破裂既喧嘩又悄然地發生了<sup>6</sup>。

### 研究源起

安城是中國浙江省某沿海重要城市下的縣級市，位於甬台之間，南北部各有一出海口，面積約 1843 平方公里，人口 58.55 萬。距今三年前，我的一位好友買了安城新開發帶戶外游泳池的商品房社區的期房<sup>7</sup>。不久，由於此前地方標會倒會引發的倒債潮，以及全國性穩定房價調控政策的出臺，安城的房價驟然急跌，由最高點 11000-13000 元每平方米，徑直跌破 8000 元每平方米，迄今未有起色。就在該社區的房產銷售中心，人們開始圍聚起來，目測近百人，手持標語，打砸銷售中心內的展示模型，日夜堅守徘徊不去。因為急凍的房產形勢，該社區已緊急出臺新的銷售方案，房價也降去不少。這些人大都是此前已購買期房的買房者，他們要求房價維繫原位，或地產商提供補償性方案，否則就要持續阻撓銷售中心的運作。我過去時，詢問這麼多人聚集會否改變地產公司的做法呢？銷售人員則很有信心，一副波瀾不驚的樣子。我又去問我的朋友，他表示自己不會去參與，這是合同都寫好的，有什麼辦法，「之前賺錢的時候，怎麼不分給地產商一點？」。那些因價格墜降而感錯愕的人（此前若干年，人們則篤定「有買到就

---

<sup>6</sup> 安城的標會倒會發生在 2010 年，而正在我寫作本文的 2014 年底，溫州洞頭再次發生大規模倒會，涉及人數已經愈萬。

<sup>7</sup> 期房指未經竣工驗收已經取得房地產權證的商品房，消費者在購買時簽訂預售合同。

賺到」)，不正是我想尋覓的有幻念破滅經驗的人嗎？在這一特殊時刻，表面上看，我的朋友，地產公司的銷售人員或許信奉市場原則和契約精神，因而既不會參與抗議者團體，同時也理所應當地無視著抗議者團體的訴求，另一些人則在巨大的錯愕中，想像出某個具體的責任人，即確定新的銷售方案的開發商（以及必然延伸性的，背後有維穩壓力和土地價值共謀訴求的地方政府）來承擔責任，此二類人有截然不同的行動選擇和理解該事件的方式。但同時的，仿佛有著某種更大的相似，即無論如何他們都必須咽下這一苦果。這種苦澀的感覺無法脫離此前種種對因著房價驟升而暴富的人事傳奇的欣羨。房地產商的日子亦不好過。此前陸續投入地產業的安城諸種實業老闆，此刻叫苦不迭，抱怨「每日付出去的銀行利息就頂得上一輛奔馳<sup>8</sup>」。房產市場一旦趨冷，銀行貸款就成了甩不掉的抽血管。

然而在安城，這些圍聚抗議的新商品房的購買人，不過是地下經濟崩潰的週邊受害者。整個坍塌的核心是由 08 年之後歐美消費市場萎縮帶來的外貿經濟停滯，國有銀行體系為刺激經濟復蘇過度釋放流動性，各階層各職業人群狂熱投入標會活動等一系列資金活動的去實體化特徵帶來的短期投機繁榮引發的。那些與此中心直接相關的人，避免不了企業破產、資產抵賣的結果，而這些年在地下資金鏈中活躍著的天量資金，隨著倒債的發生，仿佛一夜蒸發。備受炒作的郊區小產權房的市場價格幾乎腰斬。安城等待法拍<sup>9</sup>的房產數以千計，據聞這些房產的鑰匙幾乎堆滿了安城地方法院專門儲放的房間，人們焦慮地運作各種關係，盡可能使和自己相關的房產較早拍賣。這些房產大都流拍三次亦無人問津。假非因法

---

<sup>8</sup> 也即台譯賓士

<sup>9</sup> 當債務人（業主）無力履行按揭合約或無法清償債務時，而被債權人經由各種司法程式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將債務人名下房屋拍賣，以拍賣所得價金滿足債權。2014 年，由於浙江積壓的法拍房實在太多，開始嘗試線上拍賣。據 2014 年 7 月的報導，「記者發現，近期淘寶網上司法拍卖數量不斷有刷新上升趨勢。7 月 25 日下午 1 點，相比前一天，拍賣品增加了 119 宗，其中房產增加 102 宗。而記者 6 月底在該平臺看到，房產數為 19772 宗，一個月的時間，「法拍房」數量增加了 4972 宗。」

<http://news.dichan.sina.com.cn/2014/07/26/1168847.html>

拍程式執行得遲緩，一旦一齊投入市場，引發的結果更難想像。幾乎在同一段時間內，全國陸續又有多地出現嚴重的城市危機，鄂爾多斯神話一夕崩盤，多地都出現大範圍群眾集資事件，各種企業的老闆因資金鏈斷裂出逃等新聞，伴隨著記者走訪各地拍攝的「鬼城」<sup>10</sup>照片，一時瀰漫網路。安城的經濟崩塌無疑也是全國範圍內這些看似各有原因的事件的其中一個例證，並也顯然是當前強國崛起、大國外交背景之餘的一處小型縮影。這些事件和中國引以為傲的發展和治理模式的關係為何？又將多大程度上改變地方社會對經濟發展的理解呢？會給黨國體制提出何種意義，何種程度上的挑戰？

#### 標會和前人研究

如果鄂爾多斯的投機興衰系于礦產，安城則系於標會。標會又稱互助會、抬會、兌會、輪會、排會等，其運轉的核心規則是，由一名會頭起會或者叫會，邀請 10 至 15 名會腳，每月定期繳交約定好數額的款項，每期由有資金需求的人競標，願意出更高借款利息的人獲得當期的全部會款。會頭往往可無息獲得第一期的會款，當全部的會腳都各領過一次後，會即告結束。越早競標的會腳，此後須得繳納利息的期數也越多，而越往後的會腳，往往可以收穫不少利息。此外，則根據繳納利息的方式不同（扣除或者累加），週期長短（每日一會，或每月一會），有利息或是無利息，更注重金錢關係還是彼此的倫理連結，有不同的變形，往往有在地特色。標會在安城有悠久的歷史，實際上也分佈於世界各地，烏干達、肯雅、土耳其、越南、印尼、日本等等，是歷史極為悠久，分佈廣袤，變種繁多，同時也極有利於小額資本積累的經濟組織方式（Geertz 1956；Ardener 1996），在

---

<sup>10</sup> 也稱「空城」，「睡城」，晚近中國急速城市化產生的大量新興開發區與樓盤幾乎無人居住的現象，與此伴生的還有中國近 20 萬億規模地方債問題，有報導製作「2014 鬼城指數排行榜」，[http://house.ifeng.com/detail/2014\\_10\\_12/50060123\\_0.shtml](http://house.ifeng.com/detail/2014_10_12/50060123_0.shtml)

英文中一般統稱為 ROSCAs (輪轉儲蓄和信貸組織 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Ardener 將之定義為「一個由核心參與者組成的組織，他們週期性地為基金提供資金，這筆資金將在每一輪全部或者部分的為個別參與者所用」<sup>11</sup>。美國早年也有不少白人標會，後逐漸轉變為私人銀行。在中國，廣西、貴州、福建、浙江、江蘇都有關於標會的報導。臺灣同樣標會曾經極為盛行，海外華人移民亦多利用標會。據蔡欣怡整理 (2002；2013)，費孝通在《江村經濟》中的調查，「人們相信互助會的典型用處就是資助婚喪大事的禮儀需求……入會者也認為自己是出於父系親情的責任在幫助組織者。「只要有一個合適的名目，組織者就會去找親戚：叔伯、兄弟、姐夫、妹夫、舅、丈人等，這些人都有責任入會」。即使他們無法認捐，他們也會找些自己的親戚來替代」。多數研究者顯然也認同將標會視為傳統社會道德經濟的一部分，「人類學家柯利弗德·格爾茨指出：「……如果沒有群體成員間的高度信任，這類自助集資組織無法存在……如果缺乏社會資本，即在完全無組織的城市地區，任何人都無法想像這類民眾自助集資組織會成功發揮作用。」由此可見，傳統社會中的「合會」可被視為憑藉高度社會信任支撐的一種社會經濟現象」(邱建新 2005)。安城的標會在不同歷史階段有不同的特點，其發展、變化和擴散，交織了中國的雙重現代性(社會主義和後社會主義)帶來的影響，並也隨著 90 年代中後期中國城鄉空間的巨大轉變而擴散性地發展至安城全境(詳見「金錢改變了人？」一章)。在 2008 年前後，則進入全民皆「標」的狂熱狀態，成為投射地方社會的物質欲望、暴富渴求、投機焦慮的主要載體。

我主要參考兩本注重社會調查方法的標會研究著作。一本是以 90 年代的福

---

<sup>11</sup> 本人翻譯，原文為「an association formed upon a core of participants who make regular contributions to a fund which is given in whole or in part to each contributor in turn」

建省作為主要田野場址，欲揭示政治管制和市場經濟活力關係，並也著重注意到標會的性別現象的蔡欣怡的《後街金融：中國的私營企業主》（2002；2013）。另一本則以 2005 年的江蘇崇川鎮為主要田野場址，整理了全方位的訪問材料，以「信任」關係和文化的維繫、濫用、破滅為分析主軸，邱建新的《信任文化的斷裂——對崇川鎮民間「標會」的研究》（2005）。前一本書有助於我理清，地方治理和民間金融的關係如何在 8-90 年代的特殊轉型背景之下被形塑出來，並為何始終帶著彼時期的歷史痕跡。後一本書則提供了足以彌補我的田野訪談局限的諸多材料，使我能夠將個案更好地和整體社會變遷結合起來理解。與這兩個研究相比，發生於 2010 年的安城倒會在時序上更為晚近，行動者的心智狀態，對其所身處的貧富愈加不均，機會越來越集中的社會狀況的理解，均有了根本性的不同，讀者可以結合這三個時期的調查材料，對經濟活動中的衝突在歷史中逐漸浮現作躍出單篇研究限制的進一步理解。同時，我的訪談和田調主要在 2014 年春天完成，較之倒會發生已過去數年，這帶來了利弊兩方面的影響。不利之處當然在於人們的情感、認知和生活狀態已較從利息瘋狂高企到一夕崩盤的最激烈時期有很大變化。有利處也是基於同一理由，使我有機會從此種後災難狀態下，看到人們是在什麼樣的社會情境下去面對或者無法面對災難的挑戰，又嘗試了哪些行動去維繫生命之繼起，也使我最終能夠在文章的分析 and 結論上延伸出了標會的範圍。同時我也參考了一些經濟學有關這一時期中國借貸和民間融資情況的研究。總之，這篇文章的側重點不在於經濟組織本身，而在於人們如何由更廣的社會多重性脈絡，不同的生命史經歷，經由標會形成物質性的，同時也是情感性的，具有潛在平等意味的社會聯繫。換言之，我將標會還原為人與人在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動態連結，並也隨時反映、重寫、並且改造著與此相關的諸多社會情境。

基於同一研究視角，本文也將提出一分析性概念「麻將」經濟，以涵蓋從標會到傳銷、六合彩等接連不斷地盛行于安城並具投機性意味的經濟活動變形。這種表面上看起來急速的轉變，不僅是個人發展延續其生命的迫切動力所在，而且顯然的，也與今日世界的經濟重整有著緊密關聯。據 Anna Tsing (2009) 對晚近資本主義的分析，生產鏈 (production chains) 往往經由並也復興原已存在的種種社會區隔和支配機制，將跨國企業的生產與管理成本轉移至經濟活動的構成性外部 (constitutive outside)，持續性地尋找並且不斷將不同的利基 (niche) 整合進產業鏈，最終對勞動者施加自我剝削 (self-exploitation) 和超剝削 (super-exploitation)。同樣的分析可以被用來理解從中國國有銀行體系不斷釋放流動性到在地社會的個人、企業和地下借貸市場的資本鏈 (capital chain)，以及為何這種信貸流動性如此緊密地連結了新興社會關係 (new social connections) 的不斷生成和破裂。在表面上純粹的經濟領域中，受國家經濟調控影響而迫切希望釋放流動性的國有銀行依託土地和房產抵押品以控制不良信貸。而在正式金融體系的外部，有成長潛力同時也有風險的中小企業難以獲得貸款，但大量的新興郊區拆遷農民和有房城鎮居民獲得了貸款，這又進一步催生了高息高風險的地下借貸市場。標會的活躍與覆滅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標會這一傳統道德經濟的產物成了國有金融體系的構成性外部。不過，標會的意義並不僅在於提供某種資本活動的場域，它的核心不那麼順應于商業文明的傳統，相反，倫理、情感、及其社會內生的對時間性的獨特理解等等非理性特徵，都須從更寬廣、正在發生中的歷史感覺去理解。也只有結合它們，才能進一步解釋，標會—傳銷—六合彩何以具有時序上的接續性。人們又是如何從這種接續性的生命經歷發展出對更大範圍內的時空轉變的理解。

## 研究背景

本文所要分析的安城標會現象，其基本背景主要可以分為五個層次，它們彼此在各自不同的歷史感覺和空間維度下運行，有著各自不同的目標和策略，並也不斷對彼此產生影響。其一，中國自 2001 年底正式加入 WTO 之後，在世界經濟中的位置趨趨重要，開始被冠以「世界工廠」的稱號，對世界經濟的生產和消費、原材料市場和資本流動都帶來巨大影響，中國生產、美國消費是這一時期的突出現象。在 08 年以後，中國開始尋求建立並完善內需市場。其二，中國黨國體制越過一切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 90 年代，在 2002 年後經領導班子換屆，進入被稱為胡溫體制的十年。在這十年中，中共體制面臨經濟過熱和尋求軟著落的挑戰。為刺激經濟保持目標增速而推動的全國範圍的基礎建設計劃，試圖推動社會公平和城鄉平衡的「新農村」、「新農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等計劃，以及伴隨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群體性事件數目暴漲而誕生的「維穩」體制，是這一階段國家治理方向的顯著特點。其三，浙江省以民營外貿導向為主的經濟在 08 年前後經歷從過熱到萎縮的轉變，開始尋求經濟轉型升級。伴隨銀行金融業的快速成熟以及本地及周邊房地產市場的崛起，浙江資本開始從實業到資本運作，從省內到省外的轉移。以「溫州炒房團」為代表的浙江投機客形象開始聞名于全國。其四，90 年代末之後，安城縣歷經數次行政區劃的重新調整，將核心區域劃定為三個街道，自北而南，涵蓋境內甬台溫沿線的主要城區，並推出整浚城區水道、建設調蓄池（以此為中心建設新城區）以進一步推動城市化的長期計劃。圍繞著新的建設藍圖，老城區以北的原有土地和村落，在此期間歷經拆遷和土地重劃，原本在此區域內的農民的主要生產和生活方式亦隨之被改變。其五，從 03 年到

05 年前後開始，安城本地社會開始熱衷於在縣城新城區、寧波、杭州、上海和北京等地購置房產，購買新宅的性質和用途也由之前的自居開始變化，各個不同階層和職業的人開始因房產市場價格的急升而進一步分化。房產市場的蓬勃，加上本地民營經濟資金趨緊，新的借貸方式和借貸關係開始不斷出現。易言之，實體經濟不容易賺到錢的同時，房產土地等資產的價格卻經歷了飛速增長。安城 08-10 年前後的標會熱，人人參與標會的熱鬧，又在 10 年遭遇標會的大規模倒會的嚴酷，即大致上處於上述時期。

## 研究概述

自 2014 年 3 月至 2014 年 5 月，我在浙江省安城進行田野調查，深度訪談人數 20 餘人。訪談對象的範圍包括：不同參與程度和地位的會頭與會腳、村幹部、政府官員、員警、銀行員工、企業家、小額貸款公司老闆、民間借貸中間人等，另外也聽取了許多本地親友的意見。期間查閱了本地政府不同機構的開放檔案，觀察場址包括：政府辦公樓、城中村、前會堂、會所、債務糾紛資產、開發商樓盤、店面房、居民住所、診所等。最主要的報導人和資料來源，分別是曾長期參與標會活動並仍陷於倒會後續債務問題的竺歡萍和她以日記改寫並於網路出版的《錢殤》一書。由於涉及到法律、債務糾紛、地方政府等方方面面的問題，除竺歡萍外，本文中所有出現的人物均為化名。竺歡萍本人因為在網路上公開她的日記，在安城的許多人眼中已聞名遐邇，加上她以自己的方式持續探索著標會的方方面面，實已很不同於一般對於報導人與研究論文關係的理解。她既是我的報導人，也是我的研究同伴。如採用化名，也不便於讀者通過她的作品進一步瞭解安城標會的全方位細節。在她公開的日記中已出現的真名人物，我亦重新改以假

名，引用會出現部分與原文不符的地方。考慮到訪談時間冗長、方言和口語甚多、部分訪談不便出示錄音筆時皆以手寫筆記代替，文中引用的報導人的語言，主要來自於基本符合原貌的重新整理，並不和報導人本人的表述逐字對應。

在論文的第一章中，「金錢改變了人？」，將主要討論金錢的流動和轉移，如何體現了價值的交換轉移，進而帶來人的生命狀況的改變，這在特殊的時空連結下有何具體的表現，如何借此來理解不同歷史階段下的標會在動態社會變遷中的延伸性意義。第二章，「從地方主義到地方社會」，主要討論黨國體制的地方主義治理策略，如何最終導致安城地下經濟和資金流動極為活躍，以及晚近的造城運動和巨幅城市化如何既改變了標會的農村道德經濟基礎，又為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擴張機遇。第三章，「女性間的團結與支配」，討論安城的標會突出的性別現象（即八成以上的活躍參與者皆為女性），以及在何種特定的社會脈絡和情境下，產生出和金錢活動高度相關的特殊性別展演。第四章，「「麻將」經濟」，主要從個人史的視角，討論在新自由主義治理之下，是否產生了新的人以及對傳統社會聯繫的新的理解，這種新的人和活躍的賭博投機經濟的關係為何。

## 第一章 金錢改變了人？

那天夜裏，時間約莫八、九點鐘，被人厭惡著的房產交易仲介人，驅車帶我經黃濛濛的道路進 T 村。

「賣房子的人，希望我們夜裏去看，以免引很多人來看。」「嗯。」我應道。

然而，這一謹慎舉止被證明是徒勞的。每當我們探訪一戶住家，附近的人仿佛即刻感受到似的，半遮半掩地自窗戶背後、街角陸續探出目光。這是因為他們住所比鄰，聲息相聞，也由於此處居民原大都是同一山村的村民，彼此之間，親屬、同事、同學、朋友等關係相互重疊，並也同時地遭遇地下經濟資金鏈斷裂，受其波及無法收回借款、住家地產價值急墜的經濟困境。

於是這些目光，既探尋、又思索，既暴露、又掩飾地，從其他角度和我一同打量眼前外觀奢美張揚，而今仿佛蒙上一層灰翳的住家。這些目光同樣留意著我，這一夜晚隨仲介人突然到訪的來客，似乎于此刻突然站在了多重價值評估者的位置：房子的外觀裝飾、住戶的起伏經歷、這個村莊的環境等等<sup>12</sup>。顯然的，對於其他視線探尋者而言，並不難感覺到，他們鄰居的諸多曾在各種節慶日和日常生活展露出來的情感、記憶、未及完成的生命期許，那些曾緊緊與此處待售房產相連的，此刻卻很難進入到外來交易者眼中。什麼東西消失了的感覺，不曾因著夜色的掩飾而停止蔓延。這是更親近的人的悲劇，與更疏遠的人的喜劇同時上演的時刻。我感覺，其他人對於屬於本村一員的仲介人的厭惡又增添了幾分，金錢在此刻也充分地展現出它暴力性的一面。

從「希望我們夜裏去看」提醒我要更「謹慎體貼」地進入這一移民村開始，

---

<sup>12</sup> 風水的考慮變成有趣的仲介，購房者往往也在乎打聽售房者的經歷始末，但這種考慮，有時使經濟不利者的位置更形劣勢。

那天晚上似乎註定將思緒起伏，情感多變。

### 尋找出路的痛苦

圍繞著我的研究場址——安城，發生的借貸暴富和倒債潮牽連的，房地產交易/抵押、資金借貸、多種形式的勞務/投資等經濟活動的核心，是不純粹經濟的，這最體現於失敗帶來的種種痛苦中。看得到、聽得到的各種「痛苦」，以及面對此的諸多有效無效的嘗試，有助於設想安城表面看上去純粹的金錢活動，在什麼樣的包裹下方能流暢、快速的運動。我在此處用痛苦指的是，經由對特定生命情境的瞭解亦能夠共感到的作用於個體身心、也必然地將影響人的行動的不可抗拒、關乎生命繼起，且在市場獨佔論述之下必須為個體及家戶承受的壓力。

一個例子是想賣房子卻仍想居住的老婦人。在 T 村見到她的時候，她正從地穴般的房間裏鑽出來，午時的陽光讓她身後的房間顯得格外昏暗。室外的空地上放著一些農具，離此處不遠的一些尚未建成房子的地基上，種著蔬菜。房內沒有任何裝飾，之所以很暗，是由於四面都塗上了灰色的水泥，在房間中間有些老家俱。在幾位帶頭反抗整體搬遷方案的村裏人被投進監獄後不久，這位老婦人也隨之被搬遷到這一處城郊。T 村是一個典型的政府拆遷安置村，村民幾乎皆為安城西部山區的農民，後因政府規劃並興修大型水庫，原先生活所處傍溪山林，將作為供給安城所處浙江省內某重要城市市民的飲用水源地，而被整體搬遷至安城城郊。儘管地價顯著提升，然而建房子卻須花費不少積蓄，對於部分農村家庭而言是沉重的負擔。因而，在安城的不少此類拆遷安置社區中，都可以看到這類近乎家徒四壁的住宅。與此錯落並置的，同一處社區中常有不少住家從外觀、庭院到內部裝修皆極盡奢華，居住面積可達到 500-1000 平方米，多為本村實力人士

(有時則為利益相關的地方官員)，或者前述無錢建房者轉賣土地給安城的富裕人群。這種土地以及伴生資源的分隔和重整，與上述強制拆遷一事，均屬同一在地社會的權力背景。

「太好了，你們是來買房子的嗎？」

「我這處房子很好的，不是多空板<sup>13</sup>……」

不多時，「你們買了之後，可否仍讓我住這裏？我反正也住不久的。」話畢，目帶可憐地望著我們。

「瘋婆子，別理她，這她說了也不算。」仲介人迅即氣上眉梢。

可能覺得真的沒有辦法，又或者自感理虧，老婦人隨後以我們都聽得見的聲音喃喃自語：「如果不讓我住，我也沒辦法了，房子肯定要賣的。到時候我就和村裏其他人那樣，搬到山裏去。」

我感到十分驚奇，因為聽說之前搬遷是為了興建水庫，現在老房子、老村落應早已在水下泡了好幾年了，如何回得去呢？後來我在 T 村裏打聽，知道在水庫邊上仍有未淹沒的山頂，上面保有植被，現又搬回去一些老人，無自來水也無電力，生活極其艱困。這些山頂本也屬於水庫保護飲用水資源的範圍，但畢竟「政府也不好管」。假如這處房產真有人要，又或者遲遲無法售出，直到地方法院查封並履行法拍程序，總之一段日子之後，這位我遇見的老婦人，很可能成為那些老人中的一員。對這些老人而言，這或許也可被視作是一種久已熟悉的生活方式和物質性聯繫的回歸。當地村民說，這對於其他較為年輕或久居城鎮的失房者來說，是絕不可行的出路。但就某種意義上來說，對於化解「倒債潮」與城市化帶來的身心創傷而言，或許也可能是最好的選擇？——既拒絕了金錢，也拒絕了城

---

<sup>13</sup> 要購買此類農民自建屋，建築工藝及其反映出的建房投入水準，分為兩大類，較差一類為「多空板」，較好一類為一體澆築。多空板為較落後工藝，晚近建房已多不採用，亦不為購房者所喜。

市？

隨著強制性的空間重整，個人遭遇了仿佛只有重回「無水無電」的傳統生活方式方能化解的物質性痛苦。由於中國長期的城鄉區隔政策，農民存在各種資源的全方位短缺，在此一基礎上以經濟發展為導向的城市化之社會後果原已十分可疑，在近 20 年的歷史之餘，仍無法自行「城市化」的農民，例如，我所碰到的這位獨居的老婦人，或許更是在農村中所享資源最劣者，但在此刻幾乎被一股直接的強力驅使，其直接目的在於重整、重新利用他們的原本的生活空間。T 村具吊詭性的不幸之處在於，為了減低搬遷方案致使的抵觸情緒，政府補償性地改變了重劃補充土地的性質，從集體土地轉為國有土地，如此雖然 T 村仍屬於拆遷安置社區，但房產皆屬於完整產權，可以直接作為抵押物從銀行借款。此時，安城民間資金奇缺利息頗高，以 T 村國有土地性質的房產抵押，比照當時的市場價值，可獲得一筆不菲的銀行借款，村民轉手將之放人民間借貸市場，利息收益甚至倍於打工收入，一時生活變得頗為奢逸。捲入期間的農民，既耗盡了此前的有限積蓄，也被「有價」的房子所捆綁。放棄出外打工，以房子作為抵押品，選擇成為地下經濟食利者的一員是毫不奇怪的。但不久之後，2010 年因標會倒會引發的倒債潮影響所及，這些放債收息用的銀行貸款盡皆白日蒸發，T 村馬上變成受地方經濟泡沫破裂影響最深的地區之一。據地方財稅檔案，此後若干年內，T 村將近 2/3 的房產轉手（總戶數 1293 戶，1969 間，用地面積 106303.45 平方米，交易戶次 804 戶，建築面積 177982.84 平方米），許多農民變成失房者，部分逃亡在外，部分租房渡日，部分回歸山林。

這些行動者（T 村農民）對地下資金鏈的投入——從原先的外出打工者，大異於刻板印象地一躍成為安城民間中小企業企業主的放貸人，並同時地成為國有

銀行體系化解直接放貸風險的承擔者，這一突兀嵌入村民們生命歷史的短暫又動盪的經歷，實為既造成區隔又試圖重組，受發展迷思所羈有所見有所不見的政府權力施為的直接產物。這些行動者近乎被強力驅使地完成對他們而言困難重重的任務（例如，這位老婦人，雖然終於不是「多空板建屋」，但顯然地不再有餘力添置與新屋相匹配的室內用品），也根本地破壞了部分村民原已習慣亦難以也不必重新選擇的物質生存/生活方式，以及與世代久居的地理環境的複雜連結。新社區內零星散佈的菜地，山林間新出現的聚居區，都是對這種不計後果的外來強力的視覺可見的彈性回應。而更加難見的影響，則將持續作用於人們的身心深處，一如面臨失房之根本困窘的老婦人，只收穫「瘋婆子」的嘲諷一般。

第二個例子是依賴著電視機的中年女人。在她的家中，在一長串痛苦地讓她掉眼淚的自述之後，她提到了被人提告造成的巨大心理壓力，並且感到自己的名譽受損。在心理深受創傷的階段，她益發依賴起電視機。電視經常徹夜開著，自己則陷入到近乎木然的狀態。然而電視播放的不少內容卻是她不願意看到的。

「我不想看到講現在的生活、經濟的電視劇，遇到了就會換掉。時代劇都在講如何用錢，如何買房買車，看見了就會想別人生活得這麼好，我心理很不好受。」

「那剩下的選擇會很有限嗎？」我問。

「有很多抗戰劇，我愛看，也很多的。」

這是一位看上去頗有風采的女士，儘管處於資金匱乏中，然而頭髮燙染出大弧度，披著與發色相襯的深綠色外套，還帶著祖母綠式樣的首飾。所以可想而知，她或許一直對電視呈現出的，仿佛經由物質積累、經濟成功與金錢消費即能享有的感官經驗，以及由此種感官經驗的比較彰顯出的豐裕和匱乏，該有超出一般人的敏銳。電視既在特殊的人生階段，變成了她面對創痛時的慰藉，同時也對她造

成了困擾——「誘惑」脫離了對未來更好生活的可能性的必要願景之後，變得不再受歡迎。然而，此種充滿著心理動員效應的感官衝擊，顯然不會是此刻方才作用到她身上（像她仿佛突然感受出的那樣）。與前一個例子相比，這位女士生來就是城裏人，因而未曾經歷過老婦人隨拆遷所經歷的那樣一種物質生活方式的斷裂。然而經由電視機呈現的圍繞著個人的感官競賽，卻不曾因其手中掌握的經濟機會的多寡而有一日斷絕。跟此種動機相連結的金錢活動，關聯於強烈渴望更多感官經驗同時又放射性地投向複雜生命情境的欲望，這種感官性痛苦或預期並努力去消滅轉移的不自覺動力，成了無所不在、也難以掙脫的重要背景。

第三個例子是一位 T 村的老村支書<sup>14</sup>。對於搬遷至城郊後，T 村發生的種種情況，聚賭和放債，他慨然概括道：「人心變了，不那麼團結了」，並為我舉例。

5、60 年代以前，地處安城西部山區의 T 村，多山寡地，人均耕地有限，屬於安城最為貧困的地區之一。而後該村一位村民在縣城招待所，與 Y 鄉村民同處一室，知悉 Y 鄉原有圍海作塘的計畫，可惜人手不夠。不久之後，消息傳回，人多地少的 T 村和為海澇所苦的 Y 鄉一拍即合。村幹部動員全體村民集體參與圍塘建設。作為酬勞，T 村獲得了圍塘新開闢的土地的其中一部分，極大改善了原本不充裕的經濟條件，成了安城最早擺脫「貧困村」帽子的典範。顯然這一事例帶著社會主義時期的諸多時代特徵，基層農村具有相當的自主性，社會普遍的資訊隔絕，產權制度未經確立等等。不過，老書記總結，最為關鍵的原因，在於「心齊」。

「那麼現在呢？」我問，老人繼續舉例。

多年以前，T 村裏有一位村民因參軍離開安城，參加抗美援朝，而後退伍轉

---

<sup>14</sup> T 村實為原先三處自然村合併而成的新安置社區的名字，該位報導人為其中一個村的前任村支書。在此之前，村民亦習慣于以同一名稱概括這三處彼此相接、關係緊密的村落，我亦都以 T 村涵括。

業，住在四川。為支援村裏的經濟建設，便居中聯絡，使 T 村有機會長年為這位村民工作的某國營自行車廠生產車把手。而後村子搬遷至安城城郊，地價抬升，村內要確定分配方案，適逢這位老村民年逾古稀，想落葉歸根，村民們卻不願意為他單獨分一塊地基（大致寬 6-8 米，長 10-16 米）。老村支書為此頗不平，感慨村民不思報恩。

老村支書所舉例的這兩個故事跨越了社會經濟背景差別極大的兩個時期，這種社會轉變又很迅捷，本文諸多報導人（五十餘歲）的生命經歷即經歷了此種跨越。對於要清楚解釋這兩個事件而言，老人所持的「心齊」論不免過於簡單。然而其背後，社會團結與否和人心好壞的二分，卻凸顯了該報導人面對社會變遷、嘗試統整性地理解生命經驗的倫理性焦慮，與前述二者相仿，亦可以稱之為倫理性痛苦。在其核心，是有如這位無法實現其落葉歸根願望的老兵般，根據以往老兵為村裏人基於道義幫扶或鄉里親情已經施以的幫助，T 村村民仿佛應有某種類型的道德義務為其做特殊的或至少等同於一般村民的資源看顧，然而一旦土地市場價值被金錢精準裁定，以及被金錢的持續積累、躍升作為支配性達至身心全面幸福途徑的基本預設影響所及，這一道德責任無論如何便要付之闕如了。儘管，至少對老村支書而言，此種倫理性折損帶來的情感/認知影響頗不易平復，但此種「不平靜」與前述金錢的根本改變並扭轉價值體系的潛能之間的關係可能是多重性的。一方面，人們固然也會為此種涉及倫理道義原則的價值斷裂、翻轉感到憂慮，另一方面對多數人而言也更可能是對持續浮現、轉移中的，基於市場經濟活動背景的新價值的進一步確認。

此處所舉的三個「痛苦」的例子，對身心實作的影響或強或弱，特點也不完全相同，並與倒會/債事件有著不同的因果關係。儘管在倒會過後，它們更為凸

顯，卻很難將它們簡單地視為倒債或者經濟失敗的結果，它們只有在與此前的生命與集體歷史的強烈的延續性及仿佛不得不面臨的不延續間才有意義。易言之，並非只因為倒債導致的經濟與社會壓力，這些痛苦才產生；相反，物質性、感官性和倫理性的痛苦，或其仿佛必然要從可以經由經濟實作而不斷緩解的假像中被戳穿的焦慮，既在倒會/債後猛然地、爆發性地出現，也早已潛伏於此前種種追逐金錢的病態熱望中了。

而對於不願意分一處地基給老兵的 T 村村民而言，數年後房價暴跌，大量房產轉移到他人名下的結果，完全是諷刺性的。

## 變化的標會

安城急於想要投入地下經濟食利鏈的多數人，最後都選擇了標會。隨著參與者的改變，標會也在不斷發生著變化。作為地方社會傳統道德經濟體系的一環，標會不只是金錢輪轉的物質性工具，同時也是維繫特定親族、友誼等社會關係的信用與人情流轉的倫理性工具。標會變化的歷史，因而不可避免地既反映了經濟環境的變化，也反映了地方社會的道德世界和價值體系的變化。安城的標會歷史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由於調查訪談的局限，我也參考了除了安城之外，有關中國其他地區的標會研究和報導的資料，並會加以說明。也因為這個緣故，這個歷史分期，並不能真正反映在安城一地或更大範圍內標會作為一種主要的活躍於城鄉之間的經濟互助組織，在 1950 年代中國黨國體制開始治理實踐並也於 70 年代末期逐步轉入市場經濟階段的詳細變化。

第一個階段，1950 年代及以前，代表研究，費孝通的《江村經濟》（1939；2002）。由特定組織者（即會頭）發起，若干人參與，每期籌措一筆個人難以通

過直接借貸獲得的資金，並分期繳納歸還付以利息，儘管有諸多變形，這一輪轉儲蓄與信貸組織的核心規則，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幾乎沒有變化。多數時候，標會往往只圍繞一紙會單運作，會單縱列為所有參會者的姓名，橫列為期數，期間的空格則填寫每期的得標者和繳納的會錢，訪談過程中我也收藏了許多會單，幾乎沒有區別。

費孝通分析，「這種互助會，經常是由於某人需要經濟援助而發起組成的。參加互助會的會員被認為是對組織者的幫助。按以上的描述的辦法，每個人似乎都輪流得到好處。但我們必須記住，投資的機會有限，借一筆款並付利息，可能是不經濟的……所以組織者不能只強調他們在經濟上會得到什麼好處，而**必須說他自己需要經濟上的幫助**。因此，會員通常只限于某些有義務幫助組織者的人或一些為了其他目的自願參加的人。」費孝通進一步說明，對自己經濟上需要幫助的說明，往往局限於婚喪嫁娶，而不是生產性的。「叔伯、兄弟、姐夫、妹夫、舅父、丈人等」男性親屬是這種互助會的主要參與者。有時稍微遠一些的人也會參加標會，「被這個社區公認為有錢的人，為了表示慷慨或免受公眾輿論的指責，他們將回應有正當理由的求援。例如，周加入了十多個互助會，他的聲譽也因此有很大提高。」

在《江村經濟》一書互助會章節中，費孝通記錄了當地流行的三種會的形式。最為流行的是搖會，顧名思義，搖是搖骰子的搖，骰子搖出數目最大者為每期的得款人，得款人並也負責宴席招待當日的來客。第二種為據聞傳自安徽的徽會，「這個會的收款次序，及每個會員繳納的款數，均事先規定……因而也方便計算」。第三種稱為廣東票會，來源於廣東，「所有存款人自報一個希望在會上收款的數目，報數最低的人為收款人。存款余錢減去收款人的款數後，在會員中平分。

在村子裏，此種會不很普遍，向我提供材料的人告訴我，這種方式的賭博性質太重。」

實際上這三種方式，與現在普遍被稱為「標會」的會都有很大的不同。標會最主要的在於會款要「標」，所有參與者匿名投標，願出利息最高者得當期會款，為能夠今早得到會款，亟需資金者往往開出驚人的利息，參與者所出的總利息高於借款數額亦不稀奇。80年代以來的各地倒會的報導中，幾乎都是標會。而費孝通以1939年在江蘇農村的調查所看到的這三種會，就算是被認為「賭博性質太重」的廣東票會，也不具有此種具利息陡增潛力的特性。將其命名為互助會是恰如其分的。根據訪談資料，由於年齡的限制，絕大多數報導人都不曾在解放前參與過會的活動，但在安城，此前流行的會就分為兩個大類，一個是「排會」，類似于費孝通記錄的徽會，一切利息（當然也是很低的）和次序皆事先規定，一個是「標會」，即要匿名出標，但據訪談，似乎此時大家顯然亦不熱衷於通過標會的形式收取高額利息，而主要是農閒時分，大家湊趣碰碰運氣帶有一些遊戲的色彩，希望有時能以很低的代價獲得借款。

第二個階段，在安城約莫產生於1950-70年代，人們一般也稱之為「互助會」。主要變化是參與者多數為女性，並延續至今。以至於今天在安城絕大多數人的記憶中，會仿佛特指是女性的發明。會的分佈主要分為農村的會，和城鎮以工廠車間為單位的會。這超出了原先主要依託於鄉村社會和父系親緣關係的範圍，標誌著全新的社會聯繫——車間或單位中的同事和工友同樣也可以利用會。城鎮中的會的核心圍繞單位和居住地，對很多人來說此二者涉及到的人群往往又是重疊的。同時標會作為仲介，有助於使原先在工作場址內的勞動關係，更進一步深化為社會再生產領域裏的全方位聯繫。標會的意涵當然也隨之發生了變化，「標」

的性質削弱了，往往不會標，一般都是無息借貸，輪流使用，都變成了「排會」。也反映此時非常緩慢、以生產為主的經濟活動以及在生產大隊或單位制等多種背景之下，人們更加強烈地依賴於人際聯繫。「當時絕大多數安城人家裏，就算在城關裏也是一樣，大都是沒有鎖的，每家都沒有什麼東西，不需要鎖，只有少數人家是有鎖的，他們是不會參加會的。會都是窮人之間互相幫扶用的。主要就是，比如在車間裏面，大家知道了哪位人家裏的情況不好，關係要好的就湊在一起成一個會，幫助他/她渡過難關。」

以 90 年代中後期的福建作為主要研究場址的蔡欣怡（2002；2013），看到了會的參與者主要轉為女性的現象，「在革命前的中國，入會以男性為中心的傾向，是與當時統轄社會與經濟交往的父系規範相一致的；然而如今，互助會在婦女中比在男性中更為流行。」

蔡欣怡認為，其中一個原因和偷渡的地方傳統有關。以福建省長樂縣為例，「長樂是福建非法偷渡的主要來源地，其中就發生了 1993 年運載 286 人企圖偷渡美國的臭名昭著的黃金冒險號貨輪事件<sup>15</sup>。」，而在當地參會者中，近 73% 參會是為了償還「蛇頭」的債。「送一位親人去海外，成本可能高達 5 萬美元，雖然現行的價格似乎在 3 萬—四萬美元之間。福州的人會者每月交 100-1000 元；在長樂，每月的會份子可能高達 1 萬元。……雖然尚無現成的非法偷渡者的統計材料，我採訪的人異口同聲地稱，出境的移民 90% 多為男性：「航程會拖上 9 個月，許多男人還活不下來，所以婦女肯定熬不過船上那麼多時間……條件那麼惡劣，有時會發生暴力事件。」長樂的婦女一般都留下來，靠組織大型的互助會去

---

<sup>15</sup> 2014 年五月，被稱為「蛇頭之母」，也是黃金冒險號事件的責任人鄭翠萍因胰腺癌死於獄中，成為北美華人中的重要事件。「當鄭翠萍被判刑的消息傳回老家，許多村民表示願意代其服刑」，具體報導見：<http://www.nbweekly.com/news/china/201406/36851.aspx>。該報導主要參考 Patrick Radden Keefe 寫的，*The Snakehead: An Epic Tale of the Chinatown Underworld and the American Dream*

資助丈夫、兒子和其他男性親人的偷渡費用，並承擔巨額現金交易所帶來的風險。」

如果把視角擴延到長樂之外，導致標會當中的性別差異的翻轉的原因可能更為複雜。蔡欣怡提供了詳細的分析，以下簡略概述要點：其一是福建南部，勤婆娘嫁懶丈夫傳統習俗極為盛行，那裏的婦女傳統上就在經濟生產上起著更活躍的作用；其二是利用官方機構存在結構性限制，婦女有較高的文盲率，或不具備被認可的抵押品，官方金融機構的資金中 70% 貸給了男性；其三是中國社會的性別文化的對於兩性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有分工，比如女性更容易從事編織、刺繡等手工業活動，同理「中國的婦女有可能比男人更會組織互助會，因為她們比男人擁有了更強的人際互信度和更強烈的社區感」；其四女性一旦結婚之後，離開村莊去接受教育或者追求其他就業形式就不如男人有優勢，這種低流動性使她們更能夠做出可信的承諾；其五，具 Judd 在 1980 年代華北的人類學研究，「一種「女性化」的政治經濟氣候正在形成」，女性在婦聯或其他政治組織之外，表現出某種突出的主動性；其六，參加互助會並且管理金錢需要很多時間成本，女性有更多的時間和耐心來節省多餘的零錢；其七，有時是家戶或者男性需要用錢，但為了不折損面子（特別是進入一個主要由女性控制的網路），就讓他們的妻子出面。

不過根據 Shirley Ardener（1996），女性逐漸控制了會及類似的民間儲蓄信貸（ROSCAs）組織，似乎是 20 世紀後半葉出現的，特別是在發展中和欠發展國家的全球化現象。相關的研究也呈現了非常不同的面貌，比如肯雅的婦女在彼此之間形成類似於會的組織，可以有效防止家戶中的男性侵佔和濫用她們的收入，馬來西亞的婦女也主要掌控了家庭的現金收入（James Scott 1985;2007），等等。總之，具體的原因可能依據在地社會的地方歷史而有極大的差異，但似乎存

在著一種普遍的文化氣氛，將女性的身體和社會性別依照當代經濟原則加以重整和利用，使之不止成為生產領域下的具體勞動力，也成為以家戶為單位的經濟活動的廣泛、全方位的參與者，這使得標會這一在中國延續千年以上的經濟組織形式，在晚近悄然地為女性所掌控，也為理解近三十年，在中國不同的地域，標會的一再反復興衰、周而復始、破又再興，提供了重要的背景。

第三個階段，70年代末至80年代晚期，市場活動復蘇，農村和城市緊密連接的標會。1990年，也即1989年發生全安城範圍內的大規模倒會之後，安城地方政府開始設立清理標會辦公室，簡稱清會辦。據一位曾參與這一時期清會辦工作的地方幹部所述，可以將此時的情況概括為「城裏人聽鄉下人哄」，意思是說，很多的會都以農村為根據地，會頭多在農村生活，只有「很低的文化水準」，然而卻將許多在單位工作的城裏人發展成為標會的參與者，大量的資金也隨之從城關流向農村。這一「城市倒流農村」的現象，脫離不了在改革開放前期，中國農村，尤其是沿海省份農村在經濟活動上具空前主動性的背景。也由於此時標會開始跨地域運作，相比於前述兩個時期，標會緊緊依附於人際流動極為有限的特定具親密性的團體內，標會所具有的倫理意涵肯定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圍繞著「標」的遊戲性、投機性重新出現，同時以女性網路為載體的特徵進一步鞏固。80年代安城標會的親歷者皆表示八成以上參與者都為女性。

伴隨著會在更廣泛的跨地區、移動人口中的擴張，會頭的信用變得越來越重要，這種信用體現為會頭有沒有能力和意願去「管起來」，管得住。會頭既需要為逃會致使的缺漏資金負責，也要負責對會腳的多種形式的控制（比如瞭解其資金需求、生活習慣等等）。會的特殊的倫理和情感意義變得單薄（儘管會中的成員之間仍大都具有親密的關係），金錢和利息的成分佔據了上風。這極大地改變

了會的原形，既使它成為高速變遷中的社會的重要融資工具，也使參與會的風險和意義變得和此前截然不同。與此同時，會頭的角色變得越來越重要，相對於會的其他成員而言，會頭和其他會員/腳之間的關係變得越來越不透明。這在某種程度上，又加劇了人們對於少數有雄厚實力的會頭的依賴，也使這些受到信賴和支持的會頭很快的從各行各業向純粹金錢運作的方向轉移。

其時，一份 1990 年安城工商局的調查材料表明，絕大多數資金最後並未流入投資領域，而是用於滿足個人對於消費的需求，而這種消費又多數同建房、婚嫁有關，屬於傳統社會「辦大事」的範疇。另一檔案說明，1989 年（安城 80 年代標會發展的頂峰），安城的電風扇銷量較之往年倍增。在許多有關標會的經濟學論文中，都將以標會為代表的非正式金融組織和以國有銀行為代表的正式金融組織對立起來，並也往往隱射了國家—市場的二元結構，從而把標會固定為民間自發的經濟合作組織，或者滿足生產領域的資金籌措需求的民間融資工具，這種視角頗為盛行，但卻容易忽視消費這一重要事實。關注消費的重要性還體現在，會的內在聯繫固然跨越出了原先牢固的人際網路，附著其上的倫理意涵也大為變化，然而從會中得到的資金的使用卻未脫離傳統父系社會下人們對於社會再生產資源的攀比性展示，因而它也一定程度上反過來鞏固了父系道德話語下的實作。

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城裏人聽鄉下人哄」，或許有不限於標會活動的更寬廣的歷史影響，即在安城這樣的地方，城市化的倫理和文化內核反而是以鄉村為中心的。鄉村社會（有別於社會主義治理實踐下的城市）對於消費和經濟活動的文化解釋，也伴隨著標會的實作，跨越了原先的安城不同鄉村、城鄉之間的區隔，可被視作是伴隨著城鎮化、人的流動移居和城鄉邊際的消除帶來的大範圍的文化統整，或可稱之為「農村化」。此外，連接於此時消費潮流的裝飾、感官的展示

欲望，此後也以持續不斷呈現出豐富化和差異化的商品面貌，發展為標會的一大物欲特質。

第四階段，1990 年大規模倒會後，安城經歷經濟起飛。儘管安城在 1990 年遭遇了全境範圍內的解放後第一次大規模倒會，顯示出伴隨著會的盛行，過多的資金進入標會網路帶來的巨大風險，而且地方政府也從此時起設置了清會辦這一常規性機構，然而不久之後，伴隨著經濟飛躍和持續時間長達 20 餘年的城市化運動，加之此時正式金融體系對於民間資金需求的支援仍甚為薄弱，以及在性別、城市與農村、國營與民營經濟間有結構性偏倚，標會很快就恢復過來，並也快速造就了許多暴富傳奇。

1990 年倒會一定對後來安城標會的發展帶來深遠影響，一些人從此不再碰標會，一些人開始遠離安城的逃亡生活，另外有些人在這種震盪復起當中，成為後來標會中更重要的角色。毫無疑問此次標會倒會的經歷改變了許多人的生軌跡，代價殊為沉重，但不幸之處在於，在種種時空條件的限制之下，人們仿佛無法從這一失敗經驗中吸取足以降低社會代價、減輕標會不利影響的教訓。許多報導人認為，由於經歷過 1990 年的倒會風波，安城人悉知標會倒會終無法避免，而政府處置標會問題的種種掣肘亦同時曝露在安城人面前，導致此後參與標會的人變得更加自私，也更狡詐。

老周年逾 50 歲，我採訪他時，他在安城另外一處政府機構工作，不過在 1991 年安城地方政府剛成立清會辦時，他是最早抽調參加的人員之一。他說，1990 年倒會後，清會辦的工作面臨兩大難題。第一是會頭好抓，但標走會錢的會腳不好抓，此時絕大多數會款的虧空都是要去賭博、購買家用品等用途的部分會腳造成的，他們將錢一標了之，而後賴賬不還，或遠走他鄉。許多會頭本身也是受害

者，但其他會腳找不到這些人，但找得到會頭，發生了不少私自囚禁、拷打會頭的治安事件。第二是就算人能找到，錢往往追不回來，只能「時間換空間」，留待時間流逝，社會變遷，往常的債務糾紛和激烈情緒隨之慢慢平息。實際上安城清會辦後來的主要工作，就是組建了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庇護所」，限制了多數會頭的人身自由，同時也起到保護他們個人和家庭安全的目的（具體見第二章「從地方主義到地方社會」）。

到 2010 年安城標會發展到最高潮之前，不少會頭既知倒會終無法避免，一面非常積極地發展更多的人參與標會，一面暗地裏不斷轉移資金。另一些人以極高的利息將錢標進來，只吃進不拿出，等到倒會發生時，如果會頭已經逃跑，他和會頭之間的債務自然一筆勾銷，算下來不僅沒有損失，還有不少盈餘。

另外一些人篤定倒會是政府管控較嚴時的暫時現象，甚至在我訪談時，多數人表示倒會完全是政府干預的結果，如果政府不加干預，則安城的會就能繼續運轉，他們的錢也就有機會收回。歡萍也記錄了 2010 年夏天，安城地方政府剛剛開始干預時，眾人的心理反應：

這時的安城大環境說起「日日會」已是風聲鶴唳，大街小巷掛滿了各種標語，諸如：堅決打擊「日日會」犯罪活動，「日日會」是經濟犯罪……隨處可見，已有會頭一夜間攜鉅款逃跑，還有的借各種理由停會，結會，就算是正常運作的會，也會利益驅使說停就停，說倒就倒。不過抱阿q精神勝利法的人很多，大家還是抱著僥倖的心裏，以為像以前一樣過一陣政策松了，又會是老樣子，有會員笑說：「安城人不落會是不可能的，本來就是安城土特產，縣府只是心血來潮管一下，到時又像8幾年一樣，撿下一個爛攤子不管，讓老百姓自生自滅，還不是照樣落我們的會啊，否則怎麼重新站起來，其實每打擊一次，翻過來反而厲害。」還有人說：「等那7個會頭放出來，就好了。」也有消息靈通會員表示：「我親戚在公安局的，說這7個會頭暫時很難出來，公安局說是公安管，縣府說是縣府管，也搞不清到底該由誰管，反正管

的人肯定有香水的。」更有人說：「縣府官員、各局級幹部的親戚家屬早已把錢撤走了，老百姓被套住的多，等著死。」（竺歡萍 2013）

上述「土特產」、「有香水」等說法，說明安城地方常民理解標會活動，開始主導性地採用「管的邏輯」（政府不管就活，一管就死），地方政府的具體行政施為成為確定個人經濟理性和投機行為合理性的基礎。還有的則認為唯一能夠從倒會中重新站起的方法，就是繼續叫會。

老太太打開話閘子就停不下來：「陳懷仙一進印刷廠就跟著我，當時 19 歲，挺乖的，身前身後跟著很尊重我。她跟福寶結婚，生孩子，辦修理廠，買房子，做會頭，所有的事都跟我商量的，就像女兒一樣的。第一次倒會時，外面的人逼的緊，福寶根本不理她，還要離婚。懷仙每天吊著眼淚坐在我家裏，我也跟著為她著急。有好幾天飯也不吃，躺著不說話，我想會不會變成神經病，會不會去尋死覓活，越想越怕，又沒什麼好辦法，只能每天陪著她，勸導她。她說：「只要有錢就再叫會，一定能重新站起來。」我想也只有這樣了，問她需要多少錢攙會，她說多有多用的，少一點也能慢慢運作起來。（同上）

總之，經歷了 1990 年的倒會風波，以及地方政府不得不的初次干預的嘗試，標會仿佛被重新形塑了一遍，其影響所及，使標會在安城具備的道德經濟特徵進一步地變化。

上述四個階段的區分，並不為強調不同歷史階段之間截然區別，人們關於不同階段標會的歷史記憶也將直接影響到現下的實作。訪談中，很明顯的，對「標會」的稱呼也屬於不同記憶工程的一部分。例如，捲入標會程度更深者，面對如我這樣外人的詢問，更願意稱標會為「互助會」；而政府工作人員，更願意強調會中最具有投機性的「日日會」<sup>16</sup>；同時，在具體實作過程中，同一個標會也會摻雜不同的關係性的理解，有些會頭和會腳彼此之間是非常親近的朋友和親屬，

---

<sup>16</sup> 一般標會都是一月一期，日日會是一日一期，資金周轉得更快、更大，利息和風險也更高

有些則較為疏遠；另外，到會後，負債甚多的會頭/腳之間還會成立清償債務用的「退債會」。這種複雜交織的關係，不僅讓初入者，甚至長期捲入其中的報導人也不儘然能說清期間的關係。無疑的，這種多重性，投機性與倫理性在不同層面、不同實作情境下的交織，是標會持續具有活力，並且一度在社會轉型期獨樹一幟的重要原因。同時，會以及會的成員在歷史當下又不可能清晰預見未來，也通過此種動態、變異和多重性的實踐，人們不斷為自己與他人形塑出所身處的「新」社會。於是對會的歷史的解釋也必須是多重性的，那也才能更把握真實的歷史。

### 「轉」出神奇

安城人用「轉」來理解標會和利息間的關係。

安城標會最低年利率也大都在 1 毛（10%）以上（據 2015 年各國有銀行的存款利率，活期一般為 0.35%，定存為 3%，理財產品大都在 4-5% 左右），而其中高利率的標會，月利率就要在 1 毛到 2 毛之間。關於標會高利率的來源，不少報導人或他們從會頭或其他人那裏得到的解釋，大都相似，「只要在轉，就能錢生錢」或者「不轉，錢就是死的，轉起來就能吃利息」。當然，這些解釋都有意混淆了兩種不同形式的資金運轉和利益來源。其中之一是資金在標會內的會腳之間流轉，彼此根據自身資金需求的輕重緩急確定得標的位置/期數，為了能更早獲得資金，期間就產生了利息。第二種是「會套會」，往往是會頭套取了資金之後，前往週期更短、利息更高、資金更大的會，期間也產生了利息，但也須承擔更大的風險。對受「錢轉論」吸引加入的會腳而言，往往殊不知其加入的會中有不少其他會腳不過是空頭（會頭以另一人的名義拿走了當期的錢），又或者都是

想「死錢變活錢」，本身並沒有急迫的資金需求，最後會裏的錢大都會被會頭拿走，投入到另外一個或是高利貸或是高息標會食利鏈中，以賺取利差，也就是「吃會」。

沒人表會時，陳懷仙就以很低的利息吃會，也就是她自己拿去用了，這個是最好的辦法，不用跟人借，就能湊到錢。一般的會員需用錢時，每個人的心態差不多，都會跟她商討，她會趁機告訴你，哪個會員這一個月急需用錢，大概會出多少利息表會，聽的人總會比陳懷仙提供的消息高出一些，這樣無形提高了利息，然後陳懷仙再對另外的會員說：「這次是某某人表的會，（這某某人肯定是有實力的）我的會利息高，又穩當又有人表。」如果陳懷仙急需用錢，最常用的手段是，找個不常表會的會員代替她表會，迷惑別的會員。總之，有人要錢時，陳懷仙利用會員之間的競爭提高利息，美名其曰，為大家多賺錢，沒人表會時，利用會頭的便利撈外快。幾年下來，當我識破她的種種伎倆後，每次，我有會的日子，都會去看看，慢慢的她也感覺我不懷好意也許會戳穿她的把戲，所以多次跟我說：「你太忙不用來的，又不表會，看看也累，表好了我會告訴你的。」

……其實，前面的會都被陳懷仙假借各人的名義表走了，也就是我說過的「吃會」，因各會員之間聯繫的少，不明就裏還以為一直正常進行，所以任由陳懷仙一人操作控制，到了會滿時，一下子會有三、五人一起拿會錢，這時候陳懷仙處理的辦法有好多種，第一種，連本帶利全數支付會錢，對會員來說這是最好的結果。第二種，以下一個會的首會款抵擋前面的會錢，對陳懷仙來說這是後面的錢填前面的空缺。第三種，結賬後乾脆打個借條，對會員和陳懷仙來說是建立在互相信任基礎上的。第四種，以各種理由拖欠，給你安排以後的會款，把錢支配的差不多了，結些余錢給你。好多年了陳懷仙就是這樣在會裏轉圈生存的。（竺歡萍 2013）

然而「活錢」的這種曖昧不明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暢行無阻，如此之有能力強烈激起人們持續投入金錢的衝動，又關係到人們對於「死錢」的理解。

安城老一輩人都有藏錢在枕頭下的習慣，現在已難以確知此一習慣自何年何月產生並流傳至今。如今，在敬老院裏也可見許多老人將錢放在枕頭下。一方面

固然反映出過往的家庭儲蓄非常有限，恐怕也並非安城一地的風俗。另一方面，從今日的角度看，是否真能起到保護金錢的目的，也很可懷疑，實際上對家人也是無法隱瞞的。然而，在此種具前現代風貌的金錢儲蓄行為中，老人們非常慎重地打開枕頭，取用錢物並再一次放置停當，也一併再現了傳統生活中的金錢理念。期間，放置於枕頭下的錢，雖顯然的不具備充分的安全性，卻能帶給人就近監管的安全感，同樣是「死錢」，卻是以儲蓄為核心的物質生產和生活方式得以延續的關鍵。假如乃依託於此種金錢觀，標會金錢流轉的核心也必然地將側重於社會救濟、救急，而非風險投機。

然而，安城人理解的「死錢」，實必包含了對日益高企的通貨膨脹<sup>17</sup>的擔憂，是仿佛正不斷經歷貶值，而必須與信用/信貸捆綁才能免於快速流逝的錢。我在訪談過程中吃驚發現（實也或許大可不必驚訝），相當多數的安城人對經濟術語極為熟稔，以下記錄幾則事例：

一位並非主管經濟事務的安城地方幹部告訴我：「標會的問題，在於民間資金難流通，想借錢的借不到錢，想投資的也不知道錢該往那裏去，只要**國家金融改革不到位**，標會的問題還會一再發生。」並詳細為我說明安城民間借貸的政策背景。另有許多報導人表示：「一切都是四萬億<sup>18</sup>的問題，對經濟**下錯藥**」。竺歡萍回憶她做診所醫生的父親在 90 年代即預期，「錢現在緊，以後會松的」。安城的酒桌宴席，人們也非常喜歡討論最新經濟政策和經濟趨勢。如此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總之，通貨膨脹、民間資金、國家宏觀政策等這一類經濟術語，已經深入了在地社會的日常生活。只要翻開安城的地方報紙，《安城報》頭幾版幾乎都

---

<sup>17</sup> 許多人質疑中國官方有關通貨膨脹的統計資料長年被人為調低，如：「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副院長王曦在演講中表示，根據其估算，中國 2011 年的實際通貨膨脹水準達到了 14%，而官方資料才 5.4%；據他估算，中國 2013 年前 2 季度實際通貨膨脹率為 6.9%，而官方是 3.3%」，<http://money.163.com/13/1101/14/9CJODKG60025500P.html>

<sup>18</sup> 「4 萬億」是許多人對於中國政府為應對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機提出的擴大投資、穩定增長的綜合性經濟計畫的統稱。

是地方政府主要領導調研地方經濟，走訪不同的企業，提出經濟增長目標和辦法的報導。不僅上述關鍵字會一再出現，而且往往地方政府主要領導在任期內會提出具個人色彩的地方性經濟方針和口號，而地方媒體也會一再鼓動宣傳，這種動員的語彙有時帶著鮮明的軍事化色彩。這也不只是安城一地的現象。全國各級媒體均有責任持續不斷地向其所轄境內群眾，明確各級政府於一定時期內的經濟方針和規劃，並也往往既精練為一兩句口號，也伴以非常詳盡的說明和採訪報導。易言之，各級政府對經濟管理所使用的語彙，包括國家對貨幣進行量化管理及其相應的各種術語，準備金率、利率等，已經成為在地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背景，不少行動者對此種經濟管理者語彙知之甚詳。

另一事例是，我一般向報導人介紹自己所學的是「經濟社會學」，因而會對安城的標會現象感興趣，而報導人將我介紹給他們的朋友時，往往「誤」為「社會經濟學」。當人們知道我所學乃是「社會經濟學」後，也常抱著與我「切磋」的躍躍欲試的心情，討論他們最為喜愛的國內經濟學家，並也對我的研究計畫點評一二。

引我注意的是，使用這些語言的人常不自覺地站在經濟管理者的主體位置，將整體經濟發展的目標（國家或省市縣一級）視為理所當然，並馬上導向對投機機會的分析。儘管也常聽到人批評政府政策，卻使用著和類似的經濟語言，認為「官員不懂經濟」。並不意外的，這種思考和語言慣性有時顯得很純粹，很經濟，儘管人們並不缺乏對當前社會情況的批評。同時，這些話語背後的「市場神話」不可避免地也受到「黨國神話」的支持，或可以一併稱為「黨國市場神話」。例如，「政府不會讓房地產市場倒的」，就算自 2010 年以來，安城房地產市場始終一蹶不振，也未絲毫地改變人們的此種預期。雖然上述種種觀念和思考，在當前

中國社會環境下，不失為常民能動性的體現，並也確實包含了不少洞見（主要乃對中國政治體制的特點十分熟稔），然而至少在預言安城的經濟命運上，顯然失效了。

同時，近二三十年中經歷的經濟飛躍，一再驗證著儲蓄無法再作為不斷尋求更多資本積累的經濟工具。不斷加深了人們對於「死錢」的擔憂。總之，在這種氛圍下，人們似乎應該勇敢靠開顧慮，將資金投入到不斷飛騰、也將無限擴張的整體經濟事業中去，人們亦能理所應當地收穫在種種借貸/投資行為中暴漲的財富。「轉」和金錢「活死」論的背後，正是有著這樣的因素，人們使用著最經濟的語言，追逐和篤信著一種最不經濟的市場，並也由此發展出一整套行動者須自我動員或被動員的認知和情感經驗。這種主體位置的滑移和交錯，不僅正當化了投機的行動和其產生的暴利，而且也使不參與這場競逐的失敗者，處於雙重被貶低的位置，他們不僅在物質生活上失敗，而且也在黨國經濟/在地經濟的多重動員中也同樣失敗。

在標會最為盛行的時候，人們共同見證了一場奇觀。在大街上，中年女性們急急忙忙地從銀行取出錢，忙不迭地帶著裝錢的袋子趕路。更高規格的，坐豪華汽車，手提超大尺寸的名牌包，身邊伴以「小弟」（馬仔、保鏢）相隨。「你一看就知道她們是搞標會的」。一時蔚為風潮，舉城狂熱。對「轉」的極為抽象的理解，變為觸目可及的奔忙景象，此時，會頭亦勿用對「轉」作更多的解釋。當此種為轉而轉的忙碌變成了生活的常態，甚至超越了常人的心智慧力的範圍，金錢對人們的意義也發生了變化。大多數主要通過「會套會」的活動賺取利差的人，一天要趕十幾場至幾十場會不等，且日日如此，行程極為匆忙。時日一久，這些嘗試著火中取粟的人，也不免成為這一高速周轉下才能自我維繫的金錢體系的奴

隸。

歡萍還和我說過兩個故事。一個是某會頭收錢時，隨手將一個裝滿錢的麻袋放到桌子下，內有 10 萬元，但是沒過多久她自己就忘記了。直到後來打掃衛生時，本來清潔工人要當垃圾丟走，打開一看才發現滿滿都是錢。另一個是有一對男女，各自幫不同的大會頭跑會堂，收錢給錢，一來二去就相互熟悉了，相約之後碰面時有機會就做些手腳，私自截留下一筆，屢試不爽，直到後來其中一個會頭查看會堂的監控錄影才發覺。因而，不僅眾會腳無法知悉作為會的信用依託的會頭們究竟有多少債務，實際上連會頭自己也只是隱約感到已快大難臨頭，具體賬目早成了一筆糊塗賬，而這一切又更需要「轉」的掩飾。而越是如此，人們對於金錢便越是饑渴，會的次數更加頻繁，會的利息越來越高，被捲進其中的人也越來越多，各種大大小小的會的聯繫就越緊密，最終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而在前述經濟話語的籠罩性作用之下，身處期間的人們很少能有反思資源，相反，原有的差異性文化資源也大都經歷了重整。歡萍記述了下述故事：

楊飛娟忽然問我：「歡萍，你知道「唵嘛呢叭咪吽」是什麼意思嗎？」憑我知道的解釋給她們聽，這是六字真言，是觀音大士的名號。藏傳佛教名詞。從字面上解釋，六字真言是「如意寶啊，蓮花呦！」我們最熟悉的是因為濟公活佛常常會念這六字真言，很多人只是覺得好玩，但很少有人知道其意義。

楊飛娟又問：「那你能把他翻譯成英文嗎？」我當然不會。楊飛娟又問：「**所有的錢到我家裏來**，這一句的英文怎麼翻譯？」我試試：「all money go my home」楊飛娟很驚喜：「就是這句，你快幫我寫下來吧，要用中文的代白字注明，不然我和懷仙姐不會念的。也給陳懷仙和你自己各寫一張，放在上衣口袋裏，絕對有奇效。」（同上）

「所有的錢到我家裏來」反映出在會頭的日常生活中，金錢流動的中心位置帶來的特殊經驗。這種經驗也由具體的經由金錢連結的人與人之間活動的迫切動

勢、速度感，轉化為對金錢所有權、社會倫理責任的動態、模糊的理解感受。為會頭想像並捕捉她們的生活狀態，建立自我認同，提供了關鍵的材/質符號（Qualisign）。這種「所有的錢到我家裏來」式的金錢想像，和「轉」有著本質上的共通性，即一方面反映出標會中的金錢活動的流動特徵，另一方面又經由抽離出這種流動本身的流動感、速度感，顛覆了傳統意義上標會所蘊含的穩定甚至遲緩的人際聯繫。

### 災難發生時

前述第四個階段的安城標會，在 2010 年夏天崩盤，影響所及包括安城及其周邊若干縣市。金錢狂熱帶來的充實感，一夜間為恐懼替代。那年冬天，滿城蕭索，一則軼聞廣為流傳。

我在次年年節前後，親友聚會的飯桌上聽到這個恐怖故事，具體細節已不甚詳實。一名大學生放寒假返家，同一天稍早時候，父母聞訊有討債打手上門，急忙逃跑，不知何故，未及警訊其子。待兒子返回家中，被這些討債打手抓個正著。後為洩憤加恐嚇，用刀將該名大學生的手筋腳筋挑斷，棄置於深夜鬧市的街頭。

有關安城暴力逼債的記載還有很多。主要手法包括將事主帶至水庫邊恐嚇，以不留痕跡的方式拷問，限制事主或其親人的人身自由，破壞家戶住宅等等。如歡萍的記載：

「絕對不行，只有給我200萬才能完全解決問題。你不知道這幾天我已經被幾撥人輪流抓到薛畧浸海水，還綁到山上挨打……」陳懷仙哇的一聲大哭起來：「他們逼我還錢，把我帶到黃壇水庫僻靜處，脫了外衣，只剩胸罩和內褲，讓我照著他們寫好的遺書抄了一遍，然後讓我跳水自殺。」我遞給陳懷仙一張紙巾，她繼續哭訴：「有個小羅羅狠狠踢我一腳，我一下跪倒在那裏，這一刻我站起來馬上沖出去跳河，又被他們拉住了，告訴我其實是嚇我的,就是我死了，他們也不會放過

磊的。」（同上）

我自己也看過許多安城的法拍房，不少都有被破壞的痕跡，有的內部裝飾被完全鑿毀，垃圾遍地，屋外外牆上還被漆上「欠債還錢」之類的紅字。還有報導人和我說起逼債時綁架的套路，據說為了鑽法律的空子，綁了人之後不會放到什麼地方關住，而往往會派不同的車和人輪番帶著在高速路上轉。

上述這則廣為流傳的故事的具體真偽難以確考，不過在倒債發生後，家庭又再度變成核心，承受著倒會/債而來的各種暴力。這則軼聞，儘管許多人也表示細節不足為信，然而其在倒會發生後的安城四處散播，同時也是集體心理狀態的外在反映，極端的恐懼/暴力仿佛突然地降臨到家戶中，其結果則因人而異。

歡萍有一個讀小學兒子，已經是她現在生活中的重心，「我和兒子兩個人相依為命」，和我聊天時，她幾次表示之所以要將日記改寫出來，最重要的動機就是想給兒子看，希望他能夠從中吸取教訓。由於曾有算命先生說她命中無子，但一生富貴，如果強要兒子的話，這些富貴就會付諸東流。由於這個緣故，在其所面臨的經濟厄運和對兒子的未來的寄託之間，她始終覺得有著強烈的聯繫。歡萍還告訴我，如果以後兒子的職業可以選擇，她最希望他能夠做一名律師。所以我在看到上述記載的時候，特別能感到歡萍在遭遇經濟困境時，持續努力和抗爭的意義是非常複雜的。實際上她因此也對兒子的言行非常敏感，也與我分享她的兒子在這幾年中曾說過的「非常深刻的話」，我想兒子早熟的一面一定特別讓其內心感到五味雜陳。因為從近乎與世隔絕的桃花源被迫「無奈成長」，進入令人厭惡的人際環境，亦是她發展出的對於標會倒會後之創傷經驗的重要敘事。與此種對暴力的深遠影響的擔憂相比，上述「挑斷腳筋手筋」的故事明顯遠為直觀了。對不同的人來說，此種既直接又深遠、仿佛滲透性地連結著各式各樣的生命經驗

的暴力也帶來非常不同的結果。

以夫妻關係為例，在家庭財計破產之後，離婚的例子不甚枚舉。

……告訴大家這個叫鐘佳的女人53歲，是水利局的內退職工，老公是國家機關單位的公務人員，只有一個兒子在國外生活，平時夫妻恩恩愛愛的，還是鐘佳稍微強勢一些，因為家裏都是鐘佳作主，特別是錢的事，老公幾乎不管不問，這次錢沒了，追債的人多，也為了讓老公減輕負擔，她堅決假離婚，但離婚不離家，兩個人還是住在一起。前幾個月，鐘佳聽人說傳銷能賺很多錢，為還債就跟著朋友到山東去做什麼蟲草生意，結果一分錢沒賺，卻把老公搭進去了，有個35歲的離婚女人看上鐘佳老公，逮了個空擋，每天繞著不放手，非要嫁給他，還口口聲聲罵鐘佳是「第三者」，老公像只烏龜縮在那裏，兩頭騙兩頭不得罪，高興住哪兒就住哪兒，兩個女人為了爭這個男人，什麼法兒都變過了，就差拿刀子捅人。（同上）

但也有許多夫妻攜手的例子。在一次採訪過程中，有一對夫妻在倒會後嘗試了各種生意，現在開了家茶具店。男方的頭髮半邊黑半邊花白，顯然日夜操心，氣色比女方要差一些，然而氣定神閑，表面看起來非常安靜。一旦他開口時，他的妻子總是一臉馬上要準備接下去說的表情，也時常搶話，對女方的分析，男方雖不盡贊同，但也表現得很淡然，只要妻子說話，就自動讓到一邊，為我們倒茶水。我看兩個人相處仍非常的融洽，猜測其中一個重要的緣故，大概夫妻之間性格剛好互補，大概也對彼此的個性心存欣賞。一個搶一個讓，家裏的事情恐怕很難大吵起來。女方也對丈夫非常感激，「……主要你叔叔一直對我很好，也從來沒有怪我」，更讓我詫異的是，當問起因標會造成的債務情況時，她看了看丈夫，「我連你叔叔都從來沒有告訴過呢」。

一方面，當債務引發的種種問題爆發時，家戶和親友往往能夠提供最後的支撐，使捲入倒會風波的會頭/腳的生活能夠繼續維持，儘管許多人之所以承受這個負擔也並非心甘情願，某種程度上，恰恰是倒會/債帶來的各種暴力、心理創

傷、社會性斷裂等諸種施加在個體身上的痛苦，也成為他們收穫身邊人原諒和幫助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從一開始，相當多數的人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參加標會，也離不開對於「幸福生活」的設想，儘管這一設想已極大地為仿佛必然作為基礎條件的物質競比所扭曲。

如上述「鐘佳」的例子，丈夫是國家機關公務員，自己是國營單位職工，兒子在英國留學，生活條件絕對已超過平均水準。其參與標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攢錢在安城附近的城市買一座別墅，既不在於滿足日常生活所需，也並非為了賺大錢，而是希望比現在的生活更高一些。在安城標會中，鐘佳絕非孤例。相當部分的參與者本身有著遠比社會平均水準優越的多的物質條件，而他們孜孜以求的「幸福生活」的標準，也遠非社會中的多數人可以企及，也不會是多數普通人的現實目標。儘管如此，這一夢想卻足以吸引他們投入到高風險的金錢遊戲之中，不禁使人唏噓。在這些金錢衝動的背後，包含了社會的價值焦慮，特別是女性體現自我價值的訴求在不平等的社會文化和制度設計（中國實行差齡退休制度，一個家庭當中，女性往往比男性早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就離開工作崗位）中，往往無法得到滿足。在這種普遍的價值焦慮之中，金錢往往更因其特殊性成為人們支配性的追逐對象。而一旦倒會/債發生，金錢的數字積累仿佛又不再有之前的統攝性的威力，人們開始重審他們所身處的道德情境，儘管其結果往往是極端兩面的。

歡萍的記載，以及由此記載而幸運地為我們所見的倒會正發生時的情形，多交織了上述兩個不同的方向。回到一開始的問題，人們會在投機經濟的泡沫破裂之後，反思並且在特定的歷史契機之下，獲得嶄新的思考資源嗎？

有人說起菊仙姐為了填補陳懷仙的借款，忍痛把街面房低價轉賣了還債，她是第一個為了陳懷仙賣房子的人。我跟陳懷仙說起這事，陳懷

仙冷冷的說：「菊仙的錢倒在我這兒是稍微多一點，但外面老太婆（會頭）處也有的，她在別處的會蠻多的，她家開工廠的，有能力的，倒掉這麼點錢奧其笑（安城話，意為隨便她）。」我大吃一驚忿忿不平：「懷仙，你欠菊仙姐400多萬元啊，說的這麼輕巧，好像只欠她40元一樣，人家為了你傾家蕩產，你卻連一點點的愧疚感都沒有？你怎麼變得這麼沒良心了？」陳懷仙還是冷冷的：「竺歡萍，良心值多少錢？」（竺歡萍 2013）

在歡萍的日記中，有良心與否，好與壞，甚至主要角色歡萍（自己）以及懷仙之間的分合與差異，一直是不同場景之中的重要衝突元素。她接著寫道，「良心不是用錢來計算的，它是無價的，是永存於心底的一桿秤，是做人的良知。……我再一次試著幫陳滿仙答，良心不值一錢。」歡萍一直試圖用道德責任的二元對立來理解、敘述標會事件。

對這場主要圍繞著金錢流動的災難，竺歡萍命名為「錢殤」，殤在中文中意為未經成年而早夭，也指發生了巨大的災難時帶來的悲痛，她進一步解釋，「因為錢，此後我的生活陷入一團糟直至坍塌，因為錢，我看到了太多太多的眼淚怨恨和咒罵，因為錢，我看到人性中最醜陋的一面，因為錢，我經歷了明槍暗箭的夾擊，因為錢，我幾乎到了死無葬身之地，因為錢，我自嘲從做人到做狗，因為錢，我感受了家人和朋友的真情，因為錢，我想通了很多事，唯一值得自我安慰的是，我可以問心無愧是個正直的人，雖然事情辦的跟我預想中差距很大，並令所有人失望，但這兩年中我所有做過的事都對得起自己對得起良心」。

除了日記的公開內容外，讀者並不完全知道歡萍所經歷的「怨恨和咒罵」，以及「明槍暗箭」，何以使她必須自承「問心無愧是個正直的人」。但是這段最早發表的片段，清楚顯示出自感受到道德責備的人的心境，也相當程度上能夠解釋她之所以持續寫作，發佈並堅持使用部分真名的原因。她失去了很多東西，例如

財富和丈夫。但是那並不是她所感受到的壓力的終點。她仍處在被指責（或自我指責）的位置，生活狀態可能繼續下滑。有可能持續使她失去其他人的信任和關愛。如其它訪談揭示的，在這些年安城的氛圍中，假如參加標會損失了一大筆錢，你一般會聲稱自己是受害者，然而事實上，從那些和標會保持距離的人那裏很難得到同情。在主流話語中，標會參會者都是貪婪無知咎由自取之徒。在這種情況下，歡萍（以及其他標會的參會者、當事人）對標會敘事的道德化傾向，也往往使她本人陷入到反思和兩難之中。

## 總結

我在訪談過程中有不少人持這樣的看法：「都是錢造成的」，「人們有錢了，就沒有了精神生活」等等，這些說法都暗示了金錢對人的道德、德行的腐壞效果。或許也並不意外，我們對於「腐敗」這一類事情的傳統理解，都指向人（特別是倫理性）的活動一旦和金錢相連結，會引發災難性的結果。相對的，要避免這種結果，就需要把金錢和很多活動分開。Zeilizer（2005）總結了這種範式，稱之為「分離領域和敵意世界」（*separate spheres and hostile worlds*），這種思考范式傳統悠久影響深遠，人們認為經濟行為和親密關係屬於不同領域，相互聯繫時就會發生污染（*contamination*）和失序（*disorder*）。有的擔心金錢腐蝕親密關係，有的擔心親密關係污染經濟行為。總之對於經濟行為和親密關係之間，衝突的、無法共量的、不相協調的擔心由來已久。Zeilizer 進一步分析，在 20 世紀，這些論調從下述方面繼續汲取力量：首先，工業資本主義的批評者接納了工業理性正在驅逐團結（*solidarity*）的預設；其次，19 世紀以來的家庭意識形態（*ideology of domesticity*）深遠影響，認為女人和小孩要遠離危險的、男性的市場的侵害（儘

管有女權主義者對其批評，危險預設仍留存)。二戰後，資本主義發展，儘管出現了新的經濟組織形態，人們卻無對此前觀點的反思；最後，今天這種擔憂有許多和全球化、商品化和理性化相連結的更精緻的版本。

從這個角度看，標會的金錢運作顯然有著種種弊端。會的運作和金錢往來，大都靠一張會紙來記錄，多個會之後產生的複雜金錢關係，就逐漸缺乏了清晰的賬目；除了金錢關係外，參會的人之間有著多重的社會聯繫，由於這種親密性，很多時候金錢往來依靠口頭承諾，甚至免不了先斬後奏；缺乏有效的信用體系的支持，債務完全靠感覺來猜測，所以往往大大低估。如此一來，不僅錢容易出問題，而且人也跟著出問題（如，不斷加碼的騙局和種種藉口）。

然而在討論標會是否成熟的技術性分析外，更進一步思考標會中的金錢和人的關係，並沒有那麼簡單。那種複雜性不僅使標會變得脆弱，也使標會變得可以運作，或正是它的勃勃生機的來源。多數人固然是因為金錢而相互聯繫，也有不少人是為了和人產生聯繫，而依託於金錢關係。那些純粹為了騙取金錢和吸引其他人加入標會的行為，和為了增進或維繫和人的各種親密性聯繫而允諾、允許他人參加標會的行為，混合在了一起。歡萍告訴我，當 2010 年年初，意識到安城的標會已經到了最瘋狂的時候，她開始著手將大部分放在標會裏的資金抽回，這些先期抽回的資金，很大一部分還給了和她關係最為親密的一批人。然而這些人卻未領情，有的還大光其火。此外，許多參與標會的人，也並不只追求資金的積累可能，而還非常享受在不同的會之間活動的生活（詳見「第四章 麻將經濟」）。

顯然的，標會不僅是在地社會的資金動員，而且是社會動員，並且與社會正在經歷著的急速變遷有著同時性。很多時候，人們更投入這樣一種和變動中的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然而個人又有機會相當自主地、創造性地參與的社會活

動中去，而非僅僅將標會視為資金來源。仔細地考察人在參與標會過程（也可能是所有中國其他各種類型的投機性活動的共同特徵）所爆發出來的激烈的熱情，這一動態性、感染性的社會動員的意義往往還大過資金動員，並且極深地影響了不同程度捲入其中的人。在其運作核心處，並也提供了某種自我選擇的機會，新的自由借由標會的金錢和人的流轉源源不斷地產生出來。沒有這種個人身心層面上的自我動員，主動投入到對新的社會關係的想像和解釋，不僅金錢的廣泛流動和連結難以發生，今日安城在地社會的形態，不僅在物質景觀上，而且在社會聯繫上也必完全不同。標會在近三十年的特定歷史時期（或可稱之為經濟奇跡期），成為連結個人和社會的這種動態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在地仲介，考察其中金錢與人/物，人與人關係的種種複雜、多向往復的聯繫，也一定不能過於簡單。

此外，金錢的特殊重要性還在於它在價值體系中的關鍵性位置。不僅金錢有極大的潛能改造此前的社會，社會亦有相當的潛能改造金錢。在快速的社會變遷之中，不僅人們很難將經濟和金錢活動和人的其他活動妥善地區分開來，建立和尋找合適的區隔（*distinction*）或者補償（*compensation*），而且或許不經由金錢的這種普遍污染，人們反過來也無從在社會變遷中認知變化中的價值。已經有研究指出，在地社會不僅會挪用和改變金錢的物質性及附著在這種物質性上的符號意涵（如金錢上的圖案），而且也會依照其價值體系和道德經濟，改變作為符號系統的金錢，改變其仿佛終極性的，並為國家權力充分宰製的作為計量體系（*account system*）的價值，從而對金錢實現了再定義。

根據此前的經驗材料，個人在標會中的金錢運作須至少經歷三個層面的跨越，也將不同層面的物質性和社會性經由同一流動的金錢活動聯繫在一起。這三個層面是個人和家戶、個人和個人（家戶外），個人在不同的社會聯繫之間。在

金錢往復流動時，個人的主體位置亦往返於這三個層面之間，因而同時的具有不同的身份。有代表性的，分別可以是母親/妻子、朋友/老鄉/同事、會頭/會腳/套會利者。我用套會利者這個詞，來形容專門為「會套會」的利潤而廣泛參與、聯繫起不同的標會的人。金錢聯繫了這些不同的主體性位置，從而實現了價值的轉移/交換，反過來，價值的轉移/交換也使金錢的流動（及其何以能夠具有動態性的意義）具備了條件。通過這種金錢流動，人也變成了自身所處價值體系的積極參與者。特別在一個動態性的社會變遷中，人也挪用了金錢的多重意義（如，仿佛必須無限積累），為其改變自身原本被多重固定的生命位置與經濟命運提供了新的情境。

在「尋求出路的痛苦」中，金錢往往被賦予，或者人們試圖去相信金錢具有這樣一種偉力，能夠使人有能力面對生命在一個急速變化的社會中遭遇的種種物質性、感官性、倫理性痛苦。以至於，人本身成了這種金錢拜物（**money fetish**）信念的受害者，成了被捉弄的物件。在「轉出神奇」中，我們看到金錢作為關鍵性的價值表達手段，如何在整體經濟治理話語和邏輯的籠罩下，轉化為在地社會的價值競賽和價值流動的永恆不安/狂熱的因素。這種不安/狂熱，以及先天律令般的經濟增長邏輯，將原本不會產生聯繫的人與人，人與群之間串聯起來，也使處在此種變動狀態下的個人被迫發展出「金錢管理者」視野，重新俯視她/他原本被多重主體化機制交織共構出的位置，並進一步發現其所具有的再重組的潛能。在「災難發生時」，則又可以看到面對金錢債務帶來的暴力性，原本也許鬆散了的家戶、友誼等社會聯繫，在特殊的契機之下又獲得了重生，重新恢復了活力，而這原本是人們在經濟/金錢勝利的光環籠罩之下，儘管普遍地相信但未必能獲得的。

在上述意義上，金錢的流轉（以及特別是在標會內的輪轉）又如何改變，影響了人的狀態呢？或者說，儘管相當部分安城本地的報導人都認為金錢是一切問題的源頭，在這個簡化的判斷中，又有哪些因素可以被重新展開？

很矛盾的，表面上看起來，金錢在安城發生以標會為主要載體的投機狂熱中扮演了不可抗拒的力量，驅動人們調動一切資源參與到競逐當中，是金錢改變了人。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金錢不值一文，被棄若敝履，它們有的時候是永遠算不清的賬目上的一團亂麻，有的時候是瘋狂的消費中轉瞬即逝的過客，有的時候是被丟棄在旁無人問津的廢紙袋，如果這些具體現身著的金錢是「金錢本身」的話，顯然毫無力量可言。或許在「金錢改變了人」之外，重點還在於是在何種情境（如女性通過標會為家戶賺錢）之下，金錢仿佛突發性的有著關鍵的意義，隨著人的活動，這些有關鍵意義的金錢又如何串聯起來。這些「情境組合」又顯然的具有此時此地的特殊性，為安城的人們眼中種種有意義的生命活動提供了結構性的背景。

## 第二章 從地方主義到地方社會

### 不干預的地方政府

安城位於浙江省東部沿海，人口 58.55 萬，面積 1843 平方公里，其中陸地面積 1605 平方公里，海域面積 275 平方公里。耕地 34.7 萬畝，林地 162 萬畝，素有「七山二地一分田」之稱，森林覆蓋率達到 62.5%（安城人民政府網 2010），境內山海與旅遊資源較為豐富。1949 年建國後，由於處於不同市域的交界地帶，在行政管轄上曾屢次拆並。安城位於所處城市境內最南端，屬於市內較不發達地區。該市經濟發展水準素來北強南弱，北部以衝擊性平原地形為主，耕地廣闊，人口稠密，向北與長三角經濟核心地區緊密連接，南部則漸多山多海<sup>19</sup>，地理條件更近于溫州、福建。以語言來說，安城話介乎浙江省東北部和東南部之間，比所處市內其他地區發音更為更尖硬，安城人也以「XX 式的硬氣」自況<sup>20</sup>。由於安城境內地理條件與生產方式差別巨大，也有北、東部以漁業地區的勇悍豪快作風，西、南部以好客又心小（指內向、木訥）作風的區別。以安城標會的狀況來看，也以北部地方利息最高，出的大會頭也最多，資金多往此處移動，表現出在地文化因素的影響。

安城之所以能夠保存有標會發展的土壤，則和地方政府對非正式金融的不干預態度有關。以中國的改革開放歷程來看，浙江省有其特殊的政治經濟位置。儘管在官方敘事當中，經濟活力開始自意識形態變革的某個決定性時刻（例如，十一屆三中全會，或者鄧小平南巡講話），然而，實際情況卻是自發創新的社會經

<sup>19</sup> 由於此種地理原因，元明時期近二三十年，安城長期受倭寇和海盜的進犯，為受害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參見 <http://nh.cnnb.com.cn/gb/nhnews/weihua/node1563/userobject1ai244348.html>。

<sup>20</sup> 安城最為著名的歷史人物，為明初不為朱棣擬即位詔書遭「誅十族」之難的方孝孺，這是「硬氣」的歷史文化淵源，在地常民對此耳熟能詳。

濟活動往往先行突圍，面臨種種政策的堵截之後，仍然取得了經濟成功，官方的態度則歷經否定，曖昧，直至最終肯認。如科斯和王寧（2013）總結的，文革結束之後由政府主導的公有制經濟改革成效甚微，而作為推動 80 年代社會進步的重要改革力量，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鄉鎮企業與私營企業在一開始或相當長時間內都受來自政府的多方面抑制。它們的成功帶有鮮明的地域特徵。在這些地區中，中央政府控制的力量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地方政府出於解決貧困問題等需要，對本地創新也比較寬容。浙江和福建一道身處面對臺灣的戰略前線，中央政府不願意在此投入大量資源發展基礎設施和工業專案。浙江的民營經濟是在「三缺少」（缺少國家投資、缺少國家優惠政策、缺少陸域自然資源）下發展起來的（郭占恒 2012）。而在 90 年代，由個私經濟為主的市場主體建立起來之後，政府又利用其推動公有制領域的改革，吸納國企與集體企業的下崗員工和農村巨幅轉移勞動力，遂行其新自由主義邏輯。在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習近平接受採訪時表示：「在過去 20 多年裏，浙江的經濟總量在全國的次序從第 12 位上升到第四位<sup>21</sup>，從一個資源小省發展成為經濟大省，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民營經濟已成為改革開放的重要參與者和推動者……民營經濟在促進浙江省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上同樣功不可沒。浙江原本是一個陸域資源缺乏、工業基礎薄弱的農業省份」（梁玉驥、周景洛 2005）。2015 年 6 月，習近平再次來到浙江，強調浙江要在改革中發揮先行作用。本地官媒嘗試用詩意的語言進一步把浙江經驗納入到官方尚未完成的改革敘事當中，「浙江率先邁向現代化，關鍵在於繼續走在改革前列。……35 年，每一個第一，每一個前列，每一個首創，

---

<sup>21</sup> 2013 年的全國各省市 GDP 排名中，浙江以 37669 億美元排名第四，前三名分別為廣東、江蘇、山東，可參見網頁（<http://finance.takungpao.com/hgjj/q/2014/0317/2359088.html>），浙江的農民和城鎮居民收入僅次於北京、上海。

每一個突破，都是量度浙江改革走在前列的路碑，如此清晰，如此厚重，如此華美。……繼續走在前列，重中之重是再創浙江體制機制新優勢」（浙江線上 2013）。

這裏所謂浙江體制機制優勢，實證地指向浙江地方政府主動適應經濟變動的政治性格。具體表現為比較寬容地對待經濟活動發展中出現的不符合彼時國家政策規定的經濟金融形式和行為。在以溫州為代表的浙江地方政府與市場經濟關係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浙江屬於全國經濟改革的先行地區，即習提到的「改開推動者」角色。2012 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將溫州明確為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要求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構建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體系，使金融服務明顯改進，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能力明顯增強，金融環境明顯優化，為全國金融改革提供經驗」。一方面，國家治理的自上而下的邏輯在浙江具有另一種自下而上的創新回饋機制<sup>22</sup>，並不斷迫使地方官員親近並熟悉地方經濟事務，鼓勵他們有魄力做適應經濟發展變動的創新，同時這也減低了全國性改革的政治成本。安城前任縣委書記王劍侯（2008）著文表示：「基層是一本讀不完的「大書」，它蘊藏著無窮的智慧和創造力，值得我們領導幹部用一生的精力去研讀……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改變了我很多從書本上得來的「成見」，成了今後決策的重要依據。」另一方面，浙江政府的經濟治理表現和浙江的個私經濟特徵也借由全國的分區域框架性設計，形成一種以不/推動改革為目的的政治示範效應，經宣傳體系向中國其他地區越發清晰地傳遞並進一步形

---

<sup>22</sup>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在革命根據地建立過程中形成，有群眾路線等動員性政治的傳統，儘管在建國後趨於官僚化和行政化，漸漸喪失其政黨特性，然而這一領導權傳統對其能在 8-90 年代提出跨越既有國家治理論述和機制的創新，如一國兩制，提供了重要的社會脈絡性，具體分析可見項飆（2014）。也是在此歷史基礎上，被外界認為貫徹了習近平的意志，中共十八大又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概念，對其與實驗主義治理的關係分析，及對未來中國政治造成的影響，可參見崔之元（2014）。

塑了浙江的特殊性<sup>23</sup>。

隨著近 20 餘年「浙商」、「市場」、「民營經濟」、「溫州炒房客」等說法的不斷加強，在地區和全國層面的經濟論述上，出現了表面看甚為奇妙的權力鞏固與反轉，並在此基礎上正當化現有的政治生態。在浙江的地方社會，中央政策和來自中央的官員往往被視為是本地經濟發展的掣肘或災難性因素，並延續其敘事線索發展出各種與此掛鈎的經濟波動的政治解釋（「就是因為某官員，中國/某地的經濟才這麼糟」，「某某只是某派系或某類別下的幹部，之前只在某某地方任職過，根本不懂經濟」，「懂經濟的貪官，也比不懂瞎管的清官好」<sup>24</sup>）。另一方面，伴隨內地經濟活動趨於活躍（及浙江本地經濟的乏力），產業開始內陸化轉移，前往全國各地尋找投資機會的浙商往往額外具有某種政治展演價值，地方官員樂意公開接待浙商，給予其優惠政策，來展現其推動地方經濟進步的決心和開明態度<sup>25</sup>。甚至近幾年浙江省想要維繫其發展速度的一個重要策略是提出並貫徹「浙商回歸」。「過去 30 多年間，浙江人民敢為天下先，敢爭天下強，在全國各地為當地創造著 GDP 和財政收入以及**傳播市場經濟理念**，推動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2010 年末，浙江在全國各地（除浙江外，不包括港澳臺）經商辦企業的人員超過 600 萬……在浙江省外從事個體工商經營的浙江人已超過省內個體工

---

<sup>23</sup> 而在有的地區，對政府來說，維繫意識形態高壓姿態的重要性就高於經濟上的獲益，因而往往造成「自我實現」的效果。政治的警覺換來對經濟活動的抑制（及某種政治目的的強化），而脆弱的民間經濟又是滋生反抗情緒的溫床，結果這又印證/加強了某種刻板看法，帶來更高層面的幹預。當代中國政治是一個容納了差異化的治理經驗和治理慣性的範疇。

<sup>24</sup> 這裏的官員姓名皆非常具體，而清楚說出某個地方官的作為（而非僅誇談領導人）也是展現談話者社會地位的重要方式。田野過程中，幾乎隨時隨地可以聽到那些我們原本不預期有此類認知興趣的常民（例如普通務工者），發表對國家經濟金融政策和宏觀發展戰略的高見，這種自我的「國家經濟化」，蔚為奇觀。在第一章中，也有詳細論述。

<sup>25</sup> 在網路上搜索一些並不十分出名的浙商的姓名，很容易找到他們被內地特別是偏遠地區官員接待的報導。在安城，就能夠聽聞一些因資金鏈斷裂，逃亡外地，通過「欺騙」內地地方政府官員，成功東山再起的傳奇故事。不過，其實不僅是浙商受到這種優待，幾乎所有的外商、港商、台商都具有此種意義脈絡下的價值。在所有內地的商人或投資者中，相對山西或內蒙商人等，浙江人更具有某種草根的「市場性」。

商戶的從業人數」(浙江省統計研究與資訊發佈中心課題組 2012)。同時，浙江也是全國唯一 GNP 超過 GDP 的省份。僅從這裏看，國家好像在浙商面前失去了市場經濟方面的權威；但是反過來，浙商，同時其實也是全中國的經濟行動者，早已歷史地認識到中國經濟的實質乃是由十分複雜又往往自相(又交相)矛盾的制度和政策設計在不同的行業領域和地區切割開來的一塊塊邊界與內涵持續變動的圍地化區域(enclaved zone)，掌握此種臺面上不會講的知識才是「悶聲大發財」的法門。

欲尋求經濟成就的中央或地方政府必須協調和適應地方社會的經濟自主性有金融史原因。在原先國族主義化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金融活動等同於資本主義，因而在近 40 年的時間裏國內金融都受到高度壓制，而國外金融也被視為是資本主義毒瘤。因而，其後中國商業銀行業務的發展就要庇護于領導人對其社會價值的再解釋，並受國家宏觀發展戰略的牽引。鄧小平在 79 年說「讓銀行真正成為銀行」，預示了其後金融改革歷史中對商業化銀行組織的想像和由國家主導改革並控制的正式金融體系間的複雜關係。據金融史研究者分析，一直到 1998 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政府高層才強烈感到推動全面金融改革的緊迫(李利明、曾人雄 2007)。蔡欣怡(2013; 2002)在 1994 年至 2001 年，開展了在福建、浙江和河南多地的非正式金融的調查，她的經驗研究驗證了這樣一個事實(根據統計年鑒，至 2000 年，整個國家銀行系統提供給私營經濟的資金都不足 1%<sup>26</sup>)，中國的「經濟奇跡」所需要的資金通常都是由非正式而且經常是非法的金融業提供的。她進一步發現，在中國不同地區之間，非正式金融的多樣性和

---

<sup>26</sup> 根據 2008 年安城統計資料，這個比例是 1.57%，不過，實際上還是有更多數目的貸款最終流入到私營經濟領域，過去有帶「紅帽子」的辦法，現在更多依賴土地和房產抵押，而最新的年鑒不知出於何目的取消了這個分類。

數目存在著截然的差別，而這要歸結於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的傾向性，以及他們對這種「不尋常的制度偽裝」的容忍度。易言之，很長一段時間中，中國的正式金融系統對於私營經濟的支援都十分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假如某地希望維繫其經濟發展速度，那麼地方官員最好避免對非正式金融組織進行打擊。依賴於本地社會對於個體能擁有的金融權利的社會化建構及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種種非正式金融形式，中國經濟才獲得持久的動力。非正式金融不能簡單等同於國家控制之外的金融組織，其不/商業準則的具體特徵建立于本地社會道德經濟體系對價值的理解之上。本地官員也需要經由這一社會脈絡性，才能產生並解釋何以對非正式金融持不/干預的態度。

蔡欣怡的整體分析思路，是希望借由民間經濟活動和政府作為的關係，討論中國經濟發展何以在產權制度等十分薄弱的情況下獲得成就。因而其經驗比較的概念化方式，也更傾向於國家-社會二元關係之國家一端施為的可比較性，而較忽略異質性極大的河南、福建與浙江三地社會的不可比較性。當這個架構落實到對地方官員何以對非正式金融保持寬容態度時，其操作型分析也相應著眼於三個因素（尋租的機會；金融活動的可見性；干預的政治利益），並認為早期的不干預行為的一個重要動機是換取經濟利益。我並不否認這一觀察的真實性，然而卻認為這種觀點將地方幹部和本地社會的聯繫想像得過於孤立。地方幹部本身是一個群體，其中絕大多數和在地社會有千絲萬縷的聯繫<sup>27</sup>，他/她對於標會的不干預態度就不可能完全用一個行政官員的微觀權力實作邏輯去解釋。易言之，很可能的，之所以河南的地方官員相對不支援本地的非正式金融組織，其最根本也是直

---

<sup>27</sup> 這在中國有些地區會有所不同，僅以安城來說，8-90年代中絕大多數地方幹部的公務員認同是十分薄弱的，許多人辭職經商，或轉去國營企業工作，也不會面臨社會阻力，與今天情況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許多人只會說安城話，對書面語言的閱讀和寫作能力的掌握也十分有限，這種情況直到本世紀初才略有改觀。

接的原因，就在於這些非正式金融組織無法獲得在地社會的道德經濟體系提供的脈絡性（儘管就更複雜的因果解釋來說，這種脈絡性之所以消失又或得以保留，又離不開國家治理的作用）。國家權力在這個更深入的意義上一定要適應於社會，社會中的行動主體有國家權力技術永遠不能徹底穿透的不讓步一面。具諷刺意味又理所應當的，起先服膺於國家的公有制經濟意識形態而無法發展，隨後又扶持服務於國營企業、大型專案投資、國家安全戰略而在對個私經濟的支持上嚴重缺位的中國正式金融體系，卻使個私經濟活動背後的金錢組織與流動長期處於國家無法直接觸及的暗面，留下了地方社會依循其自身的社會史狀況發展經濟的空間，並間接性促使中央或地方政府不得不向下適應地方社會的經濟自主性。此外，之所以中國不同的區塊在經濟自主的基礎上能夠形成差異性的經濟特色，和中共在早期的社會主義實踐理念也有相當的關係。Vivienne Shue（1988）提出地方主義（localism）的說法，概括中共掌權早期嘗試現代化的方案受到中國社會原先的區域性生產與經濟結構，也包括中國所處國際環境的限制，而且毛澤東本人也不傾向於複製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方案，而較為提倡在每個地區發展有如革命根據地式的複合型、重複性的經濟。在這一區域性、破碎化的發展思路下，不斷強化了各個層級上的地方性。到 1949 年，歷經變遷震盪，許多在地社會（村鄉到縣市）的文化認同原已十分稀薄，但通過生產大隊、人民公社、發展縣域經濟等社會主義實踐，這種認同又重新凝聚，甚至變得更為封閉。因而，在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想像和理解中國不同地區之間的文化與資源區隔，以及彼此在經濟上的競爭性關係，並不能簡單地將「地方社會」和傳統中國連結起來，期間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發展實踐也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在上述中國晚近國家治理和長期中共執政邏輯的歷史脈絡下，安城的地方政

府一直對本地蓬勃的非正式金融形式其中也包括標會持無視態度<sup>28</sup>。在 2010 年倒會發生後，甚至要求本地司法部門拒絕受理與標會相牽涉的經濟糾紛（在當前法律下也很難受理），以至於許多纏結的債務問題迄今無法解決。1990 年，安城發生第一次全縣規模的倒會事件時，本地官員提出「會是安城的土特產」的說法，這一說法歷經 2010 年安城第二次全縣倒會事件，並一直影響至今。顯然，「土特產」並不是實證意義上的，儘管在本地常民中製造了這種誤解<sup>29</sup>，然而其真實意涵是旨在為地方政府為何無能也不願介入標會及標會倒會事件提供一種解釋。在這個意義上，「土特產」和「社會」、「素質」等概念在中國晚近社會中的進一步浮現、轉義與強化，依循於同一套邏輯。這一敘事框架將國家定位為行動力有限但是有正確目標的規範力量，又將社會定位為混亂與風險的源頭，同時不指出及掩蓋在何種政治治理下普通人在近三十年中盡皆變成自我驅動型的投機者，這迥異於中國共產黨此前的革命敘事與唯物史觀。在我的訪談中，幾乎所有標會的參與者都認為政府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職，也有不少人認為之所以政府不對標會進行干預又緣何在 2010 年的 8 月份才或突然進行干預，其背後必有「貪官故事」。然而，土特產的說法還是很容易就被本地社會接受了，在此基礎上，又發展出「20 年標會興起至倒會輪回說」（因為從 1990 到 2010 年，剛好是 20 年），這種觀點認為標會必將再次興旺。一方面，由於人們仍然離不開標會，在現今的社會金融狀況下，標會需求有其必然性<sup>30</sup>。另一方面，為上述更深層的國家治理的歷史脈

---

<sup>28</sup> 在近幾年又牽頭成立兼有政府和普通投資者股份的借貸公司，根據訪談，多數參與的投資者並不認為在這種與政府的合作形式下會有利可圖，但為搞好和地方政府的關係，「賣個面子，結個緣」。

<sup>29</sup> 大多數受訪者，當聽我說起標會不是只有安城才有，實際上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上都普遍存在時，都感到十分震驚。儘管不少人馬上經驗性地意識到標會可能具有的普遍意義，但仍然受到「土特產」解釋的影響，不禁將標會視為安城獨有的現象。

<sup>30</sup> 其實就算是在倒會期間，標會活動只是轉於沉寂，而非完全滅絕，標會有其分散性，風險不必然會連結。在我調查時（2014），僅耳聞與所見，就有數個標會在運作了。至於其未來，可能會極大地取決於中共金融治理的發展。

絡所影響，不少人也經驗性地感到，在今日中國，只有「土辦法」才是奏效的，只有「土豪」<sup>31</sup>才是成功的典範。這種「土」，由改革過程中國家對自身的治理能力與治理角色轉移的解釋，漸變為國家與社會間共謀、曖昧又衝突的知識/行動場域，因而也合理化了許多有違在地社會原本道德經濟內價值理解的現象。

安城人大都認為東北部漁業地區的人性格最為外放豪邁，也是市場經濟最為活躍的地區。相比于安城西部山區和南部城鎮，北部地方的人由於長期從事漁業，行走海上，也常兼營走私貿易，自有兇悍、勇敢、有一天過一天的氣概。在安城境內，他們也是愛買豪車、愛賭博、愛吃請的「土豪」典範。有北部本地詩歌雲：

#### 漁家謠

漁網肩頭掛/面孔眼淚爬/船到噸泗洋/心裏格外怕/一腳棺材裏/一腳棺材外。  
全家老小眼望吊/潮漲潮落長記掛/但願金磚銀磚滿船載/但願平風靜浪早歸家。

#### 漁民生活真難熬

漁民生活真難熬/一怕大風和大浪/二怕漁霸和強盜。  
夜困活龍床/日喝爛魚湯/身著千補百衲破衣裳。  
三寸板裏當天堂/三寸板外見閻王。

不少安城本地人認為，當這種在地文化和提倡經濟自主性而鮮少幹預的地方政府相結合，就成為滋生投機性地下經濟的溫床。他們說這兩首漁歌採錄地，安城北部的 X 山（名為山，卻靠海），在安城標會中出了最多的會頭。此種在地社

---

<sup>31</sup> 其字面意思原是指沒有文化的、割據一方的成功者，近來被（並不具太強諷刺意味地）普遍使用為，對當前中國成功人士的指認。

會道德世界的自我理解和區辨，結合「土」的概念，成為對標會活動的其中一個主流解釋。

## 城鎮化與地方金融

安城老城關地區面積很小，人口總共大概 1-2 萬人，近乎於雞犬相聞，「走在街上，是不是城關人大家都能認出來」。縣城絕大多數人口生活於鄉村地區，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的比例長期保持在 10:1，且分散性地分佈在不同的谷地，之間為山脈所隔。在交通尚不發達的年代裏，從城關往返幾處重要的鄉鎮，均須花費大半天的時間（或者歇一夜，次日返回）。鄉鎮與鄉鎮之間，不相鄰的自是路途遙遠，即便是地理上接壤的，由於山脈因素，有時也要繞路很遠。同時，儘管人均耕地面積不高，但另有山海資源可作補充，生活條件尚算不錯，在農業時代亦屬於勞力流入地區<sup>32</sup>。在這種情況下，過去人員在縣內與縣外流動的規模亦十分有限。表現在語音、語調上，各鄉鎮、村落的方言彼此不同（甚至不通），也與周遭縣市大相徑庭。總之，對於安城人來說，安城已經是很大的一方完整天地了。在改革開放後，由於經濟與社會活動日趨活躍，各個鄉村的人口開始向中心鎮、城關轉移，也有許多人開始向縣外流動。安城往縣外流動的人員以兩種職業為主。西部地區多山少地，比較貧困，有手藝匠人的師徒制傳統，多出瓦匠、木匠、泥匠，多前往浙西地區或浙江以西省份流動地尋找裝修、建築等工作，後隨縣內建築業與裝修業的漸趨繁榮，逐漸回流。東部地區流出的人多從事模具和機械雕刻業，前往廣東省等製造業發達地區，近十年隨經濟轉冷，也逐漸回流。

---

<sup>32</sup> 方言中有「黃岩割稻客」的說法，意思是每到農忙時，來自安城以西、以南的山區人，會來幫忙，並獲得報酬。

由於地處浙東沿海，屬於甬台溫（寧波、台州、溫州）的中間地帶，安城也屬中國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根據 2013 年安城縣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4），13 年全年生產總值為 384.48 億元，個體戶總數有 28689 戶，內資企業數 10708 戶，加上多數人受教育程度有限無能力在外從事高收益工作，所以對絕大多數人來說，縣內流動是首要選擇。同時由於境內生態資源也較為豐富，近期隨著旅遊資源<sup>33</sup>的開發，逐漸進一步強化形成一種生活型的自我認同，即認為沒有必要為了流動而付出生活的代價，而對外部，即便是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也大都賦予「只能吃大白菜」或「只能吃不新鮮的魚」這樣的意涵。不過，在縣城內部，向城關流動的意願仍非常強烈，這主要是教育資源的城鄉不均導致的。近期市內的人口流動調查也顯示，人口流動以省外流入和縣內流動為主（薑波 2014）。

安城如今核心城區的形成，與縣人民政府自 90 年代開始的城鎮化跨越式發展規劃有關。肇始自 1995 年中國正式實行財稅體制的分稅制改革，使各級地方政府有強烈的意願主動推動地區城鎮化發展，開發工業區和發展第三產業以獲得更大的地方留存。自此開始，地方政府的開發區招商引資與城鎮化規劃就一體兩面地成為地區財政收入與投放的持續性發展模式。根據《轉型中的土地制度改革》（陶然、汪暉 2010）中的分析，分稅制改革後，由於中央政府抽走了大部分預算，而地方政府的實際支出又大為增加，為擴大本地稅基，地方政府開始大規模招商引資，開啟了「空間城市化大躍進」，推動形成這一具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模式。這種土地經濟的策略核心是低價出讓土地給製造業企業，再高價招拍掛商、住用地。前者實際上是用地方財政淨損失的方式，通過大規模預先投入基礎

---

<sup>33</sup> 安城境內旅遊資源涵蓋森林保護區、古鎮、溫泉、戶外滑雪場、登山步道、海島等，且近期提出要建設浙江中小型飛機航空城及遊艇基地，也是地方政府經營之道的最新發展。

建設並低價轉讓土地，吸引製造業企業；後者則利用製造業的發展來推動服務業部門的增長，賺取服務業部門的營業稅和商、住土地出讓金。

在推動城鎮化發展方面，安城是 90 年代末就卓有成就的代表性地區。為此還有文章專門介紹安城的城鎮化經驗（賀豔青 2002），文中提及的安城經驗主要包括幾條：一、集中企業到特定的中心鎮，為減低鄉鎮的抵觸情緒，將已經遷出企業的稅款仍然算在原來的鄉鎮政府上；二、運營城市，投入基礎設施建設；三、農業的工業化經營，打造農業品牌；四、政府統一規劃用地，壟斷土地的收購權和供應權；五、設立外來人口管理辦公室（彼時全國唯一一個專門管理外來人口的機構）。「得益於經營城市的理念」，安城還將老城關以北的鄉鎮撤併入新城關，新城鎮的範圍涵蓋安城總面積的 17%，總人口的 34.5%，一舉成為當時「浙江第一大鎮」。這些手段都大大推動了城鎮化進程，搬去城郊的企業，不僅搬去了廠房，也帶去了他們仰賴的熟練工人、其他工作人員及其家屬，新興的城市規劃也為繁榮的服務業的出現創造了條件。如今安城城區絕大多數從事各種運輸、餐飲、服裝等服務業的個體工商戶，幾乎全由近二十幾年來自安城農村地區的人員所組成。按照安城統計年鑒，近年安城的非農人口已占 1/6<sup>34</sup>，而據本地居民自己估算，縣城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城區，加上各中心鎮的數目就更多了。同時，由於安城的城市規劃為「北進」戰略，直到近幾年以前，城市擴張所需要的土地都由依序納入城市開發計畫的北部農村地區所提供，因而原本城關地區的居民並未因新城市的崛起而直接受益<sup>35</sup>。加上屬於中國計劃生育前嬰兒潮的一代，絕大多數人都沒有父母饋贈，90 年代國營與集體企業相繼倒閉和轉制，大

---

<sup>34</sup> 晚近隨戶籍制度帶來的城鄉福利差別在安城內的差距已很小，加上農村土地的快速升值，多數人已不願轉為居民戶口。

<sup>35</sup> 近幾年由於農村拆遷安置的成本越來越高，加上老城區的建築大都已有半個世紀以上的歷史，不少地區的建築已極為老舊，極易引發安全事故，地方政府才開始著手翻新計畫。

批員工下崗。所以，原本老城關地區的居民也自內捲入整個城鎮化過程帶來的日趨激烈的競爭。

我的報導人歡萍的生命歷程<sup>36</sup>就緊密地連結著這段城鎮化歷史。她出身據城關三十公里的山區小村（蘭村），家庭早年于建國前歷經戰火動盪，後返鄉紮根。她父親後來自學成才，成為赤腳醫生。歡萍初中時就被送去城裏的二叔家，方便在城裏上學。不久後，在 80 年代末，歡萍父決定帶全家進城闖蕩。依靠他在農村的行醫經驗，在老城關北大街<sup>37</sup>開了家小診所。90 年代初期，全縣人民仿佛初識煙火，加上衛生知識缺乏，感染性病者眾多。歡萍父創制了一種極為有效的療法，全家因此掙得第一桶金。其後，歡萍父以其強硬個性與敏銳嗅覺（在 90 年代的中國即預言，「銀根現在緊，以後一定會松」），全家節衣縮食，熱切投資地產。後隨安城開始大規模開發，能夠商用的店面房價格與租金水漲船高，完成了第二步地產積累。之後又進入縣城的地下金融業<sup>38</sup>，也斬獲頗豐，終於累積大筆外人不知的隱形財富。歡萍在 09-10 年頂峰時擁有近一億資產，按照其說法，從 90 年代後期開始，「錢像長了飛毛腿一樣送進家裏」。如前述「所有錢到我家來」相近，「送進家裏」即是本地社會非正式金融業者面對的字面意義上的情形，親友往往巴不得將錢送到這些放息者手中。其次，如「飛毛腿」一般的速度感，也是改變此刻金錢關係，同時也是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籠罩性感覺。在整個城鎮化過程進入城區的農村人口中，歡萍屬於早進者，而且有商才與職業技能<sup>39</sup>，絕大多數晚進者，無商才與專業技能，付出的代價與收穫自與歡萍截然不同（這也是她/他們身處標會不同位階的原因）。

<sup>36</sup> 如今大概 40 餘歲，與主要的大會頭們，近乎同年。

<sup>37</sup> 當時的城區最北邊，原址從前是縣城牆。

<sup>38</sup> 歡萍主要將資金放給借貸中間人，標會是其投資的次要部分。

<sup>39</sup> 歡萍奶奶在建國前的重慶，也曾成功創制一家米店，歡萍自己在從醫之外，也從事啤酒和飲料批發業，不久即至縣城龍頭地位。

對於參與這一「城市空間大躍進」的普通人來說，安城的城市擴張是他們生命經驗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如歡萍在回憶中，詳細記述了個人捲入這一發展過程中既辛苦又欣快的心情。

到了1992年初，我們家把所欠的外債全部還清了。這個時候我們買的房子由原來的七萬八千元漲到了三十二萬元，短短三、四年時間簡直是一路狂飆。也是這個時候由於此事，父親看中了房地產生意，感到前途一片光明，開始有意無意向這方面發展，開始關心拍賣行裏的行情。認為有利可圖，就馬上買下來，再轉手倒賣，一來二去總能賺的很多。

1994年，縣圃村出賣大花壇這邊的土地，要42000元一間的地皮，父親覺得習慣了在這一帶經商生活，毫不猶豫托朋友買了一間地皮，按規定造了一幢七層樓。我們只是很簡單裝修了一下，連樓梯扶手也沒做，父親只搞大型建設，細小的他不管，加上連年的買房賣房，家裏的經濟總是顯得很緊張。我和父母在清理廚房時，把灶台和地磚擦的亮亮的，三個人互相看看，然後開心的笑了，一屁股坐在地上，無比踏實。一樓是診所，二樓是廚房和奶奶的房間，三樓是父母的房間，我住四樓，弟弟在五樓，每層後面的房間和上面的二層就全部空著。

記得住進去的第一個晚上，我在床上躺了一會兒，又躺到地毯上，眼睛直直看著天花板，一次次告訴自己這是屬於我一個人的房間，傢俱不豪華但都是我喜歡的式樣，想起這些年一直租住在店裏諸多不便，興奮的無法入睡，感覺就像進了天堂。那一晚幾乎沒睡，床上躺會兒地上躺會兒，再看看我的書櫥，一夜無眠。雖然以後也幾次搬家住新房子，不過從沒有這次印象深刻。診所開在自己家裏，父親特別開心，每晚到深夜打烊，我們一起去外面宵夜，回來遠遠看著自己家的房子，父親會很自豪說一句：「安城縣街，七層樓房，個人的房子我們家最高了。」我知道在他心裏這房子是他的驕傲是心中的一座豐碑。是全家人辛勤勞動的果實。

（《錢殤》）看到這段記述，我也有強烈的共鳴，我自己的家庭物質生活條件也在那些年裏，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曾經的一望無際的北部田地，逐漸轉為一處處新的樓房，而這些已經開發的區域和錯落在期間的田地水窪，是我成長過程中最為重要的記憶。如果離開了此種仿佛從無到有般的「初次經驗」（或像歡

萍說的，此後多次搬家，就再也沒有這種感覺)，或許就難以理解何以安城人對於在安城城區置辦一處大房子的強烈願望。

蔡欣怡（2013；2002）觀察指出，人口流動對新標會的形成十分重要。她觀察到九十年代的福州市內從事個體工商業的外來人員，往往以原先籍貫不同組成同鄉會/標會，以互相提供資金支持。進城人員，無論他們屬於縣內流動還是城際流動，許多人（特別是女性）都要自己給自己創造工作機會以養家糊口。在創/守業過程中，往往又同時要購房。這既是一種土地道德價值的直接體現，又可供子女入學並最終成家之用。同時，在一個如此劇烈的城鎮化過程中，在上述有限土地供給並由此產生一種城鎮化吸力的脈絡下，新家庭要為有限的空間資源競爭，積蓄往往趕不上房價的變化。又在前述中國正式金融體系不向個私經濟提供資金支援的脈絡下，而新移民原有的農村、農業積累往往有限，這就更鼓勵他們發動自己的人際網路以獲得資金支援。因此，每個家庭都要在投資風險和金融權利行使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從農村搬來城市生活絕非一帆風順，歡萍記述：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正逢改革開放搞活，經濟復蘇一片繁榮。父母懷揣一萬元錢，那時的萬元戶已經很厲害了，鄉人都說我們家是員外人家。其實，父母都是克勤克儉之人，在我的印象中，母親一天到晚在田地裏幹活，上山砍柴挖豬草，所有的粗活累活她都幹。每當下雨天，母親會關起大門，不讓別人進來，她一個人在堂前做竹絲的掃把，我會很安靜的幫她把留在竹絲上的竹葉摘乾淨。每次做滿二十把，第二天天不亮，她就擔著掃把到梅林集市上交給我姨父，讓他幫著賣掉。小時候不懂為什麼，母親會弄得偷雞摸狗般神秘兮兮的，後來知道那時候做生意是資本主義尾巴，就算後期的環境好些了，在農村裏也為了掩人耳目，照樣暗暗的。

拋棄家鄉優越的生活，從蘭村搬遷到安城城關也是有一定勇氣的，那時候不像現在這般方便。畢竟人生地不熟，全新的環境，完全不同的

生活方式。父親把家鄉的房產都賣了，不留一絲餘地，他說：「我們破釜沉舟，出去了不論多苦都不能再回來，否則別人會笑話的，一定要闖出一片天地來。」……記得剛到安城的時候，母親很不適應這裏的生活，她習慣家鄉的柴火，對安城的煤餅爐厭煩透了，總覺得火太慢，又有一股煤煙味，她會念叨：「這火吹啪吹啪，燒飯做菜就像辦家家，哪有在家好，幾把柴火飯菜就燒好了，燒的飯還香。」母親還會在意很多事，想不明白在安城用水都要錢，老家的水比安城的好多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洗衣服到溪邊，潺潺流水會漂淨所有污垢……倒是奶奶跑過三關六碼頭，在重慶在上海都住過很長一段時間，熟悉都市生活，習慣很多與鄉下不一樣的做派。

從歡萍的敘述中，反映出人們在從鄉村到城市的過程中，必須適應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此種生活方式的轉變，往往也帶來道德經驗的斷裂。因而上述引文當中歡萍記述其父母在鄉村勤勞節儉的生活，以及歡萍母親對於城市生活的抱怨，既充滿回溯式的童趣，又帶有與她當下境遇中的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強烈道德意味（如，「潺潺流水會漂淨所有污垢」）。

報導人康平（男），出身山區，高中學歷。初來安城城關時，趕上裝修建築業的興起，在城關建材市場承租了一處店鋪，專門經營裝修材料。他說：「一開始賺錢（2000年前後）十分容易，建材市場裏總共沒有幾家店鋪，生意就不錯，我需要做的就是去義烏進貨。有幾年日子很不錯，我也買房買車了。但是日子過得比較空虛，我就經常和朋友們出去玩，也花了不少錢。後來，慢慢建材市場裏面的店鋪越來越多，租金也變高了，生意變得不好做。我的圈子很窄，都是和我類似的人，遇到困難也沒什麼辦法，生活壓力就很大。」90年代到新世紀初，中國的流通網路很不發達，租店面房來經營是很多人的選擇。而最近幾年，隨著大型超商的進入並迅速過度發展、購物網站的普及、安城與寧波、上海等大城市的交通日益便捷，幾乎整個城區的店面房生意都變得極為蕭條。

可見，城鎮化的過程，對於多數人而言，種種看不見或難以預期的代價十分高昂。它不僅是簡單的人口移居，還意味著創造或獲得具有一定收入的工作並據此奠定家庭經濟基礎的綜合任務。而且這個任務被納入到一個快速變化的社會經濟活動過程中，不僅所有的移入者在競爭有限的經濟機會，而且就這些經濟機會本身而言，它的回報以及可被操作性（對於教育水準和原始積累均十分有限的農村移入者來說），也往往一轉即逝。早期或者某一個階段站穩了腳跟，在下一個階段有可能需要投入更多資源來維繫。當成熟的資本最終由大城市，逐級傳遞穿透到安城之後，原先的經濟模式已變得岌岌可危。考慮到農村移入者的主要動機在於實現父系道德話語下的家庭價值，安城人生男孩的意願十分強烈，按照統計資料來說，生育率在市內各區縣中最高，因為在計劃生育方面不能達標，還曾被取消過評選中國經濟百強縣的資格。他們移入城區是渴望下一代能有機會獲得更高水準的教育，還要有體面的婚嫁，為此往往在極為不利的經濟、情感狀況下，仍會選擇受苦，直至採取周遭人眼中必然的冒險之舉。對於很多我的縣城同齡人來說，父母一輩的辛苦、疼痛、無奈與受辱的體驗，滲透進其高度競爭性的求學與就業生涯中，成為記憶與情感活動的重要部分。地方政府的城鎮化規劃系於某個仿佛有牢固價值的數位目標。對於本地常民而言，城鎮化則相當複雜地容納了道德、經濟和情感的多重意涵，並具體化為複雜艱困、綜合性的、需要充分發揮人際動員能力、持續面臨危險的生命任務。身處期間的人所遭遇的亦不像是穩定社會建構下的上升或下降，而更像是不斷由所有人共建並彼此施加新的情感經驗和對價關係的巨型又流動的價值競技場（*tournament of value*），大多數參與者的資本與能力只在一個窗口下有效（因而也必須加緊越過），而指導他們實作的農村文化、人格等在這一過程中不斷經歷貶抑、強化與轉換，最終被形塑進、並再定

義了新城市社會。

如果沒有社會網路和金融工具的支援，完成這樣的目標是難以想像的。高速推進的城鎮化和政府激進的財政政策的另一面，是被充分發展、利用起來的民間資金網路。標會是眾多手段的其中一種。因而前述人們對金錢的「飛毛腿」式的速度感，以及在此種速度感的遮蓋下，模糊化了的經濟責任和金錢歸屬感「都到我家來」，實與地方政府的積極作為有關。同時這種民間資金市場的快速發展，和 2003 年之後中國逐漸成型中的正式金融體系的金融治理嘗試，在浙江產生了複合放大風險的效果。

據蔡欣怡（2003；2012）對中國不同地區銀行體系的貸存比的比較調查，浙江一直屬於資金流入地。這種情況實際上在蔡欣怡完成調查後十年，又大大加強了。隨著 2008 年的世界金融危機的出現，大量的流動性通過擔保鏈等方式，被快速釋放到浙江，以刺激本地民營經濟的發展，在此過程中，很多民營企業都高杠杆運作，有些公司的債務更高達 500%，至 1000%。據最新報導<sup>40</sup>，自 2011 年之後，浙江多地陸續出現嚴重的銀行呆壞賬問題。而在 2015 年上半年，浙江國有銀行體系出現巨額虧損，中國銀行浙江負責人被緊急約見，官方理由是上半年收益僅達到全年計畫的 10%。

以安城本地官方統計資料為例：

年份	存款餘額	存款增長速度	貸款餘額	貸款增長速度	經濟增長速度	貸存比	存貸比
2001	42.66	16.10%	38.85	20.10%	10.70%	0.910689	1.098069
2002	53.85	26.23%	54.27	39.69%	13.20%	1.007799	0.992261
2003	66.77	24.90%	72.41	33.40%	17.70%	1.084469	0.92211
2004	76.04	13.90%	84.54	16.80%	13.50%	1.111783	0.899456

<sup>40</sup> 香港商報，溫州硬著陸真相調查，銀行損失 1600 億，  
[http://www.hkcd.com/content/2015-06/15/content\\_937686.html](http://www.hkcd.com/content/2015-06/15/content_937686.html)

2005	91.08	19.80%	107.03	25.90%	12.80%	1.175121	0.850976
2006	113.88	25.00%	135.4	26.50%	19.60%	1.188971	0.841064
2007	132.84	16.70%	167.01	23.40%	16.10%	1.257227	0.795401
2008	169.12	27.30%	211.15	26.60%	8.10%	1.248522	0.800947
2009	224.8	32.90%	294.98	39.70%	8.50%	1.312189	0.762086
2010	294.69	29.30%	401.71	35.80%	13.80%	1.363161	0.733589
2011	328.09	11.30%	448.66	11.70%	11.10%	1.367491	0.731266

由圖可見，自 2001 年以來，安城本地的貸款增速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準。而經濟增速從 2007 年的 16%，至 2008 年直接腰斬至 8% 之後，次年 2009 年，貸款增速更直接達到將近 40% 的水準，顯示出明顯的人為調控的痕跡。而在 2010 年安城發生倒會/倒債風波之後，整個安城的銀行體系的貸款權都被上調到市一級，於是在 2011 年，銀行貸款增速又下滑到近十年來的最低水準。

#### 清會辦

1990 年安城發生大規模倒會之後，效法溫州、福建等其他曾發生倒會的地方成立了清會辦，但是政府成立的清會辦對於規範和解決民間資金問題，幾乎沒有作用。安城地方政府的檔案解密到 1990 年，剛好在安城發生大規模倒會時，當時的一部分處理方式，已經能夠查到，之後政府公文和檔案尚未解密。我找到當時在清會辦工作的地方幹部老周，由他介紹當時清會辦工作的具體情況。

**清會辦的出現和變化：**老周表示，在 91-92 年（應該是 91 年），由於有「群眾反響」（根據其他材料，地方政府處理標會，普遍是因為出現了嚴重的治安問題），所以縣裏決定成立清會辦，由一位副縣長負責。最早人員有三四個人。成立了清會辦後，來反應問題的群眾越來越多，工作變多變複雜。涉及到其他部門管轄的問題，例如有地方幹部參與到會，需要紀委的人。敘述者老周原來在紀委工作，因此在這一段時間調入清會辦。其他還包括法院、檢察院、縣府辦等，一

共有十多個人。此時只有縣一級的機構。次年，縣裏決定了處理辦法，定下來要「抓會頭」，「就是要把這些會頭啊，要把他們抓起來。不管他這個會有沒有倒掉，都要把他這個會頭全部抓起來。抓起來以後呢，就要集中一個地方，當初是南門，武裝部這個訓練基地。就是全部集中起來放在那邊，就是叫他們說清情況，把錢退出來。」因為一個會裏面涉及到不同地區的人，從城關鎮開始逐步涉及到不同的鄉鎮，就也在這些地方設立了工作小組。這一時期處理的一般原則是，會頭負責，會員不論。如果有會員攜款潛逃，會頭要負責和有關部門去找到。又過了兩三年，原先集中到南門武裝部訓練基地的會頭，除了少數被判刑的外，全部被放回去了。但是由於此前會的清理實際上沒有完成，後來會在安城也一直存在。所以清會辦就成了一個事實上常設的臨時機構，一直到今天。對於其工作性質老周解釋，「所以為什麼清會辦會存在，我們政府，沒有不管，現在還在管，就是對外一個宣示，具體工作實際上沒有什麼大的工作。就是有情況反映了，我記錄一下，」主要是展現政府職責。

**對社會產生影響：**成立了清會辦，有了處理辦法之後，有的會頭害怕被抓去，但是，「有的人是不怕的，他還很高興，為什麼很高興啊，他這個會已經倒了，倒了以後呢，人家會員，逼他要拿出錢……那最後政府把他叫進去了，那他不是，某種程度上說，他是一種解脫啦。精神上就已經解脫了。把他放在外面，人家還要去打，晚上到他家裏鬧。他這個家庭都不安定。」原因在於，為了維持會的運轉，防止違約，社會有一系列機制減低風險。比如會頭原則上應該為會中出現的逃會和違約負責，墊補費用。如果會頭或者會腳都還不上，參會的其他人會持續「抓」、「關」、「打」、「鬧」，社會對債務問題引發的暴力行為也視之為當然。所以，會頭被集中到政府設立的中心（南門武裝部訓練基地），雖然失去了人身自

由，但「精神解脫」，可以緩解持續的焦慮不安。但是，抓住會頭後，並沒有真正解決會的問題。老周認為，此時普遍情況是，會腳拿到錢就跑了，會頭無力支付，導致會無以為繼。所以儘管縣政府集中了會頭，但錢已經沒了。雖然政府處理會的問題所遵照的原則，基本按照社會習俗（同時也可能是為了執行便捷），一律由會頭負責，將會頭的房產拍賣以償付其他會員的損失。「你這個會的清理是很難處理的。那最後出現的結果是什麼呢，就是會頭把家裏的房子拍賣。這還是不能解決問題，那數額不是小數額。」會的清理實際上無法徹底完成，也是導致清會辦不得不持續存在的一個原因。另外，政府的做法，避免了更大的社會動盪和人身財產的損失，但也影響了原先的社會機制。老百姓對政府干預也感到不滿，並且有自己的一套理解。

**結果：**時間又過去兩三年後，縣政府又把這些會頭都放回去了。老周認為，並不是清會辦解決了問題，而是「時間」解決了問題，實質上是「時間換空間」。老周用一個故事加以說明：有一個受害者損失了四千元錢，當時相當於全部的儲蓄，情緒非常激動，「一開始他是很激烈的，思想是……啊，到我們清會辦來鬧。哭哭涕涕的，怎麼怎麼，我不好做人嘞，我要死了」，但是如今四千元只能算小錢。為什麼「時間」能夠平復激烈的心理反應呢？其一是債務的邏輯，以數字為準，但是數字背後的價值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數字的意義隨著時間發生變化。其次是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不僅創造出新的財富，也沖淡了早期經濟挫折的意義。由於沒有辦法真正解決債務問題，後來清會辦實質上變成了老百姓宣洩怨氣的場所。政府成為受指責的對象，背後有一套老百姓持有的「管的邏輯」：「他說你縣政府，要不早一點管，那這種情況不會出現了，我們不會陷進去了。要不，沒有倒的會，他們維持下去，不要人為地把搞倒掉。」基本上，這一套「管的邏

輯」還是以老百姓的自身利益為導向，看重的是政府的具體行政施為對個人利益影響的結果。之所以有這樣一套「管的邏輯」，可能要從中國共產黨執政後政治與社會關係的歷史去理解，並不是安城一時一地的個別現象。這一套「管的邏輯」一直延續到 2010 年第二次大規模倒會，不少人甚至普遍猜測，由於前一次政府處理會的問題的教訓，不會再對安城的標會進行干預。老周對老百姓的這種說法感到十分詫異，但是也承認當時的具體處理方法存在缺陷。沒有抓住拿錢走了的會員。但是，老周進一步認為那些會頭並不委屈，因為會頭是會的發起者，「我們說，他是自找的，為什麼啊？你不要去猥瑣搞這個東西，沒有一個人去猥瑣，誰會把錢拿出來啊。」

在老周的講述中，安城地方政府雖然在 1990 年倒會之後的一年內採取運動式清理的方案，但相較于這種清理表面上的雷霆之勢，實際上由於地方政府不願意也無能力深入到民間的資金關係中，真實的處理實作其實相當緩和，清理標會事實上具體地為緩解、減少標會倒會後的社會衝突和犯罪行為所取代。

地方政府的相關檔提供了其他一些有趣的線索，比如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治理理念在過去二三十年裏發生了很大的轉型，而 1990 年仍然帶著早年重儲蓄、重生產的痕跡。

如安城地方政府要求全體黨員幹部認識到標會的危害性已超出了經濟活動的範疇：

一是嚴重干擾了金融秩序，破壞了生產。標會是私人錢莊性質的非法金融組織，它以高利息為誘惑。吸引了大量的社會閒散資金，嚴重衝擊了愛國儲蓄活動。由此也影響了工農業生產。另一方面，標會的高利的引誘，使一些勤勞的人變成懶漢，使一些遊手好閒的人乘機發財，使一些群眾無心生產。……標會使正常的人與人的關係變成了赤裸裸的金錢關係，使人們頭腦中的社會主義思想變成剝削意識。它決不是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必然產物，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固有的矛盾特

徵。（安城地方政府公告 1990）

相反，今天絕大多數經濟領域的安城地方幹部，則多認為國家有責任推動金融改革，使民間資金有充分的投資管道，居民投資的便利化與隨之而來的對收入增長的積極預期，又能夠推動消費，從而保障中國的經濟增速。

總之，從中央到地方的經濟治理（特別是金融治理）在過去的三十年裏，始終在經歷從理念到制度的持續變化，而這種變化帶來的政府的能與不能，做與不做，在地方社會持續帶來深遠的後。標會的持續存在和過度發展，和這種多層次的動態變化有著緊密的關聯。

### 第三章 女性間的團結與支配

參與標會的套會利者和一般會眾的關係是不平等的。一方面，不平等意味著在一個會當中，套會利者（往往同時是會頭）要承擔有別於一般會眾的角色，如果得不到信任，或無法在人際關係中具備足夠的動員能力，會便難以建立。會頭需要具備一定的經濟和社交能力，並有充足的時間。更進一步的，標會的形成意味著不同資金需求（放貸/借債）的人能夠借由會頭彼此結合。其中既有不乏穩定收入和充裕資金的人，也得有亟需現金支用的人，他們的職業、資金能力和社會地位往往不同。這些人原本也為種種社會區隔機制所隔斷，或至少是沒有辦法建立直接的借貸關係，而會頭通過轉移/轉換社會關係將不同的人聯繫起來。也借著這種轉移，金錢流動才得以實現。因而不平等，更意味著會頭和普通會眾在跨越不同社會關係能力上的不平等。其次，這種在標會外的不平等關係在標會的運作中進一步得到強化。會頭對會的運作的控制力往往和標會表面上所呈現出來的民主平等的特徵差別極大，以至於如果沒有這種控制，理想化的標會實際上很難運作。而長此以往的合作關係，特別是對既參加標會而又非會頭的食利者而言，又構成收益的誘惑和資金得以穩固增長的安全感，對會頭的依賴也就與日俱增。

歡萍記載，當倒會發生之後，人們聚集在一起清點賬目，才驚訝地發現大戶小戶投入的資金數目差別巨大。「當我拿出一摺借條和會紙時，在場的所有會員都驚呆了，借條 35 張，金額從 10 萬元到 190 萬元不等，共計借款 1670 萬元，會款 760 萬元，二、三個月下來零零散散幫陳懷仙付的按揭款 40 萬元，（陳懷仙所有的銀行款都是我幫她處理的）一共欠我 2470 萬元」，「截止 2010 年 9 月 24 日，第一次報賬，共有債權人 52 位，借款總額 3400 多萬元，各種會款總額 3000 多

萬元,總計欠款 6400 多萬元,我、勁仿姐和胡蘭芬三人占了當天報賬金額的 80%」,捲入會當中的數額從幾萬、數十萬、幾百萬到上千萬不等,數目雖然不同,但往往對於參會的人來說都是極大負擔,歡萍稱之為「高端的老闆和普通的百姓糅合在一起」。反過來說,這些套會利者,能將下到剛開始在安城城區打工的年輕夫婦,上到安城本地最大的老闆、最高職務的地方幹部都連結在同一張網路當中,當真能力非凡。

報導人,月娥,從 80 年代的安城鄉鎮即開始從事標會活動,直至數年前大環境變動為止,總計有二十餘年的標會經歷,由於她對金錢的進出管理得心應手,多數家族成員也將錢直接放到她處,視為內部的「小銀行」。月娥說,如果要讓會運轉得順利,一個是要控制會腳,特別是有標的意願的人,一個是要控制標價。她一般會找到 3-4 名特別亟需用錢,同時這些錢最好不是花在投資方面的人,「投資的話,有盈有虧,賺的時候能把錢還上,虧的時候就不好說了,最好是拿錢去買房的人」。另外,也找 3-4 名有餘錢希望放債收息的人,這樣一個會的基本骨幹就搭建起來了。顯然,亟需用錢的 3-4 名會爭取在前幾輪標到會款,而希望放債收息的人,在會的尾期收款,也會得到比較好的利息。此外,她再隨便找一些人來湊數就行了,很多時候也找和她親近的職業會頭客串,她也時常去他人那裏客串。除了人的因素外,她還會盯緊標價,如果某位會腳出的價格太高,她會做手腳讓其他人得到會款。總之,儘管按照會的規則,會腳們提出標價,價高者得,但是實際情況卻比這要複雜得多。會頭既有意願也有能力控制風險,也會控制收益,有時候這種控制會限制在維繫標會運轉的範圍內,有時候則會大大超出。儘管有著許多背地裡的花樣,這些跟隨著懷仙的會眾,包括歡萍和她的朋友們在倒會之前,卻往往對她有著絕對的信賴。在會之外,有的也是經年累月無

話不談、家長里短的好朋友。

標會的矛盾處在於，儘管在實際運作中，會頭和會眾的關係是如此的不平等，但是她/他們的私人關係至少在表面上是平等的，會頭/套會利者有時還處於下風（如，歡萍和懷仙是醫生和病患的關係）。正是這種「不支配的支配」，蘊含了標會的巨大風險，也使捲入其中的絕大多數人，難以作為，予取予奪。女性之間的社會聯繫，為這主要由女性組成的標會網路，以及其中的「不支配的支配」提供了基本的背景與可能性，也形塑出了基本的形態。其中關鍵在於混合了安城男性氣質的「霸氣」展演，我用「霸氣女」這一名稱來形容這一由標會的金錢和人的活動而浮現的特殊性別位置和性別展演，用以說明何以對於一般女性而言，她們難以獲得在社會生活中廣闊的「跨界」能力，而「霸氣女」則似乎克服了這一障礙，同時「霸氣女」與其他女性何以能夠建立起前述「不支配的支配」。

### 叢林中的人情社會

另一位報導人素娥，也是來自農村，現年 50 餘歲，80 年代中前期開始參加標會，1990 年安城倒會時卷款逃亡雲南昆明，一住近二十年，期間離異，安城標會熱再興時返回安城。在專事標會之前，她曾是地方郵電局的員工。我在她的家中訪談，一樓廚房中眾親友正聚在一起打麻將，二樓客廳是 20 歲上下的素娥兒子侄女等人在看電視，我們就轉到與二樓客廳相通的一處臥室兼書房訪談。她穿著粉白相間的寬鬆家居服，頭髮燙染成小卷，體型微胖。素娥和我談話的方式，讓我印象極為深刻：總是一咧嘴露出仿佛習慣般的狡黠笑容，伴以「這不能讓你去嘍」之類的話（素娥最近在搞六合彩，我詢問可否去觀摩工作情況）。其他時候，也隱隱讓我感覺說得有所保留（這也完全合理）。訪談後，當我問她的其他

親友時，「她（欠其他人的）哪有只這麼點錢啊，害得人多咯」。我訪問過的多數會頭（全是女性）都給我一種難以言喻的既近又遠的感覺，一方面可能是她們談論標會一事時很自然的謹慎，另一方面我這個突然到訪的，年齡相差很大的目的不明者，也使她們不自覺的更老成了一分吧。而我始終對那個笑容念念不忘，就好像它在突然之際已洩露了標會最大的隱秘。

對於人在社會上表現得完全的精明老辣，安城人有時形容為「套路」，或者給人「吃套路」。「套路」一詞可以指，往往借由一個人或者數個人的聯合表演，來使特定目標人物或者目標人群上當受騙，或者精心安排達到特定目的的把戲。我的一位報導人曹坤，中年男性，來自農村，突然發跡後投資地產，近二十餘年在安城從事借貸業務，並且有一家自己的小額貸款公司，顯然非常熟悉一般的套路，他為我舉了一個套路的例子：「我有一個從小認識的很要好的朋友，後來有若干年沒有再聯繫。前些年他回到安城，擺了結婚酒，邀請我們這些相熟的老朋友也去參加。在那不久後，他問我借一筆錢，說明是在安城安家置業用，準備做點小生意。我在他結婚時都去看過他的住房，新娘子，完全沒有別的懷疑，就把錢借給他了。再之後，其他人告訴我他已經跑了，我還不敢相信。等到再去他住的地方，早就人去樓空，什麼都沒有了。我的其他朋友後來告訴我，他回來安城弄的一切，包括結婚，全部都是假的，就為了能夠騙到我們的錢。」「套路」的另外一個意思是，不同的人在社會上行走，有一些旁人不及的看家本領，以及依靠這些能力而形成的做人做事的習慣。標會中的那些在臺面上的大會頭（也包括在安城風生水起的地方要角），往往各有依仗，取信於人的方式不盡相同，各有各的「套路」，各自也有各自對標會的玩法。在不少絕不沾染標會的安城人看來，標會和前述曹坤所指的「套路」脈絡下種種社會騙局和爾虞我詐並我任何不同。

某安城地方企業老闆和我說，「那個（最瘋狂的）時候，當然有不少我的朋友來叫我一起入會。其中一些人我也很熟悉，是很要好的，很難拒絕，別人會在背後說三道四。但如果是標會的話，我絕不會參加。我就和他們說，如果經濟上有困難，要吃飯生活的錢，需要多少，我可以借給你們，如果沒有條件的話也不用馬上還，也不用利息。但是會我是肯定不會參加，然後他們也說會的錢多麼多麼好賺……其實拿一些錢入會的話，那個錢對我也是小錢，但是會裏面有很多不三不四的人，我不想和他們打交道。」

另一讓我十分驚訝的事實是，儘管安城的中年人（普遍出生於 195-60 年代）普遍地捲入到標會當中，或者直接參與（往往是重要的會頭），或是受到倒債潮的波及，然而他們的子女輩，安城的年輕一代對標會的情形所知甚少。我所遇到的年輕人裏面，特別是受過大學教育的大學生，幾乎沒有人從父母處詳細地聽到或者學過標會的運作方式，他們極為有限的知識往往和近幾年的官方新聞報導相去不多。其中也包括我。當我第一次從自己母親處得知她也曾參加過標會為家裏建房籌備資金時，並且迄今為止還在落會時，難以掩飾我的吃驚。如果不是我要開展研究，我的母親從未跟我提及任何標會的事。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關乎于一種微妙的社會心理和風氣，或許也已經為上述地方企業老闆所回答了。人們將「社會」視為道德上被污染的人際交往範疇，「社會」仿佛脫離了所有他們賴以生活的種種關係，而獨立為特定的行動場域。而標會雖然紮根於鄉村社會的舊習，但無疑也是「社會上的事」。

類似的現象，在當代中國幾乎比比皆是。項飆（2011）在分析當代普通中國人的國家理念時曾提到，「而在老百姓那裏，「國家」依然是最受認同的範疇，「社會」則意味著不正規和不可信任。「社會上的事情」雜亂無章，上不得臺面；「社

會上的人」不正經，需要提防；把人「推向社會」意味著拋棄，是單位不負責任的做法。老百姓期望進入國家，而不相信獨立於國家之外會給他們更大的自由和權力。」並以在北京做「浙江村」調查的經歷為例，「溫州工商戶對我們提倡的自主性、獨立性、和政府對話等等並沒有多少興趣，而是熱切希望成為「北京大學愛心社浙江村分社」，並一再要我給他們找「名人」題字、做顧問、當「靠山」。雖然我們的合作親密無間，彼此的思路幾乎完全相反。我想的是如何培育國家之外的社會空間，而工商戶把愛心社看作他們「靠」上國家的一個管道；他們看重北大，並不是因為它的特立獨行，而是認為它和國家核心相聯；我以為自主的公共空間非常重要，而他們認為國家的認可、正式身份的獲得才能保證權益。」在我的成長過程中，許多次的，語文考試的作文內容是要求指出、批評社會中的不良現象，如缺乏誠信、人與人之間的冷漠自私、投機取巧等等。在國家和社會之間存在一個巨型光譜，在不斷將國家道德化的同時，社會無疑只能以相當混亂、矮化的面目出現。和港臺社會相比，當使用「社會」這個語詞的時候，雙方或許在理解意涵上有著很大的差別。如果將中國共產黨在 90 年代中後期提出，同時也為中國大陸知識界和普通人習慣使用「建設社會」或者「完善社會治理」等用語搬到臺灣社會的語境下，恐怕會造成相當的誤解。

人們也往往使用「社會」這一概念將自己和許多被放置在這個概念之下的人主動區隔開，並進行一系列的價值上的高低區辨。對於不少中國城市而言，除了國家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工、大型國企的工作人員等，其他城市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多數人，農民工、鄉下人/外地人、小商販、買賣人、中小企業家、民營企業的雇工、以及種種身份模糊的人等等，大都可以被歸入「社會上的人」。而許多時候，儘管本身被歧視為是「社會上的人」，他們對於「社會」的戒懼更深。同

時，之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要反復地使用「社會」或者其他類似意涵的詞以示區隔，又表明此時此刻的絕大多數中國人儘管或許嚮往日常事務的一切均由國家安排妥帖，終極夢想有如吃穿住行皆與常民世界完全隔絕的國家高級幹部，但現實卻是每天都需要反反復復地和「社會上的人」打交道，或在國家公權力部門面前淪為「社會上的人」。持之以恆的黨國宣傳，將常民置在國家社會的治理者角色之上，而絕多數人又實實在在地屬於被治理階層，「社會」因而有著相當矛盾的內涵。前面所舉的一千事例，多少延續了這個吊詭性。例如，曹坤在安城從事高利貸活動，自己也豢養了一群「嘍囉」作為打手，但卻堅稱自己絕不做非法的事情，「生意的一切都按照法律來」，也「最注重法律」。看起來，倒也不像是敷衍之詞。而這或許是理解標會活動的一個關鍵所在。在此種吊詭性之下，人們一邊指責其他人投機取巧、貪污行賄，一邊又樂於用這種方法獲益；當所作所為不符合在地社會道德世界的基本要求時，又馬上轉而尋求國家或者法律的肯認。在這一或許可以被稱為「被污染的社會」(polluted society) 的遮蔽之下，人的道德能動性被極為有效地轉為自我保全，也將道德展演一分為二。在此種脈絡性下，我們或許也可以理解為何標會運轉中特別有高漲的激情和誇張的表演元素，同時也能理解個體在期間對有限的人際關係的高度依賴。

對熟人的依賴和對陌生人的提防在標會中總是彼此交織。忙碌時，素娥一天要跑二十幾個會。裏裏外外就會碰見不少人，其中既有不少相熟的老同學、老同事、同鄉等，標會完畢一般總會在一起聚餐，也有許多不大認識的，「我就和她們打聲招呼就好了」。更為典型的是標會中的純粹食利者，本身有著豐厚的身價，因種種原因選擇放錢到會中，坐食其利，卻又不樂於和標會中的其他人有過深的交集。她/他們往往有充沛的資金，又做甩手掌櫃，是大會頭背後的重要支持。

被懷仙稱為自己的「財神爺」，「一抽走錢我就要死」的歡萍，就是其中的典型，最多時有幾千萬至近億元的資金放入地下資金鏈中，其中相當部分即通過懷仙的會。而對於這些錢的具體支用，歡萍幾乎不聞不問。

……那段時間（90年代中後期到2010年）是我最快樂的時光，錢像長了飛毛腿一樣地進到家裏。一開始會害怕錢來得這麼快，後來也就習慣了，反正我是日子過得很簡單的人，其他人都看不出來我有錢，我也不會想要顯示出來。除了親戚朋友，只有我總是去的銀行的員工知道，他們對我就很好，很客氣，也可以推銷他們的業務。那時候，我就每天在家玩玩電腦，上網或者玩電腦上的小遊戲，日子過得很開心。弟弟在外學醫的全部開支，也都是我每月打給他的。……平時需要繳會錢的時候，我在網上打過去就可以了。偶爾去會裏，我也不大說話，加上開的車，穿著打扮都很簡樸，其他人也不會注意到我。可能是我本身很清高把。當時簡直就像活在夢裏面一樣，而我只想著等到一定時候，把錢全部取出來，在山清水秀的老家蓋一家養老院，既滿足自己的心願，又可以造福鄉里。（竺歡萍 2013）

除此之外，還有不少人都如此，既然不準備標會款，只等著會到期的時候收會款，自然就不會太關心會的日常運作。而且同時也正是這些身家頗殷實的人家，絕不想和會裏面的普通人，「不三不四的人」和「三教九流」發生什麼關係。安城盛傳，不少地方幹部通過自己的妻子來參加標會，撈取利息，這些人顯然也屬於純粹食利的範圍。在安城所處的浙江省東部，有權勢的地方幹部向地方企業放高利貸，而地方企業也樂於輸送資金換取特殊利益，幾乎是半公開的秘密。相比於歡萍這一類民間富豪，他們的力量更大，會頭更竭力討好，安城的老百姓都認為標會的狂熱和衰落背後有地方官的因素，也許有些道理。大會頭對用資金支持著自己的這些食利者看護得很緊。如歡萍記載她遇到安城的其中一個大會頭戴素月的經歷：

飛機上，我跟戴素月並排坐著，正好東南西北閒聊，說起保險的事，她說挺佩服我有保險意識，很多人覺得保險不好是騙人的，其實是不

瞭解。……然後，戴素月極力邀請我去她那兒落會，跟我介紹她的會跟社會上的會的不同之處，在我看來，已經差不多要收會了，所以不是很有興趣，不過諳於面子約好回安城後再聯繫。

回安城後不久，戴素月來診所還錢，順便談保險和落會的事，她告訴我跟陳懷仙交流過了，陳懷仙明確表示不高興戴素月跟我有來往，好像挖了她的牆角一樣，戴素月說：「小竺，我們有緣，但我不喜歡跟人有太多過節，陳懷仙跟我說了你們的關係，所以還是少插你們一杠的好，但我們可以做保險，對吧！希望你把保險推薦給你的那些有錢的朋友，有錢時為自己買個保障。」聽著戴素月說起陳懷仙的事，心裏很不舒服，雖然我不熱衷落會，也不見得跟戴素月關係特別好，也不是就一定要到她那兒落會，但陳懷仙介入我的社會生活，感覺太過份了。（同上）

這些人，無論是地方幹部、官太太、老闆妻子還是歡萍這樣的隱富醫生，儘管一隻腳伸在「被污染的社會」裏，但卻總留著另外一隻腳在岸上，不肯親自上陣。這種若即若離的距離，錢到而人不到，為大會頭和套會利者們創造了空間。相比於 1990 年的會，這些人的規模更龐大、資金更充足、與社會上普通人的貧富差距也越大，安城標會最後造成的影響也就更深遠，最終大大超出了安城的範圍，成了覆蓋周邊若干縣市的巨型網路，零零散散的聯繫更難以詳記<sup>41</sup>。

此外，除了這些甩手掌櫃，還有一些人與大會頭/套會利者本來就有極深的情感聯繫，往往還超過金錢的往來，他們認定自己與會頭的關係十分親近，必不至於損害到自己的利益。如前已述及的陳懷仙在年輕時印刷廠工作時的老姐妹，彼此之間有超過三十年的情誼，彼此非常依賴，大小事情都會一起商量，如同親人一般，有時甚至還更為親近。

上世紀八十年代，安城第一次倒會，陳懷仙還在塑膠十廠上班，共欠會員20多萬元會款，那時倒會性質跟現在的不一樣，是會員拿到錢後

---

<sup>41</sup>我的一位朋友，上海某高校研究生畢業後即嫁人生子，丈夫開一家小公司，公公婆婆都為上海退休教師，是身邊許多人欣羨的典範。幾年不見，再見已是面色憔悴蠟黃，不復往日清閒太太的丰采，後來知道「家裏的錢都被安城的會頭卷走啦！」，丈夫的公司也倒閉了，在上海的住家也已經大房換小房。

無度揮霍，然後用賴逃跑，吃苦的是很多會頭破產賠錢。如今的倒會翻了個，是會頭大肆攬財奪荒而逃，剩下諸多會員傾家蕩產血本無歸。那個時候萬元戶是非常了不起的，社會上的萬元戶寥寥無幾，20多萬元無疑是筆鉅款，不亞於現在的幾百萬元，一時間陳懷仙愁眉苦臉走投無路。陳懷仙的師傅見她可憐，無償借給她2萬元，另外一個退休老師借給她3萬元，讓她重新振作起家。陳懷仙從哪里跌倒從哪里爬起，還是繼續做會頭，那時的誠信度應該比現在好很多，陳懷仙把欠的會款一一陪清了，也慢慢重樹了威信。

稍胖的老太太指著瘦點的老太太，說一口純正的普通話：「她是陳懷仙在印刷廠時的師傅，我們都是多年的同事，借了很多錢給陳懷仙，利息也只有1分，都是為了幫她造房子，管閒事，錢是幾個老姐妹湊的，差不多都瞞著家裏的孩子們，跟陳懷仙已經好幾個月聯繫不上了，打聽了很久才知道是你們把陳懷仙藏起來了，我們想見見她，結一下帳。」我很耐心的解釋事情的來龍去脈，明確告訴她們，真的沒有陳懷仙的聯繫方式，但只要一聯繫上陳懷仙，我一定馬上告知這件事，然後把結果回饋給老太太。陳懷仙師傅一聽就哭了：「竺醫師，你這話聽起來就是推託，不管我們啊，你不能把我們劈開的，幾年前我跟你還在一起喝酒的，也算認識的，那年磊（懷仙的兒子）考上大學的酒席，你就坐在我旁邊，一直笑，一直笑，我記得你的，你忘了？」（同上）

這樣的例子不甚枚舉，許多報導人和相關事例都說明，當倒會發生時，情感傷害往往還大於物質損失，也驗證了蔡欣怡（2002；2013）關於女性之間構成標會網路，帶有特殊的女性化特徵的分析。

「被污染的社會」的觀念進一步形塑了在此一社會脈絡性下的人際情感互動，正是在大家都欲遠離、視之為「叢林」的社會網路中，親密性顯得尤為重要。人們也迫切渴望能夠與那些適者生存于「叢林」者建立起這樣一種親密性，於是成了特定人物的「霸氣」和「蠻橫」的消費者和雇傭人，最後也淪為受害者。更關鍵的，或許在這一層叢林背景之下，人們對於親密性的渴望方能夠得到強烈的滿足？或許前述地方企業老闆所意識到的，當親友來借錢時，他感到很難拒絕，

仿佛有一種被徑直拉入的驅力。我的表哥（也出身于安城西部農村）幾次在我面前感慨，如果不是曾在標會盛行時正好不在安城，人在異地他鄉，他是無論如何躲避不開的。

所以，並不意外的，倒會之後，不少參與標會的人不是帶著對舊感情的緬懷，便是強烈地控訴背叛，而極端的例子顯示一個人在這兩種情緒/記憶之間的左右為難。報導人金娟，也是年約 50 來歲的已婚女性，成長于安城城鎮，90 年代下崗後做過直銷等工作，一直沒有穩定的職業。1990 年倒會的時候，曾經是受害者，工作不久之後的積蓄都被一卷而空。而到 08 年前後，安城房產價格一路飛漲，加上唯一的女兒也成年了，「我總是感到很對不起我的女兒，從小到大，她幾乎都沒有帶朋友到家裏來坐坐，都是她到她朋友家去。雖然她從沒有對我說過，但是我感到很內疚。當時房價漲得這麼快，如果不買的話，以後要買就更難了。就咬著牙買了一套公寓。」然而，隨著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新開發的居住區和商業區越來越多，安城市面上可以購買得到日用商品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好。以某直銷公司的商品為主要營生的她，發現生意也變得更難做。與此同時，直銷公司也修改了銷售規則，如果想要更低價格提貨（也意味著更高的利潤和獎勵），就需要更大規模地囤貨，這又進一步增加了她的經營開支。買房和囤貨這兩件事疊撞在一起，本已乾枯的家庭資金更形拮据，金娟就準備組一個會來度過難關。她找了一些和自己還算親近的女性一起組會，其中就包括一位長年和丈夫在安城菜市場經營副食品店的老鄰居。兩人相識了很多年，彼此也很信任，金娟提出組個會的想法，對方馬上贊同，一拍即合。金娟形容這位鄰居，不論颳風下雨，每日起早貪黑，比其他人都勤勞。然而，會運轉沒多久，她就標了會款跑路了，再也找不到了。作為會頭的金娟就需要替她承擔債務，苦苦支撐數月之後，無力再

履行。一年以後，她方知道這位在她眼中，勤勞肯幹的老鄰居其實早已深深涉入標會，並在其他地方債務累累，我採訪時業已經身在獄中。

我與金娟訪談到後期，她幾次流露出痛苦的神色，「別人都說我太傻了」，最終慨然落淚，我趕緊安慰：「現在還這麼在意做什麼呢？」。她說，「如果不是 XXX（副食店女老闆），我也不會這麼慘，可是……我現在就想去監獄裏見她一面，當面問她，那個時候是不是存心騙我的。別人都說她是故意想最後騙一筆錢好跑路，可我想的不是這樣子。我覺得她一定是有她的難處。……她都是一大早就起來幹活，不是這種人。別人都說她是騙，只有我說她是好的。」

一旦建立起信任的關係，又往往串成一片。歡萍在處理陳懷仙留下的債務時，不斷遇到債權人一個套一個（像表面上是某家庭主婦的錢，實際上是她做公務員的親戚出了大頭），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況，表面上看起來雙方之間的借貸關係，但是往往錢中還有其他人的錢，「有很多債權人是親戚朋友一連串，像徐寬（懷仙會的其中一個男性參與者）一家本是鄉下的，兄弟姐妹四個赤手空拳到城關做生意，辛苦賺錢，把所有的積蓄都放在陳懷仙這裏了，還外帶他們的好幾個同學、燒飯阿姨和要好的兩個同鄉，總金額 500 多萬元，甚至連房子都捨不得買，心想等會滿了，連本帶利可以收到好多錢，到時就買大一點好一點的房子。」

### 家戶內外的女性

安城女性的親密性的一個重要來源，是她們往往彼此同情地理解因性別而在家戶內外所處的劣勢地位。此種女性視角往往被男性家戶長式的規訓話語壓抑和遮蔽。我的訪談過程中，不少安城男性對於標會的解釋，便和這種習以為常的對女性氣質的價值貶抑一脈相承，有著果不其然又不虞再辨的味道。「標會有什麼

好研究的？都是內客人（安城話中指女性，也指妻子）無知搞出來的」，「女人就是貪，沒有風險意識，都不去想想，錢哪有這麼好賺」，「內客人就是感情用事，別人一叫會她就去了，自己不會分析」等等，可以說是在安城聽到的對標會最通俗、最多人傳誦的解釋。而且在這種解釋中，用來本質化性別差異進而體現價值區辨，並完全歸咎於女性的語彙，與地方官員述及常民/刁民有著驚人的相似。同樣的話，在地方幹部口中，就變成老百姓就是「貪」、「無知」了。在這種男性道德話語和國家治理的雙重建構下，參與標會對於這些出身農村、小初學歷、普遍被排除於就業市場之外的中年女性來說不無救贖的意味。

素娥與我苦澀抱怨，「（在 1990 年安城倒會後）跑去昆明後，就每天待在家裏，當家人去建築工地找工作，他們回來後，我就給他們燒燒飯。沒法做什麼事，這麼一下子時間就過來了，後來就離婚了，我就回來了……還能做什麼呢？回到安城，我還是在家裏燒燒飯。到外面去找工作，像我這種，除了餐館廚房裏洗碗筷，或者去別人家裏做打掃，找不到別的工作的。做這種工作，人家一個月給你一千、兩千已經不錯了……我現在做六合彩，每年至少也有 5-6 萬，豈不是好多了。」而且很多這種工作，在安城往往也意味著是外地人才做，安城本地人，人到中年去洗碗或者做家政工，很多人也覺得不體面，或者和服務物件也不好相處。我在安城本地的親戚提到一位本地中年女性，標會倒債後為了還債做月嫂，儘管在工作期間收入很高（一個月將近 8000 到一萬人民幣，許多醫學博士畢業後工資還不如月嫂），她卻很不滿意，成天埋怨：「我從前也很風光的，每天睡覺的床就要兩萬塊，哪里用得著做這些？」，由於工作態度不好，不久後就被辭退。此外，即便是已經在國家機關、事業單位或者國營企業有穩定工作的女性，也往

往往因各種原因很早就辦理內退<sup>42</sup>或者下崗，離開了一線工作，這在四五十歲上下  
的女性中最為明顯，她們也就不得不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家庭。

女性在家庭當中的地位 and 角色，往往成為她們踴躍加入標會的直接原因。

王小娥（安城北部某漁港人）老公是船老大，總是出海，她在家帶兩個孩子。空著無聊特喜歡參與賭博，到處趕賭。有幾次輸的很慘，變賣家中所有東西還不悔改，族人親戚忍無可忍一致要求他們夫妻離婚，並趕她出去，她老公跪著跟父母姐妹求饒，說看在兩個孩子的份上，看在夫妻多年的情分上，希望能最後給她一個改正的機會，王小娥也一再表示洗心革面保證不再去賭。……我現在開著車子出去，人家都以為是我老公的船賺大發了，其實，都是我自己從會裏賺的，我比他賺的多賺的快，他出海又累又不賺錢，以前他不嫌棄我，我現在有錢了，也對他很好的，哈哈！（同上）

安城的地方文化中，不少男性亦習慣將家事全部交給妻子處理。

徐福寶向來吃糧不管事，只在他的汽車修理廠裏忙，主要修大卡車一類的車，很多早期有車的人，差不多都認識徐福寶，差不多的評價是：「好人、爛糊人」（安城話，意即一、日常生活上骯髒不乾淨，二、為人處事上拖拖拉拉不精明），關係好的人直接稱呼他「爛糊福寶」。由於他什麼都不是非常斤斤計較，老好人一個，很多人都願意到他那兒修車，所以生意一直紅紅火火。家裏家外所有別的大小事都是陳懷仙一個人說了算，這麼多年來徐福寶不知道家裏究竟是欠債還是盈餘，風光的時候，他在外面吹吹牛，倒楣的時候就不是他的事了。……一個大男人把玩放在第一位，所有的事交由女人來處理，做好了都是他的名氣，弄壞了全是別人的責任，還在那裏說風涼話。說的好聽是甩手掌櫃，說的難聽是極不負責任，這一點我向來同情陳懷仙，也深知她作為女人的苦楚。

離開了工作崗位的女性，往往也由於驟然改變的生活，通過搓麻將、廣場健身、吃齋禮佛等活動尋求新的寄託，有了不少機會和新人結識。往往處於這一年齡的女性，又需要為子女的婚嫁和職業操心，這就為會頭提供了可乘之機。

---

<sup>42</sup> 不到退休年齡，而離開工作崗位，單位仍保障基本福利，給予一定的工資或者內退費。

我問歡萍，「我訪問的很多男性都認為安城標會問題出在女人身上，你覺得呢？」，歡萍說，「其實女人只不過是男人打出的一張牌，背後大手大腳全是男人花掉、享受掉了。許多女人從標會賺了錢之後，自己沒有用上多少，男人全花掉了。像安城某中學的 XXX 老師，老婆參加標會後，他馬上換上幾十萬的表，換了部好車，女人出去吃飯、做頭髮這類錢，和男人的開銷相比，是小巫見大巫了。」用安城本地話來說，不少安城男性在外面喜歡充派頭，在家喜歡擺派頭。派頭的意思是做出倨傲、養尊處優、頤指氣使的樣子。充派頭指的是安城人喜歡借債消費，特別是喜歡把錢花在別人看得見的地方，如買車買表、請客吃飯，讓人覺得自己過得比實際的情況更優渥。擺派頭的意思是喜歡拿臉色給人看，做出傲慢無禮的樣子，往往指男性在外沒用，在家就在老婆面前擺派頭。這裏所浮現的女人和女人之間由於相似的性別位置而產生的特殊輕易，也一再地浮現於不同報導人的案例中。談論變心的男人和情感苦楚成為她們聯繫私人感情的重要橋樑。

如前所述，金娟對於好朋友的背叛耿耿於懷，實乃這位好友在她心中屬於「交心」的關係。她並進一步解釋：「她家裏什麼事情都跟我說，對我說的話也都很認可。有一次，她老公在外面有人了，夫妻兩個在家就一直吵架。我就問她，「這樣一直和老公吵，想不想離婚？」，她說不想。接下來，我就和她說了一下午，既然不想離婚，就不要吵架，要把他的心留住。否則就是把老公往別人身上推，我告訴她回家後該怎麼樣怎麼樣。後來兩人果然複合，她老公跑來和我說：「碰到任何人，都叫她繼續吵。只有你叫她拉我一把」，她也對我說，「大姐這個人很好，沒有話說」。本來她就事事說給我聽，遇到這件事情之後，和我的關係就更好了，不管什麼事情都和我說。」素娥對於她和她的「小姐妹」的描述也大致如此，「我們雖然年齡相差了十幾歲，她管我叫姐，我也就經常在生活上給她意見。

我們時常在一起逛街聊天，逛街的時候，我們隨便什麼都聊，她常常和我說她跟男朋友的事情。現在我們三人就在一起搞六合彩。」然而，也並不是所有的例子中，這種情感衝擊都能夠被順利化解，有時也造成極端的傷害。

當單偶制的現代家庭制度和地方社會的父系道德體系相遇的時候，是否普遍地會造成男性的種種離開家戶尋求刺激，而女人在自我貶抑地服從之餘，又在同一脈絡之下相當驚駭且受挫性地經驗到這個事實呢？在安城，前者是勿須多加說明且也在視覺上一目了然的，每到夜間，開車穿越城區，以會所或 KTV 為名的古堡式建築相當密集的分佈於城區的各處。而後者造成的創痛和影響，則又常常如前述金娟所舉例子中的男性，一旦鳳平浪靜就會被低估。「交心」則又提醒，社會在私密性的關係外，女性視角無法全然公開地參與這一話題。反之，這又為能夠重新確立並維繫女性主體性的女性間網路，包括標會，提供了巨大的情感動力。此外，在這些情感衝擊之餘，往往也使女性進一步確認妻職和母職，使其進一步成為家戶經濟的主要維護者。

#### 異類偶像和感染性展演

除了前述妻/母職的彼此同情並撫慰的關係外，標會當中還有一種與此有別的嶄新的女性主體實作。她們是參與標會的女性中最為活躍的佼佼者，或者也可以反過來說，正是由於她們在標會金字塔頂的位置，使她們有機會在金錢力量的作用下，大大逾越了原先在地社會加諸於女性的種種束縛。而她們和一般女性的關係也不只限於前述「好姐妹」的脈絡，而主要表現為各方面能力均超乎常人的展演。並且標會當中會頭/套會利者的能力、認知、情感等全方位展演的目的，並不僅限於鞏固她們與普通會眾之間以金錢供給為核心的階序化關係，而更在於

提供一種以展演行動本身的被呈現而達到的感染性的效果。因而，我稱之為感染性展演（contagious performativity）。這種感染性為其他女性提供了關鍵的想像力，使她們有機會並也自願克服和突破過往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諸種身心限制，且相信借由標會的資金和人際運作能夠飛躍式地改善原先的生命境況，從而一舉扭轉/重塑之前的生命歷程（life course）中的種種苦悶、苦痛、不斷受責難、難以體現個人價值的情感和記憶。前述王小娥一經強女人（唐人鍋的老闆娘）的點撥，立刻活躍于安城的會山會海，此前飽受挫折的尊嚴仿佛頃刻回復，並且誇張地展現出極端颯爽的人格，是這種感染性展演的例證。經由這種方式，處於核心位置的會頭/套會利者，可以不斷發展新進會眾，利用她們的人際資源組成更多更小規模的會，以進一步擴張標會的勢力，延緩債務問題，持續地達到新錢償舊債的目的。

這些異類偶像表現得既神通廣大，又特異常人，往往具共通性的，在安城本地人眼中顯得十分霸氣，能幹，我也將她們稱之為霸氣女。霸氣指的是一個人很有氣勢的樣子，也指性格直露，就算將旁人可能指摘的缺陷暴露在外，也蠻不在乎。霸氣女在其他人眼中的異類舉止甚多，但往往堂堂然地展露在其他人面前，越是如此，越顯示出她們有著超常的本領，作為會頭也就特別值得信賴。

原任某保險公司駐安城分公司總經理的戴素月是霸氣女的其中一個代表，歡萍記述有人這麼評價她：「稍微差一點點的就是那個戴素月了，不過在我眼裏仍是女中豪傑，安城的第二號大能人，她利用廣闊的人際關係，搭建一個很大的會堂，利用會頭攬錢，源源不斷的收集會錢，最厲害時一天收了 4000 多萬元的現金。她老公是公務人員，一個女兒，一個兒子都在國外，她為他們安排的好好的，最令人敬佩的是，戴素月能讀懂政策規避利害。因為她是某保險公司安城的總經

理，深知保險政策，無論遇到什麼外力，保險受益人的利益不會受到損失，而且不用納稅。她用會錢買了大量的保險，為家人打好基礎。雖然她一個人坐牢了，也就區區六年，最多關個四五年肯定就回來了，有錢還可以保外就醫，二年就出來瀟灑了。家人都活得滋潤極了，真是苦了她一個，幸福全家人。到時候時間久了，知道要不到錢，跟她要債的人早就心冷了，誰還找她？再說有錢哪兒不能去啊，非要住在安城這小地方？後半輩子該是多好的日子啊！」

歡萍因為喜歡為家人買各種各樣的保險，有一次保險公司搞促銷活動，買保險送港澳一周遊，在這個旅行團中結識了戴素月。這位戴素月和普通安城女性不同，「能夠發表長篇演說」，走到哪里都前呼後擁，受到其他人的諂媚奉承，行事極為高調。

當時的香港澳門行，除了賭場，很多導遊只會帶到各個地方購物，戴素月總是帶著她的親戚瘋狂購物，見什麼買什麼，她說：「我不喜歡賭博，一般從來不去賭場，但香港澳門真的是購物天堂，每次來都會買很多東西，回安城會後悔買的東西太少，不夠分給大家。」到表店的時候，她一口氣買了6塊表，都是幾十萬一塊的，說是給女兒買的，還有幫朋友帶的，她看中一塊50多萬元的表，不停的給她老公打電話，想要買給他作為生日禮物，一番猶豫後決定買下來，但還差8萬元錢，她問我能不能借給她，回安城就還我，看她這些天的做派區區8萬元真的不是問題，我很快答應給她。」讓歡萍印象極為深刻的，為了順利通過安檢，到機場時，戴素月就將這些表的包裝拆掉，全部帶到左右手上。（竺歡萍 2013）

這些女會頭的行事做派大都十分張揚，鋒芒畢露。

另外一位安城的大會頭楊莉芳，也是安城三大會堂（唐人鍋、七星茶、萬豐）

其中之一萬豐的掌舵人，出場也是氣勢浩大。

只見櫃檯前站著一個手臂雕龍的大漢，這時已是初秋略顯寒意，可這大漢明顯的想展露一下手臂上的紋身，把袖子卷的高高的，唯恐別人看不到，要不是這種人見的多了，一般的人興許會真有些怕。

只聽楊莉芳在質問，是誰把陳懷仙押起來的，又是誰沒有王法，把陳

懷仙打的渾身是傷,敏捷(歡萍的前夫)解釋,沒有人把陳懷仙藏起來,更沒有人打過陳懷仙。楊莉芳很有范兒:「不是說這裏的竺歡萍很厲害嗎,叫來見識見識。」我接過話:「我就是竺歡萍,有事嗎?」

楊莉芳看了看我,大概覺得有些眼熟:「是你啊,陳懷仙欠我很多錢,今天你把她交出來,你們有什麼資格押解她,有我在,誰敢欺負陳懷仙,出來試試。」櫃檯前的大漢很配合的大罵:「xxxxx,哪個不要命的,要吃死柴(安城話,意即挨揍),有本事出來。」這兩人一唱一和盛氣凌人不可一世的樣子,頗有興師問罪的意思,敏捷被激的發怒,馬上進入一副應戰狀態。(竺歡萍 2013)

如今這些 2010 年前後在臺面上最為重要的大會頭大都落入監獄,或者逃亡異地,我在訪談時聽說只有楊莉芳仍還在安城活動,進出如常,住家有一堆黑社會的小弟保護,即便是想要要債的人,也都拿她沒有辦法。

歡萍還詳細記述了另外一位安城大會頭楊飛娟的經歷和特點,楊飛娟和歡萍年紀相仿,據說現在逃亡在福建廈門。

歡萍分析和楊莉芳和楊飛娟的不同:

「同樣是安城有名的會頭,楊飛娟和楊莉芳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楊飛娟走的自以為是親民路線,儘量和顏悅色,處處笑臉相迎,但骨子裏透出來的那種暴發戶味道很濃。楊莉芳走的是高端路線,讓人一聽不寒而慄,其實深入接觸後倒還近人情。唯一相同的是,她們總是很高調的亮相,以吸引更多人的眼球,唯恐別人不知道。」

為了取信於人,會頭常以神鬼、和尚的力量作為依傍。如上面楊飛娟所扮演的胡公大帝,本是安城民間非常有名的小仙,是蜈蚣修煉而成,所以本地人尊稱為胡公大帝,有一種廟宇供奉,廟宇中的道士專事抽籤算命,眾人皆認為靈驗,香火遂極為旺盛。歡萍說,安城本地有一位和尚,專門牽線民間借貸,能力貫通多地,涉及金額數目巨大,和不少的會頭都有牽連。此外還有不少半仙、喇嘛,不少安城會頭都極為信奉。張揚霸氣的行事作風也和性有緊密的關聯:

陳懷仙的小情人比徐磊翔大不了幾歲，最多不過三十歲，會堂最輝煌時，兩個人整天黏黏糊糊，公開身份是陳懷仙養的小阿第，幫她跑腿兼看管會堂。第一次來我店裏收錢，叫的很親切，說了一大堆關於我和陳懷仙的事，我很奇怪他怎麼會如此熟悉我們的事。陳懷仙無比信任寵愛他，幾乎形影不離。有一次陳懷仙換手機卡，讓我幫她複製號碼，我無意間發現，她與小情人之間很肉麻的來往短信，如此懸殊的年齡差距，玩著夠現代時尚的遊戲，讓我嗤之以鼻。陳懷仙貪色，小情人貪錢，真是一對狗男女。其實小情人是陳懷仙精心用錢圈養起來的，結果一下子被小情人吞吃了二百多萬元錢。……陳懷仙曾經多次跟我說：「假如我是男人，後面肯定跟著一大幫的情人招搖過市，做人才瀟灑。」我會陰陽怪氣跟她說：「你是女的，後面跟著男的也不少啊。」陳懷仙會笑著打趣：「跟你這種怪胎無話可說。」（竺歡萍 2013）

除此以外，關鍵性的，這些暴漲的財富，最需要得到官方人物的護持，有了官方人物或官方機構時隱時現的背書，地方社會裏的地頭蛇便更能順理成章地擴散其勢力，地方幹部還常作為民間巨額資金往來的中間人。歡萍和我說，她曾與人一同放貸給浙江某城市的一家化工廠，作為資金周轉之用，雙方各出三千萬人民幣，就是該市的一位副市長出面牽頭。歡萍為我總結規則，要想在社會中把事情辦下來，平時看有沒有人（當然指的是現管的幹部，或者高級別的官員），關鍵的時候就看錢，有錢就有人。

何以這些展演，以及屬何種方式手段的展演能夠達到感染性的效果，而讓眾多原先無法施為、展現能動性的主體發揮非同一般的活力？

首先，由於絕大多數參會的女性，社會地位、受教育情況等皆十分相似，且同處於被貶抑的位置，因而絕大多數此類展演難以最終獲得本真性。然而，出於對這種本真性的懷疑而感知到展演的種種虛張聲勢、誇張，對「更真」的愛慕和挪用，卻讓這種展演更被視為可以被複製和模仿。

陳懷仙在有錢時喜歡買各種金銀首飾，瑪瑙鑽戒，六十萬元一個的水晶球說買就買了，32萬元一個的鑽戒對她來說就像到躍龍市場買菜般簡

單,幾萬、幾十萬的各式項鍊首飾每天換著戴,就算房產土地,她一揮手說買就買了。(竺歡萍 2013)

這段前後的描述中出現了很多數字,特別是「32 萬的鑽石」和「60 萬的畫」。這些反復出現的價格數字,是歡萍和懷仙一起買的,所以知之甚詳,或是懷仙平時習慣將價格告訴別人,又或者是歡萍為了增加可信度編的呢?就某一個具體商品,我們無法確知。但從一般意義上,這三個可能性也許同時存在,反映出對價值的「數字化」表達的普遍風氣。同時,歡萍用「每天」、「買菜」、「一揮手」進一步描述出懷仙的消費習慣和狀態,這種日常化和數字化有何種關聯?直接的解釋已經為歡萍所說出,這種消費/投資是要「很多人看」的。但是這種「看」,對集體欲望的想像,是在特定的安城(當代中國)的時空條件(安城多數人來自農村,缺乏教育,據房產首付 60 萬推斷,約在 09-10 年)框定下的,所以數字化、日常化的特徵才尤為強烈。

重新組合下這段資訊,我們大約可以知道誇張的數字密度和買菜般的消費之所以出現的一些脈絡條件。首先,周圍其他人對於懷仙的文化素養有著清晰認識,鑽石和畫等一系列商品除了彰顯懷仙有錢以外,其附著的象徵意義幾乎是不存在的。我們也可以由此想像一種澄澈的價值經驗,數字的意義是獨佔性的。「和尚牽線」、「老畫家」等說法傳遞出一種在地社會所默會的社會文化階序上的距離感。儘管周圍人認為無法判斷出畫的價值,是「想不到的」,但仍然因為畫值 60 萬,而感到羨慕。數字化是此一背景下有效傳遞價值、表達價值的手段。其次,在這一小段中,三次出現和房子價值的類比,一次出現了和房子有關的物理性質(「牆壁浸水」)。「就算房產土地」、「房子拿不動」等形容,說明房產比其他資產對於本地人來說或許更可靠、堅固。同時,人們想到的不是房產的總價格,而是

「首付款」，也是特定時期房價急升、人們普遍按揭買房的風氣體現。人們用價格急升、質感更強的房產，去理解價格數字，是「60萬可以買房子付首付」，於是「一張畫這麼多值錢」。易言之，抽象的數字之所以能夠成為傳遞價值的有效鏈條，和此刻房產市場賦予貨幣/數字的感覺是離不開的。也正因为如此，不僅數字在表達價值的方面是獨佔性的，同時也是高度動態性的。伴隨而至的是和這種數字化價值相互關聯的社會心理狀態。它既可以是獨斷的「絕對值的」，「現在幾十萬，過幾年就是幾百萬」，也可能是「牆壁浸水，一文不值」。也是在這種背景下，一定要被看見，要展現出來的會頭的消費，它滿足人們對欲望的期待的方式，就特別是數字化的，同時或許也必須是每日進行的。

在上述例子中，聽眾多少有點半信半疑，然而有的時候恰恰是這種「豬八戒插蔥裝象」伴隨財富暴漲的炫耀，才更激起人們模仿並參與期間的熱望。T村男村民傑東，三十五歲上下，本來長年在外做木工，然而同村某村民靠參加標會和放高利貸，暴富買了奧迪、寶馬等名車之後，強烈地激起了他的投機渴望，傑東解釋當時的心理，「他算什麼呢？本來也跟我差不多的，沒有多大本事，我就覺得我也可以。」相當一部分參與會的人，都抱著這種其他人（同是農村人或者女人）能行，我也能行的心理。

其次，普通人理解中的上述表演（如冒充投資專家，或有顯赫的官方背景），表面上是新自由主義式的，個人可以借由自我管理/發展進而在財富市場或者權力領域獲得成功，然而於在地社會的歷史中，也有更深的社會歷史背景。

「忠厚」是安城人在方言中最常提到的道德品質，大意指一個人善待他人，忠誠可信，不會欺騙、耍滑頭、用計謀，說一個人忠厚，就是指這個人值得結交，不需要提防。然而晚近以來，「忠厚」一詞往往與一個人缺乏在社會中的處事能

力劃等號，這一社會就是在前述「被污染的社會」脈絡性下，仿佛給予人必須在道德上「反轉」情境的社會。而人們眼中在社會中的處事能力，首要的就是語言能力，特別也具體指能否像黨的領導幹部那樣做演講、寫報告的能力，其次也指能否像社會當中的活躍油滑分子般待人接物的能力。人們往往也將這種能力視作比大學學歷或者更高的高等教育來得更重要，否則就是高分低能。與此相關聯的，寫作在中國有相當特殊的，受黨國政治文化影響的歷史背景。我的一位安城親戚抱怨小孩成績不好，主要是語文中的作文一項總是得分太低，她的解釋就是小孩子為人太過忠厚，以至於不會寫作。有趣的是，由於人們對於寫作有著這樣一種想像，將其關聯於一種複雜的心智狀態，這種複雜不是一種精緻，而是一種不單純的複雜，反而也使寫作變得越來越困難，越來越像是一種極為珍惜的才能。我在訪談期間聽到一個奇異的故事，大致內容指一位安城人是北京某國家級宴會廳的工作人員，某前國家領導人一日大宴賓客，來賓都是他的五花八門各種來路的親戚，濟濟一堂，規模龐大，他在席間放言，手中缺少值得信賴又有能力的人，只要是親戚中自恃有能力者，皆可毛遂自薦，他都會給予安排。這一故事的真假姑且不計，它足以證明在安城人眼中，「有能力」是如何具體地聯繫到官場的政治活動，而且同時又是多麼的稀有。這一文化氣氛，大概絕非安城一地的現象，和提升語言能力相關的雜誌和節目，如《演講與口才》，《天生演說家》，《漢字英雄》等等，在中國長盛不衰，央視名嘴也多家喻戶曉。

概而言之，一個人假如無法成功，總是多少和口才不好有著緊密關聯，相對的，像上述戴素月這樣能夠發表演講的女性，顯然就成了她之所以能夠成功的至關重要的理由。而口才又並非知識/文化意義上的，和有沒有受過高等教育沒有關係，而是一種不斷複雜化自我心智而能隨之提升的能力，這種磨礪的過程又意

味著要到社會上去，並且不斷放棄如忠厚、講實話這一些道德品性。在這一社會脈絡性下，拙劣的展演之易於識破，並不使人頓失信任，反而仿佛又能在另一個意義上成真，具有在中國社會中成功的特殊正當性。

除了上述兩種感染性之外，這些偶像的一大關鍵魅力來源，毫無疑問就是金錢，她們不斷通過展現自己無與倫比的能力來證成標會高收益的可信，使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將錢交給她們，同是這些錢也成為了她們展現自己雄厚實力的最為重要的籌碼。換言之，只要有膽魄，有霸氣，參與會的套會利者往往能夠快速收穫巨額的財富，並至少在表面上徹底重塑她的社會位置和處事方式，通過這種方式實現金錢的迴圈。

#### 安城的男性陽剛氣概

前述安城「霸氣女」的一個重要的展演模仿對象與互動的他者就是安城的男性，霸氣女和安城中具有關鍵性位置的男性有非常多的相似。其矛盾在於，對於絕大多數安城標會的普通參會者而言，作為女性與女性群體，她們對於安城的男性氣概有著頗為矛盾的態度，一方面她們敬佩又愛慕具有此種男性化特徵的女性，對她們崇拜信任，追隨在她們身邊，另一方面她們又懼怕具有同樣特徵的男性，感到有時不得和他們打交道，但又十分畏懼或無可奈何。暴力是安城陽剛氣概的一個核心特質。

歡萍形容安城男性有兩大特點，一個是喜歡吹牛，亦即愛說不符合事實的大話以誇大自己的身份和能力，當安城男人和其他人在一起喝酒、聚會時，彼此吹牛炫耀，說大話，就算是常常被別人識破也不會收斂，另一個是好勇鬥狠，愛吵架、說話很難聽，有時一定要分出個高下，甚至動手鬥毆，武力相向。歡萍自己

的父親和丈夫身上，就有不少這種事例，她覺得是家庭會遭遇到各種困境的一個直接因素，對此她幾次流露出無可奈何的神情。

我和歡萍第一次訪談結束的時候，正好碰到下著小雨，她堅持開車載我回家，順便可以去看看她所講的倒會之後，眾多和會頭陳懷仙相關的債權人竭力爭奪的一處房產，她都稱之為「360 號樓」，我考慮可以有機會進一步交談，也許等到歡萍看到房產的時候，也有更多的話可以與我說，也就答應了。這處 360 號樓位於安城新興的一處鬧市街區，原先是安城城區北面的工業區，後在政府的「退二進三」政策（即城郊的一些地塊從工業用地轉為商業用地，進而達到拓展城區面積的目的）下，逐漸將廠房改建為臨街的大樓，由於地段新、裝修好、面積大，逐漸發展為餐飲、夜宵、足浴、KTV 會所一條街，成為安城夜間活動最為時興的一個地段。「360 號樓」包括縱橫將近十來個店面，高七八層，內有停車場，背靠安城現建成使用中的最高的一處現代寫字樓，地理位置極為優越。現由「金 XX」足浴城經營，保守估計年租金也該在 100 萬上下，但由於債務問題複雜，足浴城遲遲拖欠租金未交，經過時，歡萍不無諷刺：「現在國家在東莞掃黃這麼厲害，安城的這些也該抓一抓！」之後，歡萍轉到她家在北部新城區的一處診所，順便借她父親下班回家。我在診所看到歡萍爸，雖然年紀顯然已很大，但面白精神好，談吐也很清晰。上車後不久，歡萍與她爸爸就為了一件小事發生爭吵，歡萍爸堅持安城方言中的「hu」，在普通話中應為和，譬如說打麻將要說「hu 倒了」，在普通話中就是「和了」，歡萍馬上不以為然，認為在方言中念「hu」，普通話裏也該應該是古月胡，是胡倒了，說成和，就成了和局，意思不對。兩人隔著汽車前後座爭鋒相對，場面直接又親切，不禁使我感到些許溫馨。我出來打圓場說，方言口語以發音習慣為準，使用的人也不大在乎怎麼寫，很多字在普通

話裏也沒有標準對應的。歡萍爸之前已知道我在臺灣讀書，便說「臺灣人講的普通話就和我們說的不一樣，我和好幾個臺灣人相處過，知道的。」為了進一步證明這一點，他又說到蔣介石和蔣經國，十分自信地對臺灣經濟發展發表了見解，「臺灣主要就是在 1979 年從聯合國中退出，這下不行了，蔣經國只能一心一意搞經濟，如果不是這件事，蔣經國不會這麼熱衷於發展經濟」。

或許這是父女二人習慣的相處方式吧，經常在口頭上較勁，歡萍爸看起來熱愛思考，也習慣發表意見。歡萍說，雖然在 90 年代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家庭的財務，包括爸爸、弟弟和自己三家悉數由其照理，但等到大事發生，所有做決定的都是歡萍爸。然而歡萍爸有著極為強硬的個性，吃軟不吃硬，做事情的方式實際與歡萍自己的主張差別甚大，她也頗不認同。歡萍為我解釋，竺家在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在外四處漂泊，歡萍奶奶曾經在重慶開過米店，爺爺從事兵器設計工作，解放後，奶奶主張帶全家回到安城鄉下定居，爺爺被重新調配到上海的新單位後堅持留在上海，兩人自此分居。

父親向來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總是爭強好鬥。這與原來住在蘭村有很大關係，小村莊裏就我們一家是姓竺的，爺爺、兩個伯父和叔叔都在外面工作，其實就只有父親一人支撐門戶。16歲初中畢業就回家務農，什麼也沒有，什麼也不會。以前是生產隊，鄉下的宗族勢力很盛行……他用了三年時間潛心研究怎麼吵架罵人，怎麼能用語言打倒對方，而不是蠻力。……不過，年少時養成的好鬥精神，已經滲透到了骨髓，有時候會一觸即發，有時候在他純粹是展現一下嘴上功夫的快樂，心裏並不真的怎麼樣，暗地裏也就得罪了不少人。有人瞭解他的脾氣秉性也就一笑了之，有人會記在心裏懷恨一陣子，也有人對付不了他，會到我和弟弟處還怨。說白了，也就是口頭種下的罪。（竺歡萍 2013）

竺父初中畢業約在 60 年代初，竺歡萍用「生產隊」作為時空標記來和 80 年代普遍實施的聯產承包製作區分。生產隊試圖替代傳統農村的生產勞作的結

構，但圍繞血緣、宗族的競爭並沒有消失（「宗族勢力盛行」）。生產隊反而為這種競爭提供了新的方式，比如不會幹農活會被刁難。「惹」、「刁難」、「還怨」都在描述這種互動的狀態，也應該是他們自己所使用的語言。在這個特殊背景下，爭吵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時，學校教育普遍不能為個人提供機遇。竺家遠道而來，單門獨戶，所以竺父對這種互動帶來的侵凌感受就更為強烈，這促使他「花三年時間潛心研究」。這帶來表面和內在的效果，表面上村民不再敢惹他，內在的竺父也感到很大的心理滿足，開始「以此為樂」。顛倒了爭吵的負面意義，以至於不能夠感受到其他人的真實心理（「暗地裏」）。儘管，通過個人努力，後來改變了在村裏的地位，成了赤腳醫生，但個人命運的和緩並未使他重審過去的性格轉變，反而或許相反使他更堅定（「滲透到骨髓」，「一觸即發」）。歡萍身為女兒，說這是「口頭種下的罪」，是一種地方語言，也是關鍵的比喻，以把握竺父的「爭強好鬥」個性對家庭帶來的嚴重影響。「罪」用以形容一種社會生活中人身性的，長期深刻的懲罰性影響。「種下」意味著不容易了結的，或許也不會停止，不可控制具有一定自主性的事物。這段描述串聯了具有特定社會歷史背景的結構性因素和個人性格、行為習慣的「好鬥精神」的關係。並也提供了一種仿佛糾纏不休、在人群中往返、難以擺脫的文化心理感受（「種下的罪」）。但對這種「罪」的感覺，竺比她的父親更要強烈，這是因為有的人「還怨到自己和弟弟」。同時也因為，竺父顛倒性地用「快樂」等感受經驗著同樣的事物。

等到竺家的診所想要搬遷時，由於安城衛生局遲遲不批復，延誤了許多時間，最終惹得歡萍爸勃然大怒：

父親說：「但是我們為什麼要送（錢）給這些腐敗分子呢，那是助長壞風氣。這麼明顯的敲竹槓，就是喂狗也不送給他們，何況我們什麼都是合格的，就是一個小小的搬遷報告，地方也由他們定，居然故意

刁難這麼久。我想這世道老百姓要做人，要麼有權力，要麼有拳力，才能辦好事情，我們家沒有權力，幸虧敏捷（歡萍的丈夫）有武功，就用拳力讓他吃頓死柴。教訓教訓他，讓其再紅眼睛，再亂敲竹槓，你不知道開診所的同行們被他壓的喘不過氣來，又沒處申訴，我也算是做一次好事為民除害。」父親說的義憤填膺，頗有大義凜然的樣子，仿佛他就是行俠仗義之人。

之後敏捷在歡萍爸的慫恿下，蒙面毆打了安城衛生局的某位副局長，最終被捕入獄，成了歡萍人生當中的第一個低谷。實際上這種個性好強，熱愛鬥爭，好爭強鬥狠，擅長窩裏鬥的文化一向是安城的一大特點。在經濟領域，很多現在安城的同行業企業家在 80 年代事業草創之際，大都有過非常深厚的情誼，許多曾合作無間。奈何好景不長，此後往往分家，重新開廠，互相搶訂單，使絆子，寧可虧本也不讓另一方賺錢。迄今，安城人悉知本地企業家同行多是冤家，彼此新仇舊怨，絕無合作的可能。而對於那些社會經濟地位不如自己的平頭百姓，安城的地頭蛇們則常常表現出極其霸道的一面。同時這種霸道，離不開在地社會遭受暴力性治理的政治背景。安城老百姓覺得地方幹部一定摻雜在標會裏面，在這裏還有另外一個關鍵性的因素。往往與共產黨的治理訴求不相一致的，一旦群眾認定共產黨的治理喪失了道義上的正當性，變成了追逐私利的個人和集團，官員的做派常常成了反面意義上的道德先鋒，同時也就賦予了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很多逾越地方社會傳統道德體系舉止以正當性。安城的這些「有能耐」的男人們，大都在這個意義上，直接或者間接地架設其他們的生命觀。

歡萍記錄某次宴席，來了一位安城地方法院的官員，地方官員和「霸氣女」、地頭蛇，以至普通百姓之間的關係一目了然。

外海大酒店老闆娘用犀利的眼光上下打量我一翻，貌似挑選員工，又似以前的地主婆想要審訊丫頭的態勢，我很坦然迎著她的眼光，只見她中等身材，稍稍有一點點胖，穿著粉紅瑪麗的套裝，看起來有些花

俏，不過跟她的外貌和動作還是相配的。她直直看著我，很不屑一顧：「看起來老實兮兮，不是騙人的主，被別人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在安城混，沒有一定本事，不知道會怎麼死，一看就知道書生氣太濃，幹不了什麼事，是會被人吃掉的。」然後話峰一轉：「你叔叔（曾經是安城的地方幹部，擅長寫報告，號稱「安城一支筆」），我認識的，好多年前一起開會。他現在不住安城吧！看起來你們家還都有些書生氣，如今這年代吃不開的，呵呵呵。（竺歡萍 2013）

酒宴發生的時間大致在 2010 年末到 2011 年年初。會頭懷仙有一處關鍵房產，稱為「360 號樓」。此樓正面開十間、7 層樓高，內有停車場，位置優越。懷仙欠竺歡萍的錢最多，歡萍遂為首聯合十餘名債務數目最大的債主，成立合豐公司，持有這一處房產。為了減少損失，歡萍等人想找潛在的租客，將閒置的「360 號樓」利用起來。商人秦禾平正要替安城知名酒樓，外海大酒店及其所有者外海大酒店老闆娘尋找鋪面，認為「360 號樓」比較合適。所以才有此次碰面。歡萍從她進入酒店包廂開始敘述，到外海大酒店老闆娘離開包廂結束。

出於自我保護的目的，歡萍或許有意隱去了該「胖胖的」法院工作人員的頭銜。為什麼租房談判的碰面，法院工作人員會在場呢？在座的人顯然都清楚，外海大酒店老闆娘通過這種方式壓低租房價格。其邏輯關係在於，由於安城地方法院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因懷仙的債務糾紛而查封 360 號樓，這棟樓能否作為酒店的場址，是否以及具有多高的市場價值，取決於地方法院的具體行政施為。和這一權力的親近與否，既會決定外海老闆娘是否可以考慮將之作為酒店場址，也會影響到其他潛在租客，並最終影響租房的價格。所以老闆娘認為一年一百萬，價格太「鹹」（貴），而歡萍為老闆娘開價一年 65 萬，感到「愕然」，認為是「鹹菜價」。法院工作人員插話說，「她還沒說法院的事，陳懷仙這麼多債主，到時候封了，那夠你們受的了。」

歡萍對法院工作人員和老闆娘的親密互動的觀察格外細緻，描繪充滿諷刺的口吻。這是一次具體的，有地方幹部在場的經濟活動描述。應該也屬於此處老闆娘所謂「幹不成什麼事」裏「什麼事」的範疇。圍繞著此種和地方權力緊密掛鉤的經濟機會，老闆娘和歡萍之間，初一見面就頗居高臨下的「態勢」或許反而是合理的。歡萍用「直直」和「坦然」等視線和神態的互動表現這種對抗性的心理過程，雖然看似是尋常的租房合作，雙方也是第一次見面，但卻宛如理應如此地帶上了壓迫的效果，變成了對抗性的過程。其實質在於，權力的在場改變了在經濟活動互動中多方關係的性質。由於自認為在這一談判過程中佔據了充分的優勢，老闆娘既迤迤然率先離席，也一逞其教誨欲。她認為歡萍，「老實兮兮」、「書生氣濃」、「不是騙人的主」，所以「被人騙也是理所當然」。並用「混」、「不知道怎麼死」、「吃掉」等冷酷辭彙描述著「如今這年代」，傳授著生存經驗。

為什麼反復有人會說「安城沒有我辦不成的事」，「安城沒有一個人有這麼大能耐……交給我什麼都能擺平？」這種誇張的語言的真實效力和脈絡背景又為何呢？

這裏提到的秦總，生得高大英武，號稱安城城郊某村首富，仗著自己的姨夫是安城主管土地事務的某局長，強取豪奪了不少店面房，早年打著殘疾人的牌子，企業不僅不用繳稅，還可以獲得政府補貼，是鑽空子的高手，也是安城響噹噹的人物。為了替外海老闆娘租新的店面，找到歡萍處，初一見面就氣勢凌人，聽到 360 號樓背後的複雜情況，很不以為然，有些不屑一顧：「安城沒有我辦不成的事，這些都知道的，你就說租金多少，別的跟你不搭界。」

而有的人比這位秦總還要蠻橫霸道得多。如歡萍記載中的胡功公，個子矮小，為人奸險，既愛講「權大於法」，又愛說「法律是講證據的」，「我是最講道

理的，很多事情都按法律辦」，曾把人拖上山，逼迫寫下欠條，再告上法院。當得知原本是其囊中之物的陳懷仙逃脫時，馬上撕下了面具：

（胡功公）罵罵咧咧起來：「陳懷仙這個爛婊子，撒手腕撒到我頭上了，今晚就是到天邊，我也會找到她的，一定打斷她的腿，真的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的傢伙。」……胡功公和黃設兩人站在診所門口，各自聯繫人去抓陳懷仙，只聽胡功公不停提議和佈置手下該怎麼做，猜測大概到哪兒能找到陳懷仙，就像大將點兵般乾脆俐落。大約過了二十分鐘不到，有十幾個小羅羅趕到診所門口，齊刷刷聚集在一起聽胡功公派遣，胡功公雖然矮小，站在中間那架勢真有點港片中黑老大的派頭。……敏捷告訴我，這幫小羅羅是安城黑幫易的手下，易很有實力的，專門承包各種工程，有錢也講義氣，社會各處都走的通的，特別是上層關係很好，只要他輕輕說一句，安城就會抖一下的，胡功公是易的妹夫，所以能呼風喚雨。（竺歡萍 2013）

標會中的女性對這些男人，又懼又怕，但是只要是錢的事情，好像離開了這些男人，又辦不成。歡萍記載參會的女性們，在倒會之後，特別是那些臺面上的女人逃得逃、抓得抓，徹底倒坍之後，往往又會向這些「有能耐」的男人求援，她們感慨：「一群傻女人，女人最沒花頭了」，「還是男人有本事得多」。但這些男人的做事方式，無疑更加殘暴，更加自私，或許也更有手腕。女人面對男人時的這種困境，簡直一如農民面對村裏的惡霸一樣。我在 T 村訪談時，由於村裏土地分配醜聞越演越烈（這在安城實在非常普遍），村幹部和普通村民關係極為緊張，我問：「既然明知道這些人有問題，為什麼還選他們做村幹部呢？」，村民回答：「沒有辦法啊，只有他們還能辦事。」這不由得讓人想起秦總老掛在嘴邊「安城沒有我辦不成的事」，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是一股多麼神奇的力量。

這些「有能耐」的男人們表現出來的種種，顯然是前述標會中的大會頭被會員們認為「硬氣」、「豪爽幹練」、「有本事」的重要背景。易言之，在地社會的普通人在地方官員幹部借助國家權力充分施為，無有滯礙的權力治理背景之下，早

已熟知將這種暴力性進一步延伸、蔓延至常民的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對於獲取或者鞏固自身的較高階序的社會位置的重要性。同時的，也由於這種延伸必然地包含了貪腐、徇私等副產品，且已預設了黨國權力在道德化自身之外極具反差性的實際施為，更賦予了地方社會的種種暴力性展演以反倫理的意涵。依循黨國治理的官方邏輯和在地道德體系，人們一邊看不起這些「走小路」暴富的人，對其嗤之以鼻，起各種外號，一邊又很懼怕，並不自覺地也依循著完全相同的脈絡去設想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展演，視之為在「社會」中生存/生活的不二成功法門。這一點也是跨性別的。不過，此種「被污染的社會」和「反倫理的權力」共同交織下，仿佛須不斷克服自身與社會的倫理紐帶方能攫取更高社會地位的主體性，顯然又並未全部統治常民的身心。經由經濟泡沫破裂帶來的反思契機，以及在標會中共用著同一受創性情感體驗的普通參會者，仍有著相當同情性的彼此連結，而與前述冷酷自利的主體性截然不同。顯然，2010 年標會的失敗，並非安城常民經歷的第一樁社會急轉與經濟劇痛，這種彼此矛盾衝突的情感經歷和展演方式，是理解當代中國社會中的「激情」的重要線索。如果把一部分投機性經濟稱為「騙局」的話，氾濫於中國的「騙」的現象，如上述分析所呈現的，顯然深深紮根於社會當中的各種形式暴力的共構。

## 總結

標會常被放置在「現代—傳統」，「正式—非正式」的其中一端，作為與銀行等正式金融體系相對立的民間融資工具來考察。在此一脈絡下，不少研究亦樂於發現標會所具有的道德價值，以及在何種在地社會的道德經濟中，行動者被賦予了在國有金融體系下所不具備的金融權利。如 Geertz 考察印尼標會「*arisan*」，發

現參與者並不將之視為是一種經濟制度，而是一種社會制度，有著強烈的凝聚群體的儀式性價值；又如邱建新（2005），將標會的產生和倒會，放在在地社會的傳統信任文化（「只錯時辰、不錯日子」）的培育和破壞的線索下理解。然而，如果詳細考察標會行動者們的生平、情感經驗以及對當前中國社會的社會經濟生活的諸種也為彼此所共用的認識，「傳統」標籤便殊為可疑。

絕大多數報導人，特別是標會活動的活躍佼佼者具有高度的同質性。這裏的活躍有兩重意義，一方面是指行動者善於且不乏創新性地使用標會工具，同時也意味著她們積極地建立能夠包裹此種物質/金錢關係的社會連結，到了安海之外的縣市也能夠有一番作為。另一方面是指，除了資金積累與債務得以不斷延續的物質性需求外，這些行動者亦相當樂於進行此類社交活動，以持續獲取自我肯定的情感和認知經驗。這些人所樂於進入的這一特殊行動場域具體為何，何以與單位、家戶等其他傳統社會經濟場域不同呢？顯然，將女性標會在此意義上等同於民間社會或者傳統有極大的誤導性。

我用「經濟棄民」（economic pariah）一詞概括標會主要參與者，意思是她/他們多有在經濟上或出於經濟考慮被遺棄的經歷，往往被視為低效/低能的負擔，無助於提升經濟競爭力，也隨之丟失工作、離開土地、犧牲受教育機會、負債、經濟事業經營失敗等等，她/他們皆具有下述幾大特徵：

- 1、參會者約七八成為女性。
- 2、年紀約在 40-60 歲上下，主要是 60 後生人，部分是 70 後或 50 後。
- 3、受教育程度有限，多數為小初學歷。普通話亦多不流利，講話多帶濃重的口語助詞，如「嘞」、「咯」、「嘎」。
- 4、多數出生于農村，初多在家務農，或者在鎮上做小手工藝人，或在各級

鄉鎮、縣一級企事業單位做員工，經歷了下崗、內退、提前退休，自身經營事業萎縮，全職在家，或重新尋求工作未果。多數無固定職業，整日賦閑。

- 5、1990 年安城倒會時，多在適婚年齡，經歷負債逃亡，辭職，或賠光年輕時的積蓄；2010 年安城倒會時，子女又多在適婚年齡。為子女結婚、買房，是普遍動機。
- 6、30-50 歲的二十年（1990 年代晚期迄今）中，安城經歷了城市的快速擴張伴隨房價急升，大量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區。城郊農村空間重整，農民或農民工變成無工作的收租人。
- 7、生命經歷黨國體制治理方式的多次轉變和地方社會的快速變遷。

如果說「傳統」意味著現代國家及現代經濟活動遂行其邏輯，施加重整/改造偉力的物件，此處有著強烈社會參與動力與激情的「經濟棄民」，不如說是此種改造活動在不同時期的「殘餘品」，是為了經濟馬車不斷加速向前，而被遺棄、削減、被迫自我消化的經濟成本。晚近時空背景下的標會實質意義為何？何以這些「經濟棄民」忽然地又轉變為在地社會金融活動的核心，成為通過情感和人際活動，轉移銀行流動性的新型勞動力呢？或許，此刻被想像為中國經濟轉型的金融風險承擔者的「經濟棄民」們，再一次的「由於經濟考慮」而被犧牲了。

本章節開頭，呈現了標會中貌似矛盾的現象，標會在運轉規則和人際互動表面上的平等性，以及標會內大會頭/套會利者和普通會員，在對標會運轉控制上的不平等性。「叢林中的人情社會」則試圖對這一現象做出討論，何以這一種支配能夠產生，而其他人似乎毫無還手之力呢？非常重要是在當代中國社會中，「社會」作為一個行動場域的特殊性，我稱之為「受污染的社會」(polluted

society)。在和党國治理緊密相對的關係之下，人們常常主動將個人的道德展演切分為兩個部分，並順此一社會脈絡性而有截然不同的情境和情感經驗。標會恰恰體現了這兩個方面的矛盾融合，不論是過度信任和高度防範，都使大會頭/套會利者有了相當程度上的操控自由。當這一點和金錢作為社會動態變遷的重要中介相連結時，更加強化了大會頭/套會利者的操控能力。「家戶內外的女性」則試圖說明，在一個鮮明的父系支配社會下，女性被持續抑制和遮蔽的社會位置，使她們特別渴望在彼此之間建立同情勸慰式的情感關係（如，「小姐妹」），這種情感和親密性的迫切動力，延伸到標會運轉中，成為支撐性的條件。「異類偶像和感染性展演」則揭示，大會頭表現為魅力非凡的「霸氣女」，在於其挪用了安城在地社會男性陽剛氣概的內容，成為其他普通女性的情感和精神服務提供者，使其他會員相信她們具有超常的能力，同時，具有刺激其他女性想像並實踐，突破種種性別桎梏的感染性展演和金錢力量相結合，使新自由主義時期支配性話語所預示的主體性，在在地社會被具體地呈現出來，在地常民難以抗拒此種自我躍升的、仿佛高度自由的生命狀態。「安城的男性陽剛氣概」則說明，「幹練」、「霸氣」的大會頭對男性陽剛氣概的挪用，何以竟然迅捷地導向一種反倫理的實作，標會「騙局」的出現，來源於党國治理下在地社會的多重暴力重構。

總之，基於前述分析，不僅多數女性在這一巨變社會中，強烈地經驗到自身的卑微，仿佛永做替罪羊的社會位置，同時也於在地社會的男性他者身上，習得了反倫理實作的「霸道」展演，此二者的彼此交織，構成了安城女性激情式地全情投入標會的精神/情感背景，既不斷賦予標會（以及後續如傳銷、六合彩等）此起彼伏的頑強生命力，又使其有著提前確定了的悲劇性宿命。

正如許多標會的參與者所說：

「安城的標會不會真正結束……而標會總會倒的。」

#### 第四章「麻將」經濟

當我於 2015 年年初再一次回到田野場址時，如曾風靡標會似的，安城又陷入到對六合彩的癡迷中。以我的報導人素娥為例，1990 年標會倒會時，她便欠下鉅資（雖然具體數額，眾口不一，但約有幾十萬，「可買很多套房子哩」<sup>43</sup>），2010 年倒會後，她又重返安城，重操舊業，近兩年則以做六合彩小莊家為生。關於這筆新生意，素娥與我說：「只要待在家裏，有部電話機，買的人打電話進來，抄一下，其他一切以香港的六合彩公司為準。彩民打電話進來，如果數額在 1000 元以下，就吃進；如果數額在 1000 元以上，就予以拒絕，換轉給資金承受能力更大的莊家。」我再細問時，素娥又語焉不詳，說她們只是賺取傭金。後來，另一男性報導人康平對我說，「哪里是靠傭金的，都是「截胡」。他與我解釋道，六合彩<sup>44</sup>包括 12 生肖加數字，獎金比率是 1:49，舉例來說，如果一個人投注 2 萬，當期中的話，就是 98 萬，而沒有中的話，投注的錢自然不會歸還。名義上是代為投注，實際上就是直接吃進彩民的錢，因為絕大多數時候彩民當然不會中獎，獎金就可以吞沒，這就是「截胡」。截胡是麻將的說法，意思是打出一張牌，同時有多人可以胡牌，處於上家的胡倒，其延伸意思為搶走了其他人的發財機會。素娥與康平都告訴我，如今安城這樣的小莊家和熱衷六合彩的彩民已經滿城都是了，並且為我舉了和標會的故事頗為接近的暴富傳奇和悲劇故事。暴富傳奇是一身份不明的男性，因為六合彩坐莊，已經連續在紫荊花園（安城新開發的商品樓樓盤，價位和品質都處於最高水準）買了好幾套房。悲劇故事則是以一位安城男性企業家為主角，由於接連兩次中獎，各種了一個一萬（獎金 49 萬），一

<sup>43</sup> 當時安城一處公寓樓的價格，大概在一萬元人民幣。

<sup>44</sup> 據相關研究和報導，大陸地區無法登陸香港的六合彩網頁，故流傳的都是非法六合彩，香港六合彩是 49 個數字選六個，大陸非法六合彩則加上生肖圖等，結合了傳統「字花」的賭博特點。這裏報導人康平所說的，應該是安城地區流行的一種「香港六合彩」。

個兩萬（98 萬），決心放棄辛苦經營中的企業，全心投入六合彩，結果現已經負債倒坍。康平和素娥都曾極深入地涉入到標會中，兩人除了都出身于安城農村，性別、年齡和生活軌跡都有相當大的差異，為何現在又同時地對六合彩表現出這麼大的興趣呢？反過來，這又對理解他們投入標會提供什麼解釋呢？

對標會的研究有時會給我這樣的困惑：標會是一個獨立的行動場域嗎，在它圍繞會員/會腳建立起來的資金聯繫、利息、週期之外，不是顯然地連結了會員們往往同質性的社會訴求嗎？然而這個問題並不像表面上那麼容易。涉及到會的兩個最基本的問題，都不太容易回答：首先，究竟多高的利息，可以判斷標會已經從有益的融資工具轉為自我維繫的騙局了呢？在近二十年的社會財富急速膨脹中，這個問題並不單純和標會內部的資金關係有關；其次，倒會的發生究竟是內在資金鏈的瓦解，還是外力干預的結果？一開始我覺得發生於 2010 年的安城倒會，一定和 08 年的金融危機以及由此導致的外貿市場萎縮、銀行過度放貸有關，然而各地的標會案例仿佛可以發生於中國近三十年的任何一個時間節點。

這裏的問題，並不在於是否要更細緻地算計標會中各種因素/風險的數學關係，而在於如何想像會的基本形式。對於同一個行動者來說，她的標準形象或許是兒子要結婚，她為了買房需要籌集資金，或者決定將儲蓄放貸到標會內。對於她來說，標會本身能否持續或者恒久，不見得那麼厲害關切（有的人也表示，「我只在特別需要錢的這一年，加入一個會」）。易言之，在標會中存/取資金者都有各自的時機，而且往往逾期不候，這個時機既連接著非生即死的市場機遇，也連結著「一生一次」（如結婚）的生命歷程。另一方面，會頭/套會利者要努力維持標會的資金不出問題，不能到了會期繳不上錢。表面上看，大家在一個會的平等位置（至少在規則意義上），然而當把這種資金捆綁著人的關係統稱為會時，也

就跨越了兩個不同的時間軸線，前者更緊密地扣連著「歷史時間」，也給予了會以特定的歷史座標和不同的有待金錢啟動/關閉可能性的人的具體生命情境，後者則又連著「會的時間」，是資金鏈的契約本質，是債務能否由高額利息和人際拓展不斷吸引來的新錢暫時補上的時間性。除了會頭外，絕大多數普通會員當然不在乎後者，也在乎不來，也只有將他們從這種「責任」中抽離出去，會才能蓬勃發展。之前在第一章的轉出神奇一節中，已述及絕大多數會眾對於會的利益來源皆模稜兩可、或許也並不真在乎的奇怪現象。

上述略顯繁瑣的分析是為說明，表面上看，在一個會中，為了資金的借出/投入而來的普通會眾是在一個經濟合作關係中，而將承擔信用功能，同時能夠無息獲得頭筆會款的會頭，無疑更需要為這筆錢找出路，顯然比其他會腳更可能變得有投機性，事實也的確如此。當會之間普遍串聯在一起時，套會利者固然使用了詐欺的手段，其行動邏輯卻是相當單一的，就是不斷獲取新錢償舊債。相反，普通會員在或許明知道會利的高升伴隨著巨大風險的同時，仍然選擇進入標會，又顯然地帶著另外一種不一致的投機色彩。此二者不能簡單等同為一。例如，認為參與標會的人都很狂熱，等等。在這裏，我使用投機性一詞，並非為了對標會做某種道德判斷，而是要指出，在上述「歷史時間」的意義上，我們的社會不是早已預設了個人必然地要運用其全部身心投入到一個所有人均須充分發揮其能动性/逐利性的普遍關係中，並視之為社會秩序運轉的必要基礎嗎？關鍵的差異在於，並不是「投機」的人才成功，而在於不「投機」的人顯然失敗。在已成為在地社會普遍的價值衡量語言中，「你有幾套房？」，顯然未將人生幸福的基準點，設立在家戶均有居住空間這一單純意義上。

假如我們將用以正當化經濟發展及經濟差異的種種說辭抽去後，不再假設標

會是「民間融資手段」，而將之視為一種仿佛必然得與生命之繼起相連結的能動性彼此交織的場域，或許可以經由標會看到我們已被設定好了的「歷史時間」的另一本質。並也能進一步想像並且理解，表面上差異極大的標會、傳銷、六合彩，何以會在地社會的生命中前後相繼的出現。以及這一事實對我們的意義。

## 快樂時光

素娥在雲南昆明待了二十年，但她對這段經歷幾乎一筆帶過：「……就是給男人做飯，後來離婚了。我就回（安城）來了。」相反，對於標會仍然運轉時的生活，不時流露出欣快的神色：「那個時候就是很開心，而且每天都是那樣。跑幾個會？那多嘞，哪只幾個會啊。到了一個地方就會碰到不少熟悉的人，七七八八的，很多都認識啦……會不會擔心風險？每天都算今天標出去了多少。打完會之後，熟悉的幾個人就一起去吃頓好的。幾乎天天在外面吃。」標會快速的財富積累幻覺，在當下極大地拔升了參會者的情緒狀態，相形之下，參會奔波的體力消耗簡直不值一提，相反的，由於此種反常於日常壓抑的特殊勞動狀態，使得種種「相熟」帶來格外昂揚的人際聚會的氛圍，也掩蓋了伴隨著人的頻繁進出帶來的不確定感。這種狂歡節式的氣氛和情緒狀態，無疑也是對參會者平日多重限制的生命狀態的巨大釋放。或許我們也由此能夠猜測，不僅素娥不願意再做其他工作有著前述歧視性因素（「像我這種，除了餐館廚房裏洗碗筷，或者去別人家裏做打掃，找不到別的工作的。」），而且以收穫的愉悅感而言，參加標會不僅超過了中年女性能夠從事的勞務工作，而且也超過了家庭生活。所以，對於素娥來說，在 20 歲剛開始工作不久就參加標會，時隔二十年的逃亡生活後再次參加標會，再到近年參與到六合彩，便不僅是「經濟棄民」的被排除迴圈，而且還是對自身

快樂生命記憶的重溯。

此處隱約可見的「排除—歡愉」模式，在幾乎每位報導人身上，都似乎帶著一點痕跡，並反復起著常民難以抗拒的作用。如經營小家電經銷生意的康平的自述：

「我當時很輕易地賺到了錢，但人還是「小土豪」，沒文化，**結交不到更高層次的朋友**。身邊在一起的人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小土豪」，經常出去玩，KTV、釣魚，也沒有別的收穫。……後來經濟環境變得不好了，人的壓力就很大。唯一能夠讓我感到放鬆的方式，就是去 KTV。**那種感覺是你體會不到的**。越沒錢、越有壓力，人卻越想去。很快身上的錢花完了，當時各個銀行都鼓勵個人辦信用卡，我就辦了很多張，輪換著刷。後來卡債欠多了，就跑路了。標會的錢也借過，但總的來說，我從標會裏借的錢是不多的。」對於康平來說，他的被「排除」意涵相比於素娥，也許少了性別和階級的因素，但卻凸顯出在當代中國可能更重要的區分，即知識主體（intellectual subject）之間借著教育投入和智力競賽帶來的「素質」差別（Anagnost 2004）。也許當生產主體和消費主體在當代社會前所未有的彼此交織時，一旦個人在其作為生產主體上受到限制，會使成為消費主體變成額外有誘惑力（且在各種在地形式的投機經濟下也是可及）的選項，金錢/物欲也有了強烈地彰顯身體價值的意義，是排除之下的巨大誘惑，或許也是康平所說的我（工作可期的研究生）體會不到的感覺。

這種與消費相聯結的激昂的精神狀態幾乎所處可見，而且有時明顯既使消費者本人，也使旁觀者覺得並不理性，同時也變成前述感染性展演的一個重要組成。安城人普遍自嘲，一個安城人假如年收入有 10 萬，就敢銀行貸款買 50 萬的車，手上賺了 50 萬，就敢馬上去買輛 100 萬的車。更有不乏諷刺性的說法，「中

國消費看 XX、XX 消費看安城」(此類說法在中國各地似乎都很普遍)，意思是安城人熱衷超前消費，嗜好喝酒吃請，購買豪車。同時，安城但凡有志向的年輕人，都不把留在安城工作生活當做有意義的選項，相比於「北上廣」，安城的生活似乎格外乏味平淡、道德狀況落後、各種資源匱乏。過度的消費和價值上的自我貶低，在當代中國絕不是安城一地的現象。

何以對素娥來說，不僅標會/倒會不成為其控訴個人或社會問題的理由，反而成為其記憶與實作皆頗可回味的美好時光呢？最直接的理由當然是標會的高利息誘惑，帶來的唾手可得的愉悅，但進一步的，我們似乎已經很難再從經濟人理性及將這一理性適用於生命歷程帶來的時間性，對真與假的判斷，去想像以素娥為代表的人的生命狀態。事實上或許也是必然的，當社會中的一部分人將資本積累 (capital accumulation) 視為生命的根本目標時，作為資本積累活動的外部，素娥等人便不斷地承擔著經濟活動的外部性和社會再生產的成本，掙扎于生存的邊緣，所以「成本」在他們身上，是緊密連接于生命再續的此刻生機，而與前一類人有著根本不同。易言之，在這種生存成本出發所作的投機性活動，也顯然有異於資本積累脈絡下的投機性活動，風險的意義相應也被極大壓縮了。從觀察的表面看，「經濟棄民」的勉強糊口（或在其眼中並不值得一過）的生存狀態與暴富投機便徑直連結起來。

嗜賭是幾乎同時性的另一社會現象。安城有著各式各樣的賭場，具有典型在地特色的是「山中賭場」。安城自然風光秀麗，圍繞城區周邊的山嶺地帶開發出可供健身、登山的步道。不少賭場便流動地設置于這些山道邊，並設置許多崗哨在周邊掩護探測。一有風吹草動，參賭的人就能以運動健身的名義快速散去。另一些賭場，則直接設置在各種城郊村中。參賭者涉及到社會方方面面的人。籌借

賭資是標會高利息的一個重要源頭。安城本地某主要地方幹部的兒子一日因賭債纏身，從某安城著名大酒店的頂層房間一躍而下，引起極大社會轟動，也成為安城清理標會活動的其中一個直接契機。

安城政法系統的中年男性報導人說：「標會的利息很高，一般開廠做正經生意的哪有賺的來那麼多錢呢？這些高息的其中一個主要來源就是賭博人。安城有不少黑社會在經營賭博的事業，很多城裏有頭有臉的人家，家境很好的也去賭。輸了沒賭資了不好問家裏要，就先去標會標點錢出來。反正也是著急拿去賭博的，利息高點也沒什麼。只要有錢在手，就好去賭了。安城標會的問題跟賭是連在一起的。……不止是有錢人，像普通農民有錢後，風氣也不好，T村的情況我們早就注意到了，他們賭博很凶的。標會只是其中一個因素，根本不像他們說的那樣（「被城裏的壞人騙了」）。」賭的現象被地方官員歸因於農村農民素質低下，或者品性不端，可能再一次地強化了農村/農業生活（或許進一步的也包括三線城市安城的生活）完全不值得一過的光譜化邏輯（Ann Anagnost 2004）。

另一超常的快樂表現為性。安城的性工作場所主要分為兩類，其中一種相對廉價，是街邊的洗頭房，在安城已有很長的歷史，大都有著標誌性的粉紅色燈光，另一種是康平提到的 KTV/會所，往往有著歐洲宮殿式的外觀和內部裝飾，外牆放置有大理石柱和西方女性雕塑，充滿了異域風情。阮新邦（1998）對 90 年代廣東白秀村（化名，深圳開發區附近）的調查提出，由於發達的製造業帶來大量外來女工，白秀村的性產業隨之高度蓬勃，男性皆以追逐性欲滿足作為生活的首要目標。期間，一方面女性的自我意識不再服從於傳統價值三從四德的教誨，另一方面男性對於性的急切追逐與滿足的衝動又遠勝於過往，許多男性受訪者認為只要給家裏足夠的錢就好，大大減少了對家庭的情感投入，使得當地女性和外來

女工都處於一種吊詭的悲情之中。安城雖然沒有如廣東般龐大的外來人口，但發達的性產業如出一轍。安城本地男子亦十分熟悉這一公開的秘密，並也樂於和我分享經驗。此外，包二奶之類的故事也是稀疏平常，是前述動盪的家庭情感生活的一個重要背景。歡萍家亦在 90 年代初期，以治療性病作為獨門手藝，賺取了第一桶金。標會中的女性獲得金錢的力量之後，亦同樣效法本地男性的種種作為。或許也可以將此種快樂，理解為是對在家庭的情感天地（affective universe）中被排除的補償。顯然，快樂的感官經驗成了自我證明有價值的主體的重要工具，並進一步描摹出在地社會的有限生命情境。

#### 逃亡與傳銷大學

倒會結束對多數人而言，仍需要另找謀生之法。除了極少數的例子外，許多倒債的會頭都會選擇逃往其他地區。戲劇性地，受到倒會影響波及的會頭/套會利者，以及普通會員竟然再次以極為相似的方式聯繫起來。

「安城街頭到處傳來某某某逃跑的消息，究竟跑了多少人，也無從考證，只是從最初的逃跑新聞到司空見慣，很多人已經麻木了。聽說福建有個搞傳銷的地方，一窩子都是在逃的安城會頭，他們大多聚住在一起，再偷偷聯絡安城的會員和親戚朋友，極力慫恿他們傳銷，很多人為了重新賺錢，又一次被會頭欺騙。」

（竺歡萍 2013）不少報導人認為，安城標會倒會後，逃亡外地的人蜂擁著加入傳銷，是普遍的現象。

有些人近乎於以極為相似的方式進入到第二個「圈套」中。比如前述的 T 村打工木匠傑東，在倒會後，由於欠了銀行債務，為了能儘快賺錢還債，他不能夠像原本期待的那樣，依靠放貸收息在家安靜度日，享受和妻子兒女團聚的時

光。有人告訴他，福建廈門有「溫家寶特許經營的金銀連鎖業」，讓其去廈門看看，就此他成功地變成上家發展出的其中一個下家。而他需要負責帶三個新人進來，以填補之前繳納的費用，並最終獲益。報導人反映傳銷的說法和稱呼各有不同，但規則設計頗多類似，一般新人進入傳銷，會以各種名義繳納 5 萬元人民幣上下的錢（如康平參加的傳銷，上繳 7 萬，當即返還 1 萬九千元作為活動資金，並承諾如果半年沒有發展出下線，退回全款），每一級新人需要發展出三個新下線，此後所有下線以及下線的下線的人會費的其中一部分會按比例返還。由於心性木訥，被給予這一傳銷任務的傑東不知從何開展。不久後，他便從廈門回到安城，最近則預備重拾木工手藝，去廣東的一處傢俱廠打工。安城早年外出打工者多是木匠，有能力的後來在全國各地開辦了傢俱廠，廣東佛山有安城傢俱業聯合會。他已有朋友在那裏，並告訴他做得還不錯，預計每月工資可過萬。

如何理解上述兩種人際聯繫帶來的不同經濟活動呢？依照同鄉/親友網路前往異地尋求機會，在中國社會中似乎具有廣泛的普遍性。對於如傑東這樣的個人來說，從打工到標會、再到傳銷、又回到打工，每一步都有具體可信任的人提供指引，他就好像穿梭於具有家族相似的一系列人際「變形」之中。他的人生每個下一方向幾乎悉數由這一些變形構成，而他亦無抵抗力地只能從其中一個步向另一個，債務或許只是加速了此種跳躍的過程。由此，或許也能理解，前述同一群人在標會倒會之後，竟而重新組合，競相奔至福建之後，復又在安城在地社會中重建出一「遠方樂土」（足以既逃避家鄉的糾纏又能延續經濟生命），吸引更多人前往。某種程度上說，這種仿佛不斷延續而繼起的親友鏈條，既具體地部分緩解了倒會帶來的創傷和衝突，似乎也提供了個人再次社會化的基本條件，儘管僅就經濟層面而言，如傑東這般投入「金銀連鎖業」只能是飲鴆止渴。標會和傳銷

的另一個區別是，標會在普通會員和活躍的套會利者之間並不必然有種角色轉換機制，很多標會的會腳只滿足於會腳的角色，而傳銷則更直接地將這一角色轉換放在核心位置，傑東需要從搭便車的附從者，轉為社會與物質關係的鏈條繼續延伸的積極拓展者。他也需要去學著解釋何為「溫家寶特許的金銀連鎖業」，學著在親友中尋找可能的下家。從結果來看，他並未完成此種自我重塑，而以我的觀察來說，除非有更特殊的契機，否則這對於傑東來說就絕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訪談的整個過程中，他一直帶著小心翼翼的表情，雖然顯然對我也並沒有任何懷疑，並也非常配合訪談，但也絕不添加發揮。後來從他的其他親友口中，我知道這是他心性使然。但是，傑東的這種難以轉換角色的困難（儘管他肯定很想，因為他在安城的房子馬上面臨要被賣出以償還銀行借款），並不只說明了傑東無法依照活躍的人際活動獲得收益，在此一能力上與前述懷仙等女強人遠不可比較，而且也反映出這種轉變所牽涉到身體、記憶、習慣的深刻抗力，絕非僅僅只是「說謊」而已。

康平對這種轉變有著更深的體會。康平聽我說起傑東，立刻笑說他肯定不行。他們二人原在同一片山鄉長大，又是中學同學，彼此十分熟悉。年近 40 歲的康平擁有一副旁人稱羨的外貌，也有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似乎很有助於這種轉變，我近乎下意識地同意了他對傑東的評價。康平進一步解釋：「傳銷有著非常合理的設計。每個人都須要去發展下一級，每一級三個人，那三個人再往下發展，你自己往下總共 7 級，自己是第八層，滿級之後，你便自動離開出局了。總共三條線都滿的話，是 700 多萬，一條線滿大概 300 多萬，一個月能發展出七層的話，一個月就得到了，很快，人很多的，幾何倍增。發展下家，要考察，相中了之後，單獨談話，往返飛機票，吃住這些都要錢。所以我發展下家一定會找有潛力的，

找人才，哈哈，人才就是背後有人的人。首先他有沒有有錢的朋友，在他的朋友眼中，他是不是個靠硬（值得相信）的人。看他有沒有這個時間，也是很重要的，自己辦個廠，根本沒時間。（傳銷）各方面都考慮的很周到的，很科學的，分析到人的心理學等等。像傑東那樣，顯然不會再有下一級，招進來也就賺他一點錢，我的未來肯定也受到影響。所以我要很慎重去選擇。結果也還可以，至少一開始我投入的錢都收回了。我下面的人不發展，我就急，當然他們也急，我就要幫助他們，不斷找他們談話。」經濟收支卻還不是康平最在乎的，他說，「出去在外面的幾年使我改變了很多，也讓我擁有了一副好口才，有了知識，這是最大的收穫。**傳銷對我而言，就像大學對你們一樣。**」

康平試圖與我分享他的傳銷經驗，扭轉我對傳銷的負面看法，儘管我此時並沒有表現出對傳銷有何種態度。這可能是因為，中國傳媒對傳銷有長年累月的宣傳，往往伴有恐怖描述，圍繞人身拘禁、毒打施虐、生存條件惡劣、逃跑等情節。從敘述內容來看，康平所在的傳銷組織在類型上應有所區別。

康平的敘述主要有三個層次。首先，傳銷之所以能夠存在，依賴於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的特殊邏輯。儘管是非法活動，國家亦大力禁止，但卻仍有很大的活動空間。康平認為，傳銷主要在廣西、雲南等中國西南邊陲盛行，除了在這些地方有長期歷史外（「老祖宗」，可能獲得了和標會類似的在地性，或者「土」），主要由於西部經濟落後。傳銷活動涉及到吃穿住行的開支，將活動中心安置在西部，能夠節省成本（「當地租房子本來租金很低」），與原鄉（如浙江）也有距離。最關鍵是，康平認為「國家」會默認在西部的傳銷行為，原因在於能夠促進經濟。

「昆明是西部，國家支持，西部大開發，招商引資不可能，只有靠消費拉動經濟。我們過去到那邊，吃喝拉撒交通，全部消費在昆明」。「國家」會制止和幹預有其

限度，在於有沒有人「告」，人是否足夠多，「擾民」了。這裏的擾民，首先指的是廣西和雲南一帶的社會秩序。然而，由於能夠從傳銷人員身上「賺到錢」，康平認為當地人都「高興死了」。所以儘管傳銷是非法活動，可以想見當地人也都默會知悉，「進貨的人都知道」，但他們普遍對傳銷接納度很高，甚至很「尊重」。

其次，由於傳銷組織依賴於前述存在條件，傳銷要能長期運作，「管理制度」就很重要，要確保不會「節外生枝」。這就帶來一系列康平所參加傳銷的組織特點：自律嚴格（高壓線、電話敲門）、擬親屬關係（租套間、以「家庭」為基本單位）、對外禮貌尊重細節高要求。這些組織方式，有助於規避前述分析中的政治風險，在前述傳銷活動參與者理解的意義上，確保不擾民。

最後，既然傳銷組織可以並不妨礙國家，也不妨礙在地社會，靠不斷新加入傳銷組織的參與者的資金供給而運作，這些「受害者」又是怎麼想的呢？例如，本來抱著賺錢發財的目的去參加傳銷的康平，既然實際上並沒有賺到錢，為什麼仍然對傳銷有著相當積極的評判呢？要回答這一問題，在康平的敘述中，「上課」、「知識」、「口才」、「能力」、「書」、「心」、「禮貌」這些與教育有關的概念，佔據了關鍵位置。「家庭」、「戰友」、「朋友」、「無私」等情感關係的描述，構成另外一條線索。是這兩條線索，使康平覺得雖然花了錢，但仍物有所值。從重塑自我和生命經歷的角度，進一步認為「我們的傳銷就相當於你們的大學」。「教育」之所以成為傳銷活動的核心，直接原因是傳銷的鏈條式結構。下一級的「能力」（口才和進取心，也即能繼續吸收發展下線）是上一級的資金保障。如果下線沒有什麼「反應」，康平就會很著急，要談話、教育，要帶去上課。但是「教育」在這裏，顯然也超越了傳銷組織自我維繫的最簡單的工具意義，有了在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的背景下支撐傳銷活動的深層意涵。同時這也是政府和傳媒等中國官方

機構無法設想的。一如康平所感覺到的，參與傳銷，使他個人煥然一新，完成了期待已久的自我轉變。這一深層原因，無法被金錢鏈條的表面理由所掩蓋。同時，儘管康平使用了大學的類比，但他對於大學教育在此一脈絡意義上，實際上頗為不屑，「這個人厲害嘞。每天帳戶進賬都上億的。你沒有接觸過生活，你不知道的。我們看到的東西太多了。」

在這裏，康平心心念念的有能力的「我」和「我們」究竟為何？為何傳銷這一非法活動比大學更能鍛造出這樣一種中國社會中人們或許普遍渴望的「我」呢？

似乎傳銷也提供了參與者一種參與情感勞動（affective labour）和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的機會，也即康平口中的，「屬於我們的大學」。在這裏，個人成就的多寡，依賴於他的自我發展的程度。也經由這種自我發展，原來在安城鬱鬱不得志、自感由於教育限制而無法結交朋友的康平，在昆明這一異地他鄉的省會城市，竟然獲得了全方位的社會參與感。在他的記憶講述中，隱隱然地指出他通過傳銷這一職業獲得了在彼城市的公民位置，保安和菜市場的阿姨都對他們很好，當地經濟極大地仰賴於他們所從事的「灰色經濟」。這固然指出了，在當代中國的區域經濟競爭中，爭取和利用流動資本對於城市的重要作用。同時也道出，自我發展和學習，以及以此類知識經濟活動為基礎的人際關係已經成為今日中國個體想像和欲望一副新身心的無休止過程中關鍵性的概念，同時這一過程又和消費等新型經濟緊密結合在一起。若依照這一理解脈絡，中國的大學和大學教育無疑也深入到這種自我轉化機制中，並也或許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大學才能符合社會給予它的期待。康平說，傳銷就是他的大學，非常適切地捕捉了二者的相似性，反映出結構性弱勢的群體和中國當前的標準社會化（白領化、中產化）

圖景之間的緊張。

### 「麻將」經濟

除此之外，康平還大致為我介紹了幾種他瞭解和涉及的「灰色經濟」，除了前述金銀連鎖業、昆明傳銷、太平洋直購、六合彩，還有與六合彩相關的玄機圖<sup>45</sup>，一種網路虛擬貨幣「暗黑幣/黑暗幣」(Darkcoin)<sup>46</sup>，蓋網<sup>47</sup>等（康平最近則主要兼職做和尚，也通過手機微信做微商）。它們和安城標會曾經的盛行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呢？中國正在變化中的內外經濟治理，多重治理下的在地社會，和氾濫於民間的種種「灰色經濟」，投機經濟，高度依賴於人際網路和人際活動的傳銷活動，又有什麼關係呢？月娥、康平這樣的人，一方面背負著沉重的債務，夫妻離異，還在基本生活保障線上掙扎，卻也同時似乎必然地投入/捲入到充滿暴富夢幻和風險的投機經濟中，又能給我們什麼樣的知識上的啟示呢？這些此起彼伏的新經濟形式，又如何從中國社會過往的實踐中汲取資源呢？如果按照最一般的描述，同時也是官方解釋，將它們統統歸入到非法「騙局」的範疇中，把受騙上當的人視作無知和貪婪的素質低下者，似乎無助於想像和理解，正在發生中的這些經濟行為和中國支配性的經濟模式和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而事實上，這種聯繫顯然存在，而我們也至少無法把顯得如此機警和老成的康平和素娥當作易上當的受害者。中國的傳媒上充斥著種種傳銷和詐騙的新聞，然而，在現有的中國社會機制下，我們能夠把康平和素娥從這種「非法騙局」中「拯救」出來嗎？用什麼樣的方式呢？或許這既不是康平和素娥歡迎的，而且也是做不到的。這種做

---

<sup>45</sup> 中國大陸流行的非法六合彩，恢復了傳統「字花」的特色，彩民在開彩之前會購買「玄機圖」，上面是一幅畫配上一首打油詩，據說可從中解出當期中獎號碼

<sup>46</sup> 虛擬貨幣「暗黑幣」躉紅，一個月漲 15 倍 <http://tech.sina.com.cn/i/2014-05-27/09599402739.shtml>

<sup>47</sup> 和太平洋直購網差不多，以電子商務和網路銷售平臺為包裝的傳銷，主要吸引老人

不到的背後，同時包含著我們正在運作中的經濟和我們想像經濟運作的意識形態之間的某種斷裂。而或許，這些問題也絕不會只有單一答案。

在某次冬日的訪談過程中，我坐在一角，而其他人正圍聚在旁觀或參與搓一桌麻將。浙江的冬天很冷，那天還下著雨，在外面直感到冰寒刺骨。所幸屋子很小，人又很多，麻將桌邊上的地面上擺著個火盆。火盆已經燒成黑色，但依稀看得出來是個搪瓷臉盆套在一個廢舊汽車輪胎裏，裏面燒著碳，用鐵鉗子撥弄下，就會燒得旺些。「這（火盆子）是山上的特產哩！」，「前幾天我們拿竹子來燒燒看，可能是通風不夠，結果差點都中毒了」（在沒有取暖設備的江南，為了節省空調電費，這或許是廉價但危險的土方法）。除此之外，大家聚精會神地打著麻將，並有餘裕的和我分享對當前中國的經濟下行和未來個人可能發財機會的看法。此時，我正為一些問題所糾結：

為何原來在倒會中，已經覺得上當，恨死了會頭的會腳們，又會再上會頭的當（或許上當這個詞本身有問題），跑去做傳銷呢？

標會當中有著鮮明的性別特徵，但是與標會仿佛接連性的傳銷和六合彩，就沒有，那麼標會的凸出女性現象又意味著什麼呢？是否只是因為在「新傳統」下，標會已經為女性所佔據，所以儘管它在盛行中成為在地社會投機經濟的首選目標，卻已不再有餘地留給男性了呢？

如月娥描述的那樣，在她的世界中，其他二十年的家庭生活，尚不及一兩年的標會生活帶來更多的快樂，對於她來說，參加高風險的標會的意義，會和普通中產階級家庭投資房市股市一樣嗎？對所有這些在生活保障線附近生存著的人，中老年、女性和「經濟棄民」，集體捲入投機性經濟，又有什麼樣的社會意義呢？

康平所說的「傳銷大學」，仿佛只有在非法的傳銷活動中，他才成功完成了此前自己期待而不明確其方向的自我重塑，他原先的不適應，和現在的適應，以及其中的轉變為何呢？究竟什麼樣的人，才是今日社會的社會化模範呢？

看著眼前的麻將，我的腦海中突然產生了並不成熟的線索。或許相信個人/家戶經由勞動、積累儲蓄/資本、參與市場投資，種種對自我的價值投資，對經濟機會的反復算計，最終實現個人價值，同時也推動社會的經濟整體進步的設想本身，是一種永無法實現、但具有宰製性位置的幻想。在對標會的理解嘗試中，圍繞著我的種種看似不合理的困惑，可能就來源於我的這種不合理設想，也來源於我與報導人們的差異位置。麻將，只有所有參與者投入的錢，彼此以特定的人際方式結合在一起（坐莊、上家或下家），每局只有一個人會胡牌，隨著局數逐漸增多，也只有一個人會是相對的贏家。但這並不妨礙所有人持續不斷，滿懷期盼地反復投入，重新以新的方式連接在一起。在安城在地社會的種種日常乏味中，麻將永遠佔據著休閒最核心的位置。或許以麻將活動所內含的心智活動和社會性想像，去理解標會以及標會後續的種種傳銷、六合彩等活動，最能夠理解當事人的知行邏輯。

## 結論

普遍認為自從 1990 年之後，世界進入新自由主義時期，全球許多地區開始實踐新自由主義式的改革實驗，也包括原先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例如中國，既大幅重整了在地社會的人與人的各種關係，也給全球市場帶來顛覆性的影響。我在此處所用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之操作型定義是獨斷性地認為人的進一步解放，依賴於市場的不斷自由化、私有化，國家從社會福利提供者的角

色退出，個人須自主性地、全身心地動員、重整其全部情感、道德倫理、社會關係實作以實現盡可能多種形式的商品化、市場化、金融化，以使資本積累和流動全方位滲透進入的一切社會生活。但是如果將這一社會變遷過程稱為「新自由主義化」的話，它卻絕不是圍繞著理想方案的單向度的改造運動。如 Anagnost(2013) 所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經濟和技術創造的複雜混合，伴隨著人的價值和治理哲學(philosophies of governance)的觀念變遷，她稱之為時空固節(spatiotemporal fix)。並進一步分析，東亞地區晚近的整體社會變遷，與此前 19-20 世紀的諸多現代化實踐(反殖民、現代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之間有著複雜、深層又跨地域的關聯，往往伴隨了從全球、國家到在地社會的多種層次，多重歷史維度的衝突性的、意想不到的時空連結。我在本文提出的投機熱(speculative fever)概念，試圖涵蓋礦業炒作、保健品騙局、借貸的網路化、傳銷、標會等多種形式的晚近中國現象。它們往往動態性地包含著真與假、狂歡與絕望、信任與背叛的多種情感、價值與文化層次的曖昧、突變、翻轉的情境。或許其頻繁顯現，根本的背景即來源於上述從全球到地方的急速變遷，人在延續中突然斷裂，又在斷裂中尋求延續的震盪性效應。

而深入地分析發生在安城的標會投機，及伴隨而至的諸種傳銷、六合彩、網路化投機等活動，不斷顯示出上述三個層次(全球資本市場、黨國體制的治理、在地社會)，特別在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衝突和耦合。時空之中的偶然性，使同一時期的不同地域的資本投機行為，產生了奇妙的遠距離共鳴和意想不到的翻轉現象。例如，我們或許可以籠統地說，發生于 2008 年金融海嘯的中心華爾街，由高學歷的歐美白人男性所把持，而發生於 2010 年的安城地下資金鏈的斷裂，則主要來源於小初學歷的安城中老年農村女性，即我用「經濟棄民」(economic

pariah) 概念所指涉的人群。而介於此二者之間的是，由於中國之不斷融入國際市場，而須在內與外，嘗試使用金融治理手段的中共黨國體制。何以這種反轉會發生呢？中國的傳奇式的治理模式，以及普遍瀰漫於中國社會的市場神話，又會在什麼樣的在地社會條件下，創生出各種表面上看千變萬化的投機/泡沫現象呢？本文的分析，試圖提供三條線索。

第一、或許可以被稱之為「中國式」的在人際關係中投機，也投機於人際關係的現象，我也概括為「麻將」經濟 (mahjong economy)。隨著人的價值的觀念變遷，如「麻將」經濟一章中分析的，關於快樂與忍受的觀念的改變，消費意識的覺醒，自我發展為知識主體的迫切動力，知識經濟的出現，在傳統中國鄉村社會中的道德經濟體系提供的人際倫理和情感的地基上，人際關係進一步為市場價值所裁定（如康平所言，「人才就是背後有人的人」），也使圍繞著它的投機得以發生。從中國的麻將傳統來說，除非賭博，絕大多數時候牌搭子都是自己親近/熟悉的人，是在這種親近/熟悉下發生的金錢遊戲產生了極度的亢奮，而麻將亦不在乎單把的輸贏，而在一個牌局連著一個牌局的延續，這種總賬不清又和仿佛不斷連續著的標會極為相似。通過這一線索，我們或許也可以想像「投機」在中國的某種極為深層的特殊性。

但是類似的社會網絡和人際紐帶在經濟生產活動中的作用，既非中國一時一地的現象，也無法說明晚近的投機活動具有的新特點。本文使用的「麻將」經濟想要強調的，是和一般經濟理性邏輯、官方意識形態所預設的公民經濟責任等相違背的特殊文化心理狀態。其重點在於，在經濟實力、文化觀念和政治階序上，皆遠離各個不同社會層次的政治經濟運轉中心的普通人，面對或許過度動員的充盈金錢物慾和成就激情，所發展出來的仰賴于同樣處於邊緣的人群之間的資源交

換、博弈性投機等特殊理性策略。傳銷和六合彩之類活動，之所以能夠吊詭性地顛倒官方意識形態賦予其的「賭博」、「非法」等負面意義，產生廣泛的說服效果和參與激情，其核心恰恰在於普通人對「中國模式」所蘊含的權力魔力的深刻理解。以這種理解為依託的反倫理實作，使普遍以親友的財富為發財捷徑的標會、傳銷和六合彩等活動在本地社會能夠暢行無阻，屢覆屢興。

第二、安城的中老年女性，既被市場經濟和國家資源分配體系排除到家庭中，部分地又被從家庭的情感天地排除出去，吊詭性地，由於其「經濟棄民」的身份，既仿佛有無限充裕的時間，又有強烈的動力證明自我價值，在中共治理下的急速城鎮化、地方金融等特殊時空背景下，集體性地轉變為一種新型的「情感-金融」的混合勞動力。其領軍人物，即所謂「霸氣女」，通過借用安城在地男性陽剛氣概的種種特質，或者創造性地形塑並實作新型的女性主體，達到感染性展演的效果，成為其他普通女性的情感、精神和想像力的多重服務提供者，並借此產生牢固的金錢關係。上述具投機潛力的中國式人際關係，具體轉換為使在地社會驚異（被安城本地人稱為「陰盛陽衰」）的社會景觀，也使中國傳統的道德經濟組織標會，有了進一步的變化。又或許，在全國範圍內，不同形式和原因產生的經濟棄民，又會有各種不同的變化。

第三、中共黨國體制經濟治理的長期過程，歷經經濟理念和意識形態的不斷變遷，從毛澤東時期奉行地方主義的縣域經濟、人民公社實踐，到晚近借由市場化的國有銀行體系進行的金融治理，常產生自己亦不能完全控制、或許也無法也不願詮釋的結果，特別是在地社會常常以其自身的方式將經濟治理的斷裂連結在一起（例如，2014年大慶油田工人群體抗議取消工人子弟入職的福利），安城亦不例外。此種既衝突又翻轉，有時亦聯合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如我在前述提出

的「被污染的社會」(polluted society) 強調人在「社會」中道德實作的自我卑污化，以及引用 Appadurai (1986) 的價值管制領域 (regimes of values)、圍地化區域 (enclaved zone) 等概念，分析中國的區域性經濟競爭和差別化的地方制度導致的投機和經濟活動的模糊，都促使了一種多重暴力結構下的特殊投機主體的出現。這是許多「騙局」能夠成功的關鍵背景，也是前述明知是虛假空洞的謊言（如「認識將軍的女兒」），或者往往誇張的宣稱（如「安城沒有我辦不成的事！」）反而在某種意義上能夠成真的特殊社會脈絡性。

其實上述三條線索，均既具有安城在地社會的特殊背景（如父系家戶長式的本地文化、長期的漁貿活動、以及主要由中小企業組成的外貿型經濟等），又有全國性的特徵（中國社會之注重人際關係、中共體制的區域性治理、各種類型的經濟棄民等）。在歷史正在不斷發生的當下以及未來，或許「麻將」經濟以及投機熱現象，仍會在全國各地以各種舊或者新的形式不斷出現，並又導向各種我們或能預見，又或許不能預見的未來。

## 引用書目

### 一、中文書目

費孝通。2007。《江村經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詹姆斯·C·斯科特。2007。《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譯林出版社

阮新邦、羅沛霖、賀玉英。1998。《婚姻、性別與性：一個當代中國農村的考察》。  
臺灣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李利明、曾人雄。2007。《1979-2006 中國金融大變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邱建新。2005。《信任文化的斷裂：對崇川鎮民間“標會”的研究》。社科文獻

蔡欣怡。2013。《後街金融：中國的私營企業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安城縣人民政府網站。2010。〈安城概況〉，《安城縣人民政府網》。

<http://www.nh.gov.cn/col/col111/index.html>。（2014/11/17 流覽）

寧波市規劃局。2008。〈寧波市城市總體規劃概要（2004-2020）〉。

[http://gtog.ningbo.gov.cn/art/2008/11/28/art\\_11925\\_650846.html](http://gtog.ningbo.gov.cn/art/2008/11/28/art_11925_650846.html)。（2014/11/17  
流覽）

科斯、王寧。2013。《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

郭占恒。2012。〈浙江經濟發展特點、問題和戰略措施〉，《觀察與思考》第九  
期，14-19 頁。

梁玉驥、周景洛。2005。〈推動浙江民營經濟新飛躍——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訪談錄〉，《中國報導》第七期。

之江平。2013。〈全面深化改革 再創浙江優勢〉，《浙江線上一浙江日報》。  
<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13/12/09/019747252.shtml>。（2014/11/17  
流覽）

項飆。2014。〈直面香港一群眾運動中的民主訴求與政黨政治〉，《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antonia-chao/%E4%B8%AD%E5%9C%8B%E5%AD%B8%E8%80%85%E7%9A%84%E4%BD%94%E4%B8%AD%E5%88%86%E6%9E%90/10152813764539712>。（2014/11/5 流覽）

項飆。2010。〈普通人的“國家”理論〉，《開放時代》（10），117-132。

崔之元。2014。〈理解習近平的宏大改革戰略——總目標和框架性目標〉，《觀察者》。  
[http://www.guancha.cn/cui-zhi-yuan/2014\\_05\\_28\\_233137.shtml](http://www.guancha.cn/cui-zhi-yuan/2014_05_28_233137.shtml)。  
（2014/6/20 流覽）

王劍侯。2008。〈基層，一本讀不完的“大書”〉，《寧波通訊》第六期，11  
頁。

浙江省統計研究與資訊發布中心課題組。2012。〈“浙江人經濟”與反哺浙江經濟的思考〉，《統計科學與實踐》第十二期，9-11 頁。

《安城統計年鑒—2008》編輯委員會。2009。〈2008 年年鑒〉，《安城統計資訊網》。  
[http://tjj.ninghai.gov.cn/news\\_more.asp?lm2=80](http://tjj.ninghai.gov.cn/news_more.asp?lm2=80)。（2014/11/17 流覽）

安城縣統計局。2014。〈2013 年安城縣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安城縣人民政府網》。

[http://www.ninghai.gov.cn/art/2014/2/28/art\\_282\\_85509.html](http://www.ninghai.gov.cn/art/2014/2/28/art_282_85509.html)。(2014/11/18

流覽)

馮興元。2005。〈浙江省寧波市 M 縣合會案例研究報告〉，《財貿經濟》第三期，33-36 頁。

竺歡萍。2013。《錢殤：玩錢的人生》。鳳凰網。

<http://v.book.ifeng.com/book/yc/3018954.htm>。(2014/11/18 流覽)

## 二、外文書目

Arjun Appadurai .1988. "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pp. 3-6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rdener, Shirley. 1996. "Women Making Money Go Round: ROSCAs Revisted," in *Money-Go-Rounds: The Importance of 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 for Women*, pp. 1-19. BERG Oxford/Washington D.C., USA

Geertz, Clifford. 1962. "The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 a 'middle rung' in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0.3 (1962): 241-263.

Tsing, Anna. 2009. "Supply Chains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Rethinking Marxism* 21(2): 148-176

Zeilizer, Vivianna. 2005. *The Purchase of Intim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UK

Farquhar, Judith. "Market magic: getting rich and getting personal in medicine after Mao." *American ethnologist* 23.2 (1996): 239-257.

Shue, Vivienne. 1988.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Anagnost, Ann. 2013. "Life-Making in Neoliberal Times" in *Global Futures in East China*, pp. 2-2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Anagnost, Ann. 2004. "The Corporeal Politics of Quality ( Suzhi )" *Public Culture* 16.2:189-208